

#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梁文建議員，C.B.E., J.P.

財政司，議員麥高樂爵士，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千石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缺席者：**

彭震海議員，M.B.E.

劉皇發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潘國濂議員

黃宜弘議員

**列席者：**

規劃環境地政司伊信先生，J.P.

經濟司布簡瓊女士，J.P.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立法局秘書處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 非官方議員動議

### 致謝動議

#### 恢復辯論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提出的動議

主席（譯文）：本局現在恢復會議，並繼續辯論致謝動議。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謹代表醫學界功能組別就動議發言。

由於這是一項致謝動議，我認爲先就施政報告所提的某些部分表示謝意，是明智的做法。

對於當局決定在將軍澳興建醫院，我深感欣慰。希望這些長久以來和我們隔絕的居民，可以得到他們應得的健康醫護服務。

我想現在應該申報利益。白普理寧養中心直接隸屬善終服務會，而我正是該會的董事會主席。雖然白普理寧養中心在過去數個月，一直倚靠慈善捐款勉強支撐下去，但仍然竭盡所能，爲絕症末期病人及其家人提供最好的護理服務，並秉承一貫的優良傳統，使病人能夠「有尊嚴地度過餘生」。因此，得悉港府決定經由醫院管理局向這所寧養中心提供補助，實在令人覺得好像打了一支強心針。

但願這些承諾能夠盡快一一實現。

主席先生，可惜的是，這份施政報告值得讚許的地方僅此而已。我和我的醫生及牙醫同業對這份名爲「掌握千日·跨越九七」的施政報告有更多的不滿和批評。很多人認爲，施政報告所謂「掌握千日」，是指政府願意承擔的責任只限於千日；而所謂「跨越」，則象徵香港市民在一九九七年後，必須自力更生。

我主要會就以下 3 方面發言：

- (i) 當局缺乏機制，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局之間的溝通，這種溝通對於一個行政主導政府的平穩運作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 (ii) 當局缺乏有效的方法，統籌政府各部門的工作。
- (iii) 當局缺乏具遠見而且能夠跨越未來 10 年的衛生及健康醫護政策。

## 行政機關與立法局的關係

主席先生，總督決定把行政局及立法局分家，其後並把這項決定付諸實行。這做法不但帶來了不少問題，而且或許會令行政機關與本局產生抗衡的態度。這對於政府的順利運作來說，是有害無益的。

讓我補充一點，雖然我同意行政立法兩局的功能應劃分清楚，但對政府的運作來說，容許有「跨局」議員，或制定具體的方法改善這兩層架構之間的溝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其實，政府很清楚這些問題的存在。不過，在這份施政報告中，竟然完全沒有提及任何改善方法，實在令人既詫異又失望。

當總督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他表示檢討工作將於一九九五年選舉後進行，主席先生，一個制度已經證明無效，卻不及早採取行動糾正，這豈不是很可笑嗎？此外，總督所提出的檢討時間，更令人懷疑他是否以檢討為借口，藉此委任支持他的人出任行政局議員。

總督屢次強調行政機關必須與本局緊密合作，在施政報告中更意譯托馬斯的一句話：「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作主」，再次強調這一點。

司徒華議員向來雄辯滔滔，昨日亦不例外，他指出總督似乎錯誤引述了作者的話。無論如何，即使總督引述的話只是意譯而非逐字直譯，究竟我們所聽到的是應酬話還是實話？托馬斯又會否因此死不瞑目？

## 行政機關缺乏協調

施政報告內三番四次地強調「一流」的政府。主席先生，我一定會第一個同意我們有一群「一流的行政官員」，以及做事有效率而且盡忠職守的公務員。不過，說到政府的「行政」，很多議員都會離席表示反對。我所指的特別是政府部門之間缺乏良好的合作和協調的情況。

事實上，我們雖然一向標榜本港有良好的衛生紀錄，但每年仍有個別的霍亂病症發生，這真的令人感到慚愧。況且，今年發生的霍亂病的病源很明顯來自本土，這對於一個「先進地區」來說，實在丟臉。

主席先生，我並非對衛生署的工作效率及能力提出質疑。衛生署早已知道本港海港部分水域受到嚴重污染，如果酒樓食肆用這些海水飼養魚池的海鮮，問題將會非常嚴重。但當局卻要等到面對霍亂蔓延危機，以及有市民患上這種落後地區的流行病時，才成立統籌委員會，負責統籌衛生署所制定的方針，以及監察兩個市政局的執行工作。倘若當局能夠及早協調各部門的工作，或許可以避免發生這些令人丟臉的事情。

讓我再多舉一個例子。預防愛滋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從教育入手，而且應該從小開始。換句話說，當局應該把愛滋病教育列入學校課程，但統籌機制何在？因此，我支持林鉅成議員的建議，促請當局盡快成立一個具有實權的愛滋病委員會。

雖然其他例子多不勝數，可惜的是，施政報告對改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隻字不提，試問這樣又怎能產生「一流」的政府呢？

### 醫療衛生問題

主席先生，最後我要談談施政報告內有關衛生的部分。我感到很抱歉，但又不得不說出來，這部分充其量只是一個「工作大綱」，與「施政報告」實在相去甚遠。可能有人會說施政報告已提出很多改善衛生及健康醫護服務的建議，但我不禁要問：政府整體的政策方針為何？哪個部門又會擔當領導角色？況且，很多承諾以前已經提出過，今次只是舊事重提而已。主席先生，過去兩年，我均以「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形容施政報告內有關衛生的部分，可惜今年還是要說第三次，而且當中很多所謂樹木更是舊貨呢！

前任衛生福利司在她退休前夕，曾承諾撰寫一份跨越一九九七年的衛生政策文件，可是，昔日的承諾今天已不復再。更糟的是，政府說要先弄清醫院管理局的成立及衛生署改善基層健康醫護服務的影響，並待諮詢市民對即將發表的最後一份傳統中醫藥研究報告書後，才是檢討健康醫護政策的適當時候。

凡此種種，簡直是一種諷刺。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但表現出政府極度官僚的作風，而且更侮辱了香港市民的智慧。

健康醫護政策方針理應由衛生福利科制定，然後由兩個負責執行健康醫護服務的部門（即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推行，而不是把次序倒轉過來。決策科發出指令，由行政部門執行，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不過，現在政府很明顯會被醫院管理局這個獨立機關牽着鼻子走，無怪乎廣大市民及員工均對政府能否有效監管醫院管理局這個問題，採取質疑的態度。

我認為當局說監管傳統中醫藥的最終報告書的諮詢工作尚未展開，因此不宜制訂長遠的衛生政策，只是政府的一種推托手段，不但不合常理，而且不負責任。

### 我對長遠衛生政策的建議

主席先生，讓我藉此機會，表達我對衛生及健康醫護政策方針的一些意見，以供政府考慮。我想這樣會較有建設性。

提供任何健康醫護服務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在政府及納稅人能夠負擔的大前提下，為病人提供最佳及最先進的護理服務。因此，長遠的健康醫護政策應考慮以下各方面：

### (1) 服務的優先次序

雖然香港的心臟、骨髓等移植手術及利用伽瑪科技切除腫瘤等手術在世界上享負盛名，令人讚嘆，但這些醫療手術卻非常昂貴。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例如為市民接種肝炎疫苗、設立婦女健康中心、為慢性病患者提供醫護服務等。在有限的資源下，各項服務的優先次序應該如何編配？

### (2) 公營與私營健康醫護服務的分工

市民使用私家醫院的比例由 15% 降至只有 9%，這雖然可能顯示醫院管理局的服務稱職，但另一方面亦等於政府要動用更多經費，應付公共開支。而大家都知道，我們無法獲得更多撥款。政府現正鼓勵市民自動購買私家醫療保險，這計劃是否有效？公營及私營的醫療服務又應怎樣分工？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應如何協調，才能使市民不論貧富，都能獲得高質素而又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

### (3) 健康指標

醫療服務，特別是醫院服務費用高昂，大家常有聽聞。要遏止醫療費用上升之說，大家亦耳熟能詳。但總督卻大聲疾呼說：「我們計劃令心臟病患者當中為數最多的一組病人的死亡率減低 20%。為達致這個目標，我們會在未來兩年，以改良的治療方法，每年多為 200 名局部缺血性心臟病患者提供治療。」這真是一大諷刺。

主席先生，要減低病人的死亡率，特別是心臟病病人的死亡率，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最佳方法，是預防而不是治療，也不是用昂貴的治療方法延長病人的壽命。

不論總督在施政報告內表示，對改善市民健康如何充滿信心，但承諾始終隨着時間而消逝。總督所發表的，無論如何也不是衛生政策，他只不過是針對治療一些在先進國家發生的嚴重疾病而已。

因此，我促請政府制定「健康指標」。只要緊守適當的變數，就可以預防或至少可以減低患上疾病的機會。只要我們有決心，定能減少心臟病及其他可怕疾病的發生機會。

### (4) 牙齒護理服務

長久以來，政府只是為市民提供緊急的牙齒治療服務，對市民在其他牙齒治療服務方面的需要，則置諸不理。政府表示，其政策乃致力推廣口腔衛生教育及預防口腔衛生問題。政府當然可以告訴市民，如果他定期刮除牙垢及經常檢查牙齒，到了 80 歲，他還可以擁有自己的牙齒。不過，市民可以到那裏接受定期的牙齒檢查？



去年，政府曾承諾分期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例如弱智、兔唇、裂顎等人士提供牙齒護理服務。不過，即使是這些承諾，至今仍未完全落實。

主席先生，最後，我想就愛滋病再說幾句話。我現在申報利益，我是香港愛滋病基金會的主席。

政府打算制定「愛滋病社會約章」，這是值得讚許的。讓我們期望今次這份約章能夠收到效果。制定這份約章，是爲了使商界及社區組織可以公開保證，不會對愛滋病人存有歧視或偏見。不過，即使是政府部門，對如何處理「工作場所的愛滋病問題」，都沒有既定政策，實在令人懷疑政府如何能夠推行這個計劃。

主席先生，以上種種，均顯示我們需要一個有領導能力及實權的政府，爲我們制定周全的計劃，並致力達成長遠的目標。既然港府不能夠達到上述要求，無怪乎預備工作委員會成員也看風駛舵，發表一些公然違反基本法的言論，例如說本港在一九九七年後應承認國內的學術及專業資格、將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對香港英國屬土公民的居留權毋須負責等等，打擊香港市民的信心。

謝謝。

黃宏發議員致辭：

總督彭定康的第三份施政報告在昨日辯論中遭受議員左中右的圍攻，彈多讚少，甚至可說是有彈無讚。雖然總督個人予人印象十分高傲，但此份施政報告卻受人冤枉，實在太可憐。或者，可能由於選舉年的關係，「罵」政府勢必得分，更何況罵總督呢？這實在難怪！

平心而論，這份不單止不是一份一無是處的施政報告，而且是極爲進取的。我會稍後提出意見支持這結論。但首先看看施政報告的象徵標籤：封面所採用的顏色，一九九二年所採用的乃保守黨及皇者貴族的藍色；一九九三年第二份施政報告採用象徵了鬥爭、惹火、流血的紅色；今年第三份施政報告，卻用了平和、和平、充滿生機的綠色。這些顏色上的轉變，必定有其象徵的意義。

我們再看看報告所用的詞句、文字，裏面充滿了友善、祈求，禱告，甚至是近乎哀鳴的詞句。可惜，很多時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一些味道。例如施政報告副題只是說：「一千日及其後」(A Thousand Days and Beyond)的中性詞句，卻被譯爲「掌握千日·跨越九七」——竟變成了「大權緊握，跨越沖破牢籠」之類甚有奮進意味的詞句。其實報告第一段已經看到這樣哀鳴的說話：「如果上天允許的話，這是我任內發表五份施政報告中的第三份。」可見他雖然希望，卻對於自己個人能否留任完成過渡工作亦存有疑問。在第 95 段，他說：「我曾聽聞中國官員說，確保香港未來的繁榮和福祉，對他們來說是一

項巨大的歷史任務。……無論意見怎樣不一致，觀念和背景怎樣不同，彼此有甚麼誤解和猜疑，我也請他們明白，我們（即英方）同樣也是致力成功完成這項任務的。」明顯是希望、祈求中方放棄誤解、猜疑。而在第 96 段他更加說：「香港對我們（即英方）具有利害關係 — 不錯，不僅在於商業，也在於人民和榮譽方面。畢竟這也是我們（即英方）歷史的一部分」。他是在說香港無論如何皆成爲英國歷史的一部分，他說的「利害」關係，英文原文爲"stake"。在商業上翻作「利害關係」未嘗不可。在英國的榮譽方面，則實爲政治上「賭注」，在人民方面，這明顯是指他在上文所說，英國對香港所履行的責任。這幾句說話實在是近乎哀鳴，祈求中方體諒、諒解英方的處境。

主席先生，容許我先談談民生問題。從一個持平的角度來看，這份施政報告並無「新猷」，在原政策之下所作出的遞增及改進，仍然只是留在僅僅可令人繼續存在(survival)的水平上，更遑論一些理想的標準呢？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擠迫的醫院和診所，生活條件十分差的公、私營樓房，爲老人、弱能弱智人士、精神病人而設的設施不足等。主席先生，我在此歡迎他從善如流，至少宣布在將軍澳興建一所 400 張病床的醫院。此舉能紓緩觀塘及將軍澳，甚至整個新界東部病床不足之患。我促請政府盡早把計劃落實，因爲觀塘的基督教聯合醫院已不足應付觀塘本身的需要。

一項值得讚賞的改進是增設對單親家庭新的補助金。但這只應該是第一步，在檢討綜合社會援助保障金的同時，我亦促請政府能將每月 200 元的補助金提升。

主席先生，施政報告中唯一的「新猷」是老年退休金計劃。但此計劃仍在諮詢期內，並未成爲政府的政策。雖然社會人士對此計劃意見紛紜，但我想藉此機會表明我的支持。此計劃是可取的，我促請政府在諮詢期完結後盡快施行，並老老實實向社會大眾交代，此實爲「養老金」而非「退休金」，是一種徵稅養老的概念，而非「供款」的概念，是社會上年輕一代對老年一代的一種承擔。我明白到社會對此計劃出現分化，低薪的傾向支持，高薪的傾向反對；接近退休和已退休的傾向支持，年輕力壯的傾向反對。我再次強調，此乃一種徵稅，而非供款。我希望市民能作出良心的抉擇，供養上一代，而各大政黨亦不應因爲「洗濕頭」曾誇下海口支持 20 年後才見效的中央公積金，而放棄即時見效、公平、公道、有良心、有道德勇氣的「養老金」計劃。

主席先生，另外一項以前已放棄的「新猷」，就是現時已「胎死腹中」的出售公屋。昨日自由黨周梁淑怡議員已表示自由黨會全力說服房委會全面出售公屋，我十分多謝自由黨對這計劃的支持。我在一九九二年曾撰寫一份研究報告，亦在本局多次發言，促請政府放棄「局部出售公屋計劃」而實施「全面出售公屋計劃」。民協馮檢基議員及民主黨議員支持此概念。我在此呼籲本局內各黨派同事，攜手合作，將此事放在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議程上，盡早擬定具體的計劃，交予房屋委員會和可能將任命的房屋司決定，而即使房委會反對，本局亦應迫使政府施行計劃，令人人都有本身的居所、本身的殼。

主席先生，我亦想藉此機會舊事重提，將軍澳的地鐵支線及馬鞍山通出九龍的鐵路，即使興建的優先次序比不上西北鐵路，但有鑑於西北鐵路已經延期興建，所以上述工程理應同期進行。相信地鐵公司有足夠資源，在短期內完成將軍澳地鐵支線。至於馬鞍山鐵路，已經有兩大財團表示有興趣私營興建，為何不能盡早進行其事呢？

主席先生，我生平最佩服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爵士(Sir Karl POPPER)不幸於月前逝世。他的公共政策哲學是以「減少人民痛苦」為優先。這一點，香港政府是經常在做，亦可說是做得到的。這份施政報告雖然並無驚人的「新猷」，但它在港府以往「減少人民痛苦」的各項政策的基礎上，將範圍擴大，將金額、將標準提高，確實是彭定康先生的政績，但我在此促請總督彭定康不要只停留在「減少人民痛苦」的層次上。香港的經濟已有成就，在這富裕的社會裏，總督的施政哲學實應進入波普爵士所說的第二個層次：即「增加人民自己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度」(maximize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to live the life they choose)。例如，增加有需要人士的援助金額，使他們能過着有尊嚴的生活、增加社區設施，促進文化活動，資助次文化活動，使他們的文化生活可以多元化。

主席先生，在與中國關係的問題上，彭定康先生所提議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之下的專家小組內，由香港政府官員與預委會成員進行交流是可取的辦法。所謂高級公務員與預委會成員交流的問題，並非在於個別高級官員與預委會個別成員的私下交流，而是在於官員以其職位作身份，或被視為以其職位作身份參加預委會及其小組的正式會議。在中英雙方同意成立的架構之下，例如聯絡小組、土地委員會、機場委員會以職位作身份交流並無問題。但預委會並非此類組織。彭定康所提的此種方式，實不只限於公務員及預委會成員，也可包括中方、英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港方的行政局議員。此方式實可避免別人誤以為預委會會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而高級公務員以其職務的身份出席預委會會議，正會予人此種印象，使人誤解預委會的性質。預委會的性質，其實只是一個提供意見、做準備功夫、好讓籌委會進行正式工作的一個先設小組。

主席先生，自從總督在九二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政改方案以來，中英政府爭拗不休，有些對罵已超越理性的範疇，事實上，每件事都上綱上線。本人看見香港人完全被排斥在中英兩國的政治角力以外，無不傷心。與此同時，香港社會被嚴重分化，黨派間只顧自身利益及策略考慮而行事，有的左搖右擺，有的靠攏歸邊，靠攏中國政府或英國政府，實在令我痛心。我不敢說民主黨和自由黨是否「果真如此」，但昨日兩黨的表現的確給人如此印象。自由黨黨魁李鵬飛議員首先發難，宣稱自由黨會對致謝動議投反對票。其實致謝動議乃一禮貌動議，如果真不滿意彭定康在處理中英關係方面壞事，大可提出一項修訂案，在原動議加上「遺憾總督在中英關係問題上未能提出實質建議」，或更嚴厲的語句。隨後，民主黨黨魁李柱銘議員要求英國政府就中方拒絕在九七年後向聯合國提交香港人權狀況報告一事，在海牙國際法庭控告中國違反聯合聲明。身為大律師的李議員，應知道在任何一方不同意的情況下，是不能強制執行法庭的裁決的，而此舉令中英關係進一步惡化。可以說，若要上樓，是毋須跳上去，因為會跌死的。

主席先生，為何各黨派不能拿出政治勇氣，真正以香港的利益為大前提，向中英兩國政府表明香港人的立場和利益？在此，我呼籲各位同事，放開胸襟、容納異己，尋求並重新建立共識，促進寬容的政治文化及制度，使香港能在一國兩制下發展出健康的「競爭政治」，而非具破壞力的「對抗政治」。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很多人都對總督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表示失望。雖然這份施政報告經過悉心包裝，但始終與市民對將來所謂「掌握千日·跨越九七」的期望，相去甚遠。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措施，充其量只是政府打算維持現狀的一些陳腔濫調而已。更重要的是，眼看中英交惡，關係難有突破，難道還要向總督及英國政府致謝？

面對這樣的處境，香港市民對於在一九九七年來臨時能否維持現有的生活質素，實在不敢存有厚望。除非我們現在就努力捍衛我們現有的價值觀、信念及生活方式，使他們不致受到侵蝕，否則在主權移交後，這些價值觀、信念及生活方式可能會出現變化。要確保本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在一九九七年後得以延續，我們必須鞏固及深化現有制度的特色和加強其效力。單單用「持家」式的管治方法，實在並不足夠。時代不斷變遷，任何架構亦必須因應改變。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本港的制度在一九九七年後，仍能配合大多數市民不斷轉變的期望。

擬定計劃和着手建設本港的將來，乃當前急務。政府今天的決策，不但要發揮承先啓後的作用，而且更要為香港推行「一國兩制」這個前所未有的構思鋪路。我會針對後過渡期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建設香港的將來。

### 政治方面的過渡

香港市民都希望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和繁榮安定的社會，這是無可置疑的。我們曾經看過一些前英國殖民地推行西方民主的成功和失敗的例子。雖然本局於六月通過了備受爭議的政制改革方案，但大多數本港市民都認為循序漸進式的方法總比全面推行民主好。當局在審慎建設一個公開及民主政府的同時，亦必須確保基本法所謂的「高度自治」得到客觀及不偏不倚的詮釋。英國政府在剩餘的管治日子裏，一方面應遵守現行憲法，另一方面應盡量包容本港在政治多元化及多黨政治方面獨特的發展。政府必須確保所有重要的公共政策，均能達到香港市民的期望，以及符合他們所詮釋的聯合聲明精神。

自一九八五年起，政制改革使本局的組織、權力及程序不斷改變。一些政治分析家更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本局就終審法院進行的動議辯論為例，指出本局所扮演的角色已趨向一個對抗式的議會。然而，這方面的發展是符合「過渡期的明智決策」；而且，加強民主

亦不一定與有效率的立法機關互有衝突。在未來數個月，本局必須致力維持行政主導的架構，並確認現行制度下的制衡原則及程序。我們應該把英國國會式的民主與本地政治的優點合而為一。我相信如果我們今日有一個公開、負責任而且有效率的立法局，他日定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樹立良好的榜樣，使其在一九九七年後能夠體現「一國兩制」的構想。

在過渡期間，公務員面對不少矛盾。他們一方面要做理智、有效率和受規章限制的「管治者」；另一方面，又要做坦白、負責任和靈活變通的決策人。市民的要求不斷增加和政治環境瞬息萬變，這對於公務員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此外，中英在外交上爭持不下，往往對行政機關的獨立性構成威脅，公務員更因此成為犧牲品。選舉制度改革及香港電台重組，便是其中一些例子。面對各方面的政治壓力，公務員有需要弄清楚他們模糊不清的行政角色及憲制功能。此外，政府亦應盡快為公務員作出安排，使他們能夠平穩過渡。否則，他們便不能放膽地進行創新的政策改革。公務員作為政府架構的支柱，在整體政治制度的過渡中，必須扮演更重要的領導角色。

### 中港關係

我在去年就「為九七的順利過渡作好準備」這個題目發言時，強調香港政府必須與中方加緊合作。在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大約 65.4% 的被訪者認為英國應設法取得中方的支持，才能繼續有效地管治香港；被訪者又認為不應讓中英各持己見的政治現狀影響政權及行政責任的移交，這正好顯示了中港合作日趨重要。因此，我懇請政府不要作出不能兌現的承諾；反之，政府應該採取必需及具體的行動，與中方合作處理聯合聯絡小組尚未完成的工作。如果港府能夠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容許公務員與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直接接觸，便不但可以使預委會了解現行制度，因而更能向香港市民負責，而且可以使公務員為一九九七年後的行政架構作好準備。倘若預委會可以充當中方的耳目，積極徵詢港人的意見，然後向中方官員反映，這樣應該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反觀港府擬議依循的工作方式，就令公務員完全蒙在鼓裏。到底公務員可以向預委會披露多少敏感卻又對管治香港十分重要的資料？如果中港雙方能夠合作，就可以避免預委會根據錯誤或失實的資料而作出建議。事實上，我們預期很多預委會成員將來亦會成為籌備委員會成員，因此，他們應該獲得適當的資料。

近幾年來，中方在新機場計劃及最近推出的老年退休金計劃上，均扮演維護港人利益的角色。中方希望做應做的事，為主權回歸贏取民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只要中方採取不干預政策，或所謂「河水不犯井水」的做法，便大可以取得港人的信心。只要中方能夠維持互相尊重的政策，耐心聽取港人對有關跨越九七的事宜所發表的意見，便可以顯示出它容許「港人治港」的誠意。

### 經濟方面的轉變

如何以中國龐大的增長作為後盾，維持本港經濟繁榮，是過渡期間的一大挑戰。現時，持續的通貨膨脹、勞工短缺、高生產成本及鄰近國家競爭等問題，均對本港的經濟構

成威脅。港府必須採取更積極主動的策略，才能維持本港的經濟地位。單是總督在施政報告所列載的策略，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再創新猷，推動公平競爭和提高市場效率，並且鞏固投資環境。缺乏新措施打擊通脹，只會顯示港府的無能。我要求當局就如何打擊這個真正威脅本港經濟的問題，作出明確的答覆。在財政方面，政府一方面要維持本港審慎處理收支預算的傳統，另一方面亦要顧及在經濟放緩期間推行新基建計劃的需要，並且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中國和香港唇齒相依，因此，中方是否能夠緊守諾言，證明政治上的分歧並不影響本港的經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一直以來，香港市民在中英就新機場及九號貨櫃碼頭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均採取觀望態度。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我們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應繼續讓商界參與及提出修改建議，務求得到所有有關人士接納。

### 社會安定

自由及法治是本港繁榮的根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大致上都會徵詢及考慮民意。加上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極之希望每個人都享有均等的機會。現在政改方案既已塵埃落定，政府及本局就應多花一點時間，探討未來數年將會影響本港保持自由和法治的問題，其中包括更廣泛、更積極地推行公民教育，務求把港人的政治意識提高至能夠參與的水平；賦予市民公民權，使他們更容易取得公共資料。與此同時，政府急須就打擊越境罪案與中方合作，因為隨着主權的移交，這個問題可能會對本港維持社會安定方面構成威脅。

談到社會安定問題，我想就本港的社會保障制度發表一些意見。本港經濟轉型雖然使市民得到更多機會攀上更高的社會階層，但是，一些社會結構根深蒂固的不公平現象仍然繼續存在，令某些人的發展受到阻礙。香港市民都希望社會上有一個可予接受的公平標準，使那些比較不幸的人的生活，不會與其他人相差太遠。因此，「安全網」的概念，就是要令香港能夠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照顧，而又不會對我們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造成損害。

我在以往的陳辭中，曾不只一次指出政府缺乏長遠的環境政策。雖然當局已公布環保白皮書第二次檢討，但情況依然沒有得到改善。在這裏我想再次籲請當局制定更多以積極推廣四用原則為主題的預防性環境政策，以及實施一些預防性環境法例。本港急需一個全面的自然護理政策，包括節約能源、節約用水、保護自然環境及市區林木等。此外，為使現有的環境得以維持下去，政府必須撥出更多款項供作環境教育之用，並應盡快讓綠色團體積極參與制定環境政策。更重要的是，環境保護不應單由我們做起，其實，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公務員及商人等，都應該把環保緊記在心。

## 專業資格

關於最近預委會宣布規定香港特區承認 500 多個中國頒發的學位，本港的會計行內人士均表示關注。對於取消自動承認英國及英聯邦國家院校所頒發的資格，我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事實上，將於十一月二日恢復二讀的專業會計師（修訂）條例草案，就是要取消自動承認該等專業資格，以便香港會計師公會能夠以客觀的標準，評審所有院校所頒發的資格。不過，對於不論適用與否而全數認可的做法，我們則有所保留。

規定香港會計師公會承認將來國內頒發的會計學學位其實並不適當，因為中國大陸在學術訓練、考試準則及專業實務方面，不一定符合香港特區嚴格遵照的國際專業標準。可惜預委會沒有徵詢我們的意見，否則這個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 結論

總督於一九九二年十月發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時說：「一國兩制…就是一個繁榮興旺的中國，在朝氣勃勃、寬容開放的香港協助下，變得更繁榮」。我同意總督下的定義，但我會作出一些修改。在政治方面，香港應盡量爭取，使到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得以延續下去。在經濟政策方面，港府不但要堅守「維持不變」的原則，亦要顧及創新發展的需要。本港是一個公開讓人爭取機會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政策應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人權的特質。一個溫和、進步和充滿關懷的香港，才是輔助發展迅速和現代化的中國的原動力。明日的香港，應該可以成為「一國兩制」這個先進構思的典範。

## 譚耀宗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回應「華叔」昨日對預委會的一些指摘，「華叔」可以說是「屈得過就屈」！這句說話，我覺得是非常貼切，但這種作風，是令人擔心的，特別是我覺得作為一位老師，更不應如此。我說「屈得過就屈」的原因，是這些指摘全無事實根據。例如預委會建議成立的臨時立法會，是由全國人大常委委任的推選委員經「選舉」產生，並非「委任的委任」；而且，臨時立法會的職權範圍尚未確定。政務小組的成員亦解釋過，有關顛覆的法例不一定要由臨時立法會制訂，所以「華叔」未免是過於杞人憂天。其實，「華叔」不惜一切地對預委會施予口誅筆伐，其目的很可能是想藉抹黑預委會而達到與總督彭定康裏應外合的效果，說明公務員不值得爭取與預委會接觸。

言歸正傳，總督的施政報告發表前，大家都普遍期望總督會為改善中港關係「搞搞新意思」，但似乎這些期望都已落空，未知是因為總督對改善中港關係感到力不從心，還是根本沒有誠意，而只想在文字上擺擺姿態？

因為，正如本局其他同事一樣，本人亦質疑，施政報告所提到改善中港關係的辦法，到底會有多大的成效？

總督說，預委會有別於籌委會，並不是聯合聲明或基本法規定成立的機構，只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諮詢組織。這個不僅是常識問題，而是總督過去一直不肯承認預委會，到現時不得不承認，於是心有不甘，要將預委會貶為人大的諮詢組織。須知道，預委會的全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顧名思義，是為籌委會做準備工作的機構，是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成立的法定機構，並不是諮詢組織，希望總督不要再自欺欺人。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暗示預委會成員可成為聯絡小組的中方專家，容許公務員與預委會作非正式接觸及提供資料，但又禁止公務員出席預委會的正式會議。這些行為，根本無助於改善港府與預委會的關係，而這種不情不願的讓公務員與預委會接觸的態度，不但對預委會無好處，更會對公務員造成無所適從的局面。

總督經常呼籲各界人士對他的建議提出反建議，本人希望在此向總督彭定康提一項反建議，且看總督是否真有雅量接受？

從施政報告建議的成效備受質疑，顯示總督可能根本不了解與中方相處之道，總督其實可以考慮委任預委會成員作為總督的顧問，向總督建議如何改善與中方的關係，促進合作，這樣一方面有助於順利過渡，另一方面亦可顯示港府與中方合作的誠意。

此外，總督一直口口聲聲說重視基本法，但民建聯曾建議由港府撥款成立基本法推廣基金，供民間團體申請作推廣基本法活動的經費，這本是輕而易舉的事，總督卻完全沒有回應，對於這一點，本人感到十分失望。

施政報告除了中港關係部分是乏善足陳外，民生部分的敘述亦令人失望，只是針對表面的現象，略施小恩小惠，而完全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能否治標都尚且成疑問，又怎能奢望可以治本？

對於總督認為首要解決的老人問題，施政報告在具體政策上，其實並沒有甚麼實質的建議和規劃，其中的建議，例如改善私營安老院的安全和護理水準等，亦只能照顧到社會上小部分的老人，但對於民間普遍的要求，把公共援助金額增加至每月 2,300 元，總督竟然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與此同時，總督又同樣漠視民意，堅決不會考慮設立中央公積金的建議，而在老人退休金計劃方面，又表示要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研究計劃所涉及的技術問題，這點更令人質疑到底是港府較早時所聘請的惠悅顧問公司在研究該計劃時並無盡責，還是政府再一次借成立小組為名而拖延時間？這不禁使人懷疑，政府是否真正有計劃解決日益嚴重的老人問題？

主席先生，本人希望港府能夠重新考慮民建聯和工聯會提出的「老有所養」綜合方案，一方面吸收各界人士在諮詢期內所提出的意見，盡快落實老年退休金計劃；另一方面積極研究成立中央公積金或強制性私人公積金計劃，並且在實施這些計劃之前的過渡期內，增加老人公援金額，切實改善老人晚年的生活。



至於對單親家庭的承擔，施政報告建議由明年起，向每個單親家庭發放每月 200 元的補助金，亦不過是聊勝於無，根本不足以解決單親家庭所面對的各種困難。

另外，對於牽涉二百多萬勞工的問題，今年的施政報告亦難有發現，在再翻看港府的政策大綱後，發現當中提到的所謂「新措施」，其實只是「炒冷飯」，毫無新意可言。所提到的 3 項措施，全部都是政府早已答應要做，但一直遲遲未有行動的。今次再列入政策大綱內，勞工界普遍亦不敢太樂觀，尙要視乎政府何時能夠落實。

至於《工作進度報告》及《政策大綱》兩次強調接受再培訓計劃的人數，實際上是重量不重質，只是希望以數字瞞騙公眾。政府一直迴避這些接受再培訓的人士，有多少是能夠成功轉業。

在處理多年來最困擾民生的住屋問題上，總督在施政報告中聲稱，會盡力為市民提供舒適的居所，但如果我們翻閱一九八七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政府要基本上滿足輪候家庭租住公屋的需求時，房委會須在九七年前每年提供至少 43000 個租住公屋單位，即使把該目標延長至二零零一年，每年所需的租住單位亦應達到 3 萬個。然而，從《政策大綱》所見，政府只打算從現時到二零零一年的 7 年，多建 141000 個租住公屋單位，即每年只增建 2 萬個單位左右，試問這樣又怎能滿足市民的需要？我希望總督不要再玩弄數字遊戲，必須正視住屋短缺的問題，增建公屋，盡快令十多萬輪候公屋的家庭可以上樓。

在談到醫療政策時，總督雖然提出要改善醫療服務質素，以及興建新醫院等建議，但卻好像刻意迴避了有關政府醫療政策要「用者自付」的問題。總督在《政策大綱》中指出：「我們必須作出承擔，確保不會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然而，去年政府發表公共醫療服務採用「用者自付」收費原則的諮詢文件後，便引起很大的批評和爭論，認為這樣肯定會提高醫療服務收費，增加市民的負擔，而今年施政報告則完全沒有觸及。但無論如何，如果政府真的要採用「用者自付」的收費原則，又如何可以保證不會有人因經濟困難而不能得到適當的服務？

主席先生，總督今年的施政報告在文字上突出了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然而，香港與內地的各項大型基建的協調，會牽涉到兩地的經濟發展，若處理不當，會引致嚴重的後果。因此，中方曾建議成立一個較高層的跨境基建小組，處理中港兩地交通運輸的規劃和配合，協調兩地港口、鐵路、公路及航空交通等基建項目。我希望港府能積極地互相配合，實踐總督在施政報告結尾的諾言。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香港當前最核心的政治是過渡，施政報告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過渡，在中英雙方關係極為惡劣的情況下，在政治上的衝突仍然未能解決的情況下，今年的施政報告，只能是一份毫無大志，得過且過的施政報告。在教育方面，在公務員方面，在其他民生方面，都是如此。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正好說明彭定康第三份施政報告的困境：在政治上陷入僵局，在民生上就難以作出更大的興革與承擔。

就以教育事務來說，我幾乎不能從施政報告及其政策大綱中找到任何值得鼓舞的新措施。教育投資的增長追不上經濟增長，使我深深地失望。一些教育界積存十多二十年的老問題仍然像死結一樣，阻礙着教育的正常發展：政府仍然不肯承認幼稚園教育是必需的，以致幼稚園至今仍然未得到資助；小學全面實施全日制和中學取消所有浮動班仍然遙遙無期；特殊教育的改革更是一片空白；大學擴張引起的質素下降更未提上議事日程；母語教學和公民教育仍在自生自滅。面對着這樣死氣沉沉的局面，我能做到些甚麼呢？我彷彿像一張損壞了的舊唱片，每年在施政報告中重複着同樣的訴求，重唱着同一首歌。但我知道，這虛耗了的光陰和歲月，受損害的是 100 萬的學童，讓他們得不到更優秀的教育，我們在損害着明天。

至於公務員事務，情況比教育事務更壞。在過渡期，在中英雙方鬥爭的夾縫下，公務員成爲政治上的夾心人，舊主子餘威猶在，新老闆氣焰迫人。舊愛新歡，不知何去何從？而在這不足一千日的夾縫中，公務員的壓力、焦慮、無助和無奈，更使本來已經惡化的公務員事務出現危機：高官過渡，公務員斷層，長俸基金，統一服務條件，本地化政策，敘用委員會的改革，中文的廣泛使用，這一連串在過渡期必須解決的事務，處處碰壁，舉步維艱。當中所牽連的，不單是 18 萬名公務員，而是香港政府整個行政系統能否在九七年前有效運作，在九七年後順利過渡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公務員系統是港府的中樞和大腦，是任何時期都不能癱瘓的。

主席先生，中英的衝突使整個香港的過渡期陷入深深的危機中，使香港的未來蒙上極不穩定的因素。以香港人來說，我們期望的是中英合作，而合作的基礎是中英聯合聲明，合作的法定機制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但自從中英政制分歧而衝突之後，聯絡小組就成爲中英鬥爭的場所。而中國所設立的預委會，其成立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拆毀直通車，另起爐灶，架空聯絡小組，與港英對着幹。因此，預委會就成了中英依法溝通的絆腳石。現在，有人埋怨港英政府，不提供資料給預委會，使預委會的建議經常犯錯。但中國政府有沒有想過，爲甚麼不堂堂正正，循聯絡小組去和英方溝通和合作呢？爲甚麼有大路不走而去走後門呢？

主席先生，在民主黨的立場來說，預委會是一個違反基本法的僭建組織，也是一個違反民意的政治怪物，成員缺乏認受性和公信力。借用中共的說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預委會過去一年的實踐，已經引起香港人的公憤。請看一看，預委會屬下 5 個小組的一些驚人意見：政務小組在提出 18 萬名公務員要先行效忠特區政府，才可

以繼續留任後，又提出用毫無民意基礎的臨時立法會去取代九五年的民選立法局，使民主全面倒退；經濟小組提出土地基金九七年暫時不撥入特區財政儲備，維持獨立運作 1 至 3 年；文化小組建議特區政府在九七年承認 561 所中國大陸的大學學位，衝擊本港的學術和專業制度；法律小組要在九七年重新審核人權法，以及還原公安法和社團條例，防止三日一遊行，五日一示威；社會及保安小組要取消 40 萬移民回流者的永久居留權。可以這樣說，預委會連同其 5 個小組，各爭出位，各自精彩，自我膨脹，製造恐慌。

這些建議，有的違反基本法，有的違反香港的主流民意，實踐已經充分地說明，預委會天馬行空，無法無天的言行；閉門造車，黑箱作業的作風，已經嚴重地脫離了廣大的香港市民，站在平穩過渡的對立面，使過渡期本已脆弱的民心更加吃了驚風散。爲了維護香港的利益，中國政府應着預委會立即停止運作，壽終正寢。主席先生，在一個談及預委會的論壇上，我想起一首〈虞美人〉詞，我改一改內容，覺得很符合港人對預委會的感覺，請讓我朗誦出來：「預委建議何時了，驚嚇知多少？香港昨夜又北風，民主不堪回首月明中。聯合聲明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九七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對於預委會的意見，中國是聽不入耳的。正如剛才譚耀宗議員所說，那些反對預委會的意見，是被視爲裏應外合。但是，請譚耀宗議員不要忘記，在反對預委會內，裏應方面，還有一個人大代表廖瑤珠；至於外合的，就有廣大的香港民衆。那麼，中國政府和預委會實在應該想想爲何在民衆中，甚至在人大代表內都會有人感到討厭，有人提出要孤立它？各位，如果你不信這個講法，就請有勇氣的出去做一項民意調查。但作爲一個民選議員，我必須說出市民的心聲，儘管這聲音依然微弱，但心所謂危，不得不言。此外，主席先生，對於總督的施政報告，有兩段說話是令我忿忿不平的，我必須作出回應。總督說，香港政制，是「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作主」。這樣的說法，簡直是顛倒是非，以爲人人都患了失憶症。3 年來，我和立法局的同事們，曾經有無數的動議、決議，被政府以行政主導爲名，否決得一乾二淨。施政報告把立法局抬舉，除了使人受寵若驚之外，更覺得總督所說的，是花言巧語，口是心非。

但我要批評的，並不在於此，事實上，我要批評的就是英國政府的確有機會，在香港真正實現總督所說的：「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作主」的局面。聯合聲明不是說過，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麼？但 10 年來，英國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反而與中國政府聯手去遏抑香港的民主進程，使香港帶着殘缺的民主體制回歸中國。這絕對是一個歷史的錯誤，是一個絕對不光彩的撤退。

彭定康在施政報告結束前，還說了另一段說話，說香港對於英國具有利害關係，畢竟香港是英國歷史的一部分。主席先生，請恕我直言，作爲一個中國人，這段說話觸動我的傷心處。這段歷史，是香港被迫分離於母體的歷史，也是受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從現代文明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在中國是屈辱，在英國也不見得光榮。但無論如何，這段歷史也將走向盡頭，走向終結，大自然有日出日落，而英國對於香港的管治，將是永恆的日落，這一點是必然的。

但日落之後，卻並不是黎明，仍然會是漫長的黑夜，對於那些愛國愛港，嚮往民主，追求光明的人，我們將會更堅定地走下去，夜正長，路也正長，黑夜既然給我們黑色的眼睛，我們就用它來尋找光明。對於香港，對於中國，我們將永遠地堅持着光明的信念和不息的奮鬥。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張建東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聆聽過總督的演辭及看過所附的資料文件後，我對該份繁重的《立法議程》的擬議內容特別印象深刻。細數之下，我發覺在本立法局任期屆滿前的最後一年內，共有 56 條新條例草案將會提出。其中一些條例草案涉及本港的主要立法範疇，例如終審法院、機場、私隱權、環保及歧視（我們現正就與此有關而互有衝突的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等。至於其他，則有一系列有關勞工事務、醫生註冊、離婚、銀行業、版權及專利等條例草案，這些條例草案諒會就現行法例提出重大革新。

我相信政府亦明白這個繁重的《立法議程》會令各位議員工作吃重，這不單是由於這些條例草案的數量和複雜程度，更由於這些條例草案須於明年夏天前通過立法程序，而任何無法在本立法年度通過的條例草案將自動失效。這一切的工作均集中在本年內進行，同期間很多議員可能要付出很多時間為下一屆立法局選舉進行競選活動。

我們都需要做好準備工夫，因此，我建議現在便應採取行動，以免到時出現問題。假如政府向立法局議員提出一項未經仔細研究及未經妥善草擬的新政策，然後又怪責議員遲遲不能通過條例草案，這是不公平的做法。倘法例有嚴重毛病卻獲得通過，日後必定問題叢生，法例亦因而須於日後作出修訂。倘有某條影響深遠的法例卻不獲通過，則受害者會是普羅大眾。有見及此，我謹促請政府必須做妥準備功夫。例如，在提出某條例草案前，政府是否已向可能受新措施影響的各有關方面作出全面及有意義的諮詢？更重要的是，上述各有關方面的意見或異議是否已作適當的評估或協調，而不是置之不理？政府是否已向法律草擬人員提供足夠資源？須知道在過去 3 個立法年度他們似乎工作過於繁重。我希望立法局和政府能夠共同釐訂出一個時間表，以便提出條例草案及進行立法，及使各方面都能夠盡量做好準備。

本港社會對於現在或在短期內行將退休的年長人士實在照顧不週。老年人應享有尊嚴及安穩的晚年生活。而對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的爭論已持續三十載之久。去年十二月，政府終於推出現時的老年退休金方案。可是，且不提該計劃所依據的計算方法，它實在缺點甚多，而政府在去年十二月正式推出該計劃時，很明顯連計劃的可行性研究也欠奉。我是眾多對計劃存有極大保留的人士之一。我謹促請政府及行政局各位議員切勿輕率推行這個未經深思熟慮及有欠週全的計劃。或許有人會問，為何政府會忽然匆匆地要推行這個計劃？總督稱這樣做是因為「統計數字說明，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本港老人數

目已十分龐大，增長又迅速」。我手頭雖然並無統計數字去反證有關本港人口中的老人數目，但我質疑是否有這個問題存在，而縱或存在，是否確實是那樣迫切。統計數字不會自我說明事實，而須由人們去闡釋。我們都知道，統計數字可以被利用就任何論點去穿鑿附會的。無論老人的數目是多少，也不表示他們全都有經濟需要。實際上，財政司以往曾多次指出香港在過去 30 年的經濟力量和發展，及本港市民的高儲蓄比率。從這些事實看來，怎能說本港有大量老年人，他們曾經長期辛勞，為香港創造今天的繁榮，自己卻工資微薄、積蓄有限、到現在身無長物，好像總督所稱，省吃儉用，為的是使子女將來有較好的生活，而他們的積蓄，都用在教育今日的勞動人口上，而沒有留作自己退休之用？

倘真的有老人遇到經濟困難，他們又是否長期居港的人士，抑或最近才到香港呢？對任何不論與香港有甚麼關係或會對香港有甚麼貢獻的老人，我們是否有同樣的責任去照顧他們呢？

此外，供款又是否如總督所說的那麼「適量」呢？我認為事實剛好相反，正如可行性研究所列的數目，是頗為驚人的。有關數目達到每年利得稅和薪俸稅收入的三分之一。讓我再問一次我曾問過的一個問題：該計劃究竟是供款抑或是新稅項？事實就是，無論這計劃的名稱是甚麼，一旦實施，就會將財富從社會上的某一群人手上轉到另一群人那裏，而數目之大是前所未見的。因此，必須為下列幾個問題提供令全體市民都感到滿意的答案。首先，採取這項政策的理由是甚麼；它的理論基礎為何？第二，計劃的範圍是否恰當，計劃作為對象的社會人士，以收取者及支付者的角度看，是否適當？第三，再從上述兩者的角度看，款額是否適當？

正如我所說，這些問題必須有滿意答案，因為實施老年退休金計劃是政府政策的一項重大改變，並會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會給香港帶來未可逆料的後果，又或者政府沒有將這些後果清楚說明。政府要市民承擔一個實際上是無了期的負擔，而計劃只在最近才提出，而且更有這麼多問題尚未能解答，這是否公平的做法？要幫助有需要的老年人，簡明而直接的做法是再改善現有的社會福利計劃。老年退休金計劃不能與社會福利混為一談。

香港人必須要應付兩項財政上的煩惱，那就是房屋及通脹問題。老年退休金計劃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只會令問題惡化。假如我們能將花在實施老年退休金計劃的努力放在對付這兩項問題上，無論現在或將來，我們都會得益更多。

我想現在討論公務員的問題。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我們必定認識到，香港有幸擁有一批高水準的公務員。雖然其中有不少人才由於移民和本地化的關係而流失，但成就依然超卓不凡。不論由誰人掌權，香港的成功之道，實有賴一個不偏不倚和有效率的公務員制度。香港若要保持現有的繁榮，便需要現有的公務員制度作為支持。

中英之間的分歧及本局內政黨之間的分歧將會持續，並很可能會在未來數年加劇。我認為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應以謹慎為重，以免「禍及」有才幹的公務員。我們任何人與公務員沒有兩樣，也會不時犯錯。雖然質詢政府人員有關政策和計劃是我們立法局議員的責

任，而這樣做，難免會突出他們的缺點，但我認為議員有做得過分之虞。我們只消留意許多政策科首長在本局回答問題時，為抵擋跟進問題的攻勢而採取的防禦態度，我們便會明白這樣所引致的對抗態度，對辦好事情有害無益。我建議各位議員在質詢政府時採取一種較溫和及較有建設性的方式提問，而希望政策科首長亦會投桃報李，給予更公開的回應。

對我們其中一些人而言，現在是擔任立法局議員的最後一年。正如我指出，我們將要面臨異常忙碌的一個立法年度。我促請本局同事，無論持甚麼政見也好，暫且將分歧擱在一旁，為着社會的利益同心協力完成我們的重要使命。對於立法局而言，本年度是關鍵性的一年，甚至可能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陳偉業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總督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演辭中，強調港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以此作為行政主導的政府健全和有效率運作的保證，而公布《政策大綱》則是朝向這目標的一項措施。總督一再籲請本局議員細心閱讀這份《政策大綱》，彷彿當中揭示了甚麼令人欣喜的政策或措施。本人因此亦不敢怠慢，將這份文件一翻再翻，初時以為「禾稈掩珍珠」，後來則深信裏頭只有禾稈草。

若果說政府增加透明度，就好比設立一條電視頻道，讓公眾藉着這頻道知道政府何時有甚麼新建設、新措施，那麼，今次的《政策大綱》就好比一份節目表。令人遺憾的是，這份節目表內沒有列出多少好節目，又或者，那些好節目並無清楚預告，不知應何時收看。這條新頻道、這個新節目表，未看時叫人寄望甚殷，看後卻令人意興闌珊。以下我將就基礎建設、工務工程、城市規劃及廣播等方面解釋我的看法。

首先，我想先講一些公眾引領而望的「節目」，依然是「不日上演」的。其中拖延得最長時間的，恐怕就是機場鐵路。機場鐵路不僅是新機場與都市聯繫的命脈，也是疏導葵青交通問題及解決地鐵彌敦道沿線載客量飽和問題的主要辦法。不幸的是，機鐵的工程在中英機場財務安排的爭拗下被一再拖延，如今即使馬上進行工程，機鐵也無法在新機場啓用時通車。這樣，新機場的啓用將可能導致葵青區及九龍西部路面交通擠塞的情況加劇，該區居民的苦況亦一再加深。自本年六月起機場財務安排協議的前景稍為明朗化，本來是一個契機去落實機鐵工程，沒想到今次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竟然對機場鐵路隻字不提。難道機場鐵路要待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才進行工程嗎？繼續延誤的代價不單只是交通擠塞帶來的不便和經濟損失，更包括機場造價的上升，政府有沒有清楚把握這個訊息，有沒有以此提醒中方，以便得到對方同意，盡快落實機鐵計劃呢？

同樣因中英關係不和而卡住的是九號貨櫃碼頭。民主黨早已表示反對在青衣與建九號碼頭，並在九二年總督發表他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前，已明確地要求放棄此計劃，改為加

速發展北大嶼山貨運港口。總督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演辭中說政策大綱包含了本局議員的多項建議，但我可以肯定上述建議並不包含在內。我更加肯定，若不加速發展北大嶼山港口，將進一步削弱本港貨櫃運輸業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世界第一位的聲譽和它帶來的經濟利益，恐怕會成爲明日黃花。工務司在立法局的簡報會中承認，北大嶼山港口的第一個泊位要到九七年終或九八年才可啓用，換句話說，起碼比以前預算延誤了半年，還要視乎與中方的磋商而定。難道這就是維護香港繁榮的工作嗎？反映出的是否一種負責任政府應該有的態度呢？九一年中英雙方簽署機場備忘錄的時候，我們已批評港英政府放棄了九七年前對本港重要政策的決策權，將會令大型建設的動工受到阻延。如今我們更清楚見到港英政府在餘下不足一千日的施政，將因當日的決定而顯得軟弱無力。

上述兩項都是在中英缺乏互信底下而被拖延的「節目」，但有些「節目」的拖延是叫人無法找到藉口的。當中首推的是市區重建政策的重整和計劃的訂定，自九一年立法局有直選議員開始，本局一再通過動議要求政府檢討市區重建政策，官員似乎都充耳不聞，竟然到今年才提出要進行一項全港各區重建潛力的研究，而打算在九四年提交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討論的文件，亦只會詳述市區重建所涉及的複雜問題，並無承諾該份文件已包含具體的建議。這種落伍的做法與改善土地資源運用的目標彼此矛盾，有負於舊區居民對生活環境改善的期望，並使市區住宅和商業單位供不應求的問題繼續惡化，助長了物業價格狂飆之勢。政府預期每年有 3 萬個新建私人住宅單位可以投入物業市場，而當中起碼一半，即 15000 個單位，有賴重新發展舊區土地。若果政府沒有一套完善的市區重建政策，包括安置和補償舊區居民的措施，則每年供應 15000 個單位的想法，只能是空中樓閣。

至於城市規劃條例，對於市區重建及眾多有關公平和妥善運用土地資源的問題，關係重大。三年多前，政府就城規條例檢討進行了公開諮詢。但諮詢到現在，有關的條例現時還未提交立法局進行審議。我們要再次對政府表示遺憾。因爲他在這方面又一次交白卷。政府在 3 年前就城規條例的檢討進行的諮詢甚爲大動作，如今卻如此怠慢，可能是因爲怕條例的修訂會觸怒那些既得利益的大財團。我們都知道審議一條複雜法例需要用上很長的時間，政府很應該盡快將城規條例的修訂草案提交立法局審議，不可將這項工作拖延下去。須知道九六、九七年會有不少因政權移交而需進行修訂的草案交予立法局審議，將城規條例的修訂草案拖至下一屆立法局才審議是不智的。本人期望政府可以加快這方面的工作進度。

在工務工程方面，本人雖然肯定工務部門以往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近年一再出現嚴重的山泥傾瀉意外、簷篷和拆卸中外牆倒塌，顯示急需改善的問題依然很多。決策科方面需要重新考慮一些項目的優先處理次序、並增撥資源。當然，不少問題是出現於制度上的。這些制度上的問題表現在 3 方面的關係上。首先是部門內的不協調，就以屋宇署爲例，我曾接觸過一些個案，該署的一個部門要求業主維修物業的某一部分，待工程完成後，同一業主又接到屋宇署另一些職員通知，要求他拆去物業的另一部分。該業主就因這先維修、後拆卸的不協調情況，蒙受了損失和不便。若果能夠加強部門內部協調，就能減少出現此等擾民的情況。

第二方面是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支援。以斜坡安全問題為例，現時涉及的政府部門起碼包括土木工程署、屋宇建築署、路政署和房屋署等。這些部門中專業人員數目參差，不同部門的人員在工作上雖各有不同重點，但亦有需要彼此合作和支援的地方，才能有效率地改善斜坡安全。這一點應該是全面檢討斜坡政策時需要注意的。

第三方面是政府部門對私人物業業權人、發展商、承建商和特許專業人士的監察。無論在斜坡倒塌抑或在清拆中樓宇外牆倒塌的事件，我們均發現政府疏忽了對此等人士或其委託人的監察，或者法例並未賦予政府人員足夠的權力，去促使這些人士根據法例或指引的規定進行他們的工作，這種不足顯然會令工程的可靠性蒙上陰影。

以上所講的幾方面，都是政策大綱沒有觸及的地方，本人殷切期望政府官員可以吸納這些意見，致力於改善工務部門的運作。

我現在想談談電視廣播的情況。

世紀末的廣播環境已出現急遽的變化——衛星、有線電視相繼投入本港的傳播事業。「多媒體」的發展令電訊設備亦可扮演電視廣播的功能。這種變化不單表現在日新月異的科技上，還顯現在廣播政治環境上；面臨九七，傳播界竟變得謹慎和自律。

看看今年施政報告，政府對廣播環境的轉變未有提出長遠、整體的政策，在不少重的關節上，要不是交白卷，便是乏善足陳。

今年兩間電視台均被民間團體指斥有禁播節目之嫌，一時新聞自由、編輯自主權的問題成為市民關注的焦點。但政府卻未有制訂相應的措施，讓市民放心。文康科表示政府很難以立法方式要求電視台播放某些節目，因為這種立法容易成為箝制、干預新聞自由的工具。廣播事務管理局又說該局無權強迫電視台播節目，因為不在其職權範圍以內。總之，港府的答案就是——無辦法！

我們當然知道要維持廣播環境自由的重要性和要尊重節目編輯的自主，但政府至少應在未來的工作重點中，作出檢討和研究的承諾。事實上，應否制訂相應的守則是考慮方向之一。另外，廣管局一直以來都是私下和電視台商議有關節目、電視台運作等問題。理論上，廣管局是代表觀眾市民監察廣播機構，但從兩間電視台「禁播」事件顯示，這種缺乏公眾參與、監察的過程有必要作出檢討和改善。

另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廣播環境的規劃問題。衛星電視已運作了3年，而港府亦可能就衛星廣播進行新的發牌。但是，一籃子的問題如廣播語言、跨媒體擁有權的問題、海外人士申請牌照的資格等問題，均需要政府檢討和訂立明確的政策方向。港府一直沒有把有關問題向立法局交代，就如廣管局批准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申請衛星電視牌照亦缺乏透明度。這種閉門式的決策過程亦不是一個向市民負責的政府機構所為。



此外，無線、有線、衛星電視廣播已成鼎足之勢，公營廣播急需重新定位並拓展其發展，若果說港台增加製作 19 個節目便是公營廣播的長遠發展，恐怕這種安排難以向市民交代。施政報告對這些問題作浮光掠影的簡報，相信只給人一印象是：「廣播政策在報告中是蒼白的一頁」。

彭定康總督在施政報告演辭中說政權移交之後，他將會在黑暗中遠去，回到老家。但我必須提醒彭督在他自香港政壇消失之前，他仍然有責任為未來香港的發展建立穩固的基礎，其中必然包括民生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廣播制度完善化。惟有這樣，「掌握千日·跨越九七」才不是一紙空話。

鄭海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上個立法年度，實在沒有甚麼特別值得懷念的地方。期間中英關係急劇惡化，香港政治前途的談判陷入僵局。最後，那既是符合港人意願，也是前任總督下了不少工夫希望能夠達成的直通車安排，亦告胎死腹中。我們再一次面對不明朗的前景，全港市民都無法逆料一九九七年立法局解散以後，會發生甚麼事。經過 10 年來的努力和談判，我們現在又要從零開始。這是極之令人失望的。再者，由於中英兩個主權國不能在香港改制上達成協議，以致香港出現一個政治真空的情況，任由不管是否可以代表港人意見的人來填補。這情況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莫大隱憂，尤其是一九九七年後立法局應如何組成的問題，更是令人擔憂。我認為中國應就如何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機構的問題，更廣泛地徵詢各界人士的意見。中國在構思這個新架構時，必須十分審慎，以確保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有一個可靠的立法程序。對於維持香港的治安及現有的生活方式來說，這是不可或缺的。倘若中英兩國能夠達成協議，我們便不用多花兩年半時間，再為同一個問題繼續爭論。香港在未來兩年半內，仍須面對種種不明朗的前景，實在令人遺憾。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曾就中英合作問題提出好幾項建議。平心而論，總督已跨出了一步，呼籲中英雙方在一九九六年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成立時充分合作。但問題是，他是否應對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給予更大支持？我認為預委會是否一個諮詢機構，是無關重要的，但預委會是中國政府設立的機構，而且極具影響力。我們必需確保預委會成員獲得所有有關的事實和論據，以幫助他們明白問題的複雜之處，以及令他們明白政府運作受到的掣肘。我們應該准許公務員與預委員會成員有更多接觸，但是，我們亦須要設立一個有系統的機制，以避免加重高級公務員的工作負擔，因為他們現時已每天工作 18 小時。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應確立一個適當的系統，以便：

- (1) 限制公務員每個月出席正式會議的次數，讓他們在奉召出席簡布會之餘，亦可以執行其日常職務。我們不能讓高級公務員整天為簡布會或答問大會東奔西跑。本港的司級公務員均身負重任，既要制訂影響 600 萬人的紛繁政策，亦要演出英語粵劇，娛樂廣大市民。我們必須慎用他們的時間，以免出現濫用的情況；

- (2) 確保所有會議必須公開進行，讓所有市民都知道所討論的問題及其他人發表的意見；及
- (3) 確保公務員受到應得的禮貌對待及尊重，我深信他們必定會受到預委會成員的禮遇。港人是不會容忍我們的公務員受到無禮對待的。

我非常明白為何我任職公務員的朋友均害怕這個構思。他們覺得倘若這個建議得到接納，便有可能隨時被預委會召喚，並予以公開侮辱。但不幸地，不論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於一九九六年與籌委會並肩合作。其實，如果能夠把時間提前 12 個月，並把工作程序編排好，便可以多出 12 個月的寶貴時間。這樣不但可以令我們的工作較為容易，而且過渡亦會較為順暢。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向公務員表示極大謝意，我亦深有同感。

我亦在此多謝坐在對面的同事，他們在香港歷史這關鍵的交接時刻，付出了無比努力、忍耐及專業精神，我謹此致謝。現在及將來的主權國着實有責任使香港能夠順利過渡，並確保議員的工作在一九九七年後有更明朗的發展。倘若我們沒有這群廉潔、富專業精神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香港便不會有法治，亦沒有公平及公開的選舉，更沒有「一國兩制」。很多高級公務員實際上可以明天便上任另一份工作，所以，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保留這重要的社會棟樑。

我很高興看到各決策科及部門在本年提出的《政策大綱》，這是一項嶄新的嘗試，藉此令政府更有責任感。我希望政府認真履行它所許下的承諾，否則，這些承諾只會淪為空洞的口號、陳腔濫調或政府大樓裏的舊海報。

現在讓我轉到一個我較為熟悉的話題 —— 經濟。由於我們容許本港的商業機構在法治的範疇內享有高度自由，香港得以建立起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系。我們一有機會，便進軍各個市場，毋須任何指引。只要政府維持只在基建工程及人力資源方面投資的政策，香港經濟將可繼續創出美好的成果。這是亞當·斯密的精神，而總督亦曾建議我們閱讀他的著作。我得承認除了他的一些著作摘錄外，從沒有細讀過他的著作，而且看過的也已經忘掉了一大半。我希望總督能夠告訴我應該讀亞當·斯密著作的哪些部分，才能明白甚麼是社會主義式的干預。我想隨着一九九七年逐漸臨近，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看看善意怎樣可以造成人類大悲劇。在《一九九四年世界競爭力報告書》中，香港排名第四，這是我們多年來努力的成果。但如果不小心的話，我們的名次便會急劇下降。政府必須盡量避免進行干預。總督說我們必須維持一個公平及有效率的市場，並且需要促進競爭，我絕對同意他的見解。我們必須看看現行的貿易慣例，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希望消費者委員會慎重處理。我不希望見到一些由對商業運作毫無實際經驗，而且沒有能力了解有時極為複雜的市場的人所寫出來的三流學術報告。政府亦須避免再加添提交報告的規定。我有時真的懷疑政府是否會閱讀政府規定公司和銀行提交的報告。

雖然香港經濟成就輝煌，但我們仍然有幾項須待解決的問題，包括通脹、基建及交通等。很多議員已就這些問題發言，我亦同意他們大部分的意見。香港已是個百物騰貴的城

市，我們不少生意亦已被鄰近國家搶去。但由於通脹是一個供應學派樽頸問題，不能一夜之間獲得解決，所以政府在短期內可以做的着實不多。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確保收費項目不再令市民百上加斤。對於將本港原來已極之短缺的勞工資源轉往更有生產力的用途，再培訓計劃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必須確保這項計劃達到理想的效果。至於基建方面，我們必須動工興建九號貨櫃碼頭及機場。如果工程再進一步受到拖延，香港對中國經濟提供服務的能力便會受到限制，屆時，中國和香港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很高興看到住宅樓宇價格在過去數個月開始回落。但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自置居所仍是遙不可及。而且我們不可忘記，樓價回落主要是由於實施了收緊按揭的政策，但這政策不單打擊投機者，同時亦打擊了真正的買家。香港現時積聚了大量市民對物業的需求，唯一可以紓緩這需求壓力的方法，就是增加土地供應。所以，政府必須研究方法，增加土地供應。

主席先生，作為老人工作小組的成員，我深感榮幸。我感謝總督接納小組的建議，撥出更多資源改善老人的生活。我是工作小組中兩位反對老年退休金計劃的其中一位成員，因為這項計劃未有正視幫助那些確實有需要的人的真正問題。我們必須為那些沒有退休福利又沒有足夠積蓄或收入的人，提供一個保障網，使他們在退休後能夠安享晚年。我支持在下個財政年度為真正有需要的老人擴大社會保障計劃。明顯地，對於已經享有退休福利的人，當局毋須再為他們制訂另一個保障制度。由於本局會就本題目進行辯論，我今天不再多作評論。

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其他方面，我對總督個人對弱能人士就業問題的關注，謹此表示萬二分謝意，並希望能夠將之存案。總督於去年就弱能人士的就業問題舉行高峰會議，不遺餘力地為我們社會裏不幸的一群人士，推廣就業機會。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在這方面亦表現出色，我很高興看到他們計劃舉辦更多活動，以提高社會人士對這問題的關注。作為康復發展協調委員會轄下職業輔導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我謹向勞工處的左陳翠玉女士的努力及工作熱誠，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先生，我並不相信我們在社會福利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經足夠，也不相信我們日後在這方面能夠做得足夠。社會人士對改善社會保障，以及為單身家長及其子女提供更佳照顧的期望，亦會經常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目前，香港遠遠不是一個福利社會。我們一直都非常審慎，但我希望商界人士緊記，我們在努力創造財富之餘，亦有責任照顧社會裏那些生活條件較差的人。我們必須加倍努力，而需要我們作出努力的地方仍然很多。讓我們對老年人、弱能人士及需要我們支持的市民，給予更慷慨的援助。

主席先生，本立法年度剛剛開始，雖然對於冷淡的中英關係及部分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僵局，我感到非常失望，但我相信香港可以克服這些困難。我們在過去 20 年間，曾經面對不少危機，但仍能安然渡過，並且建立起繁榮安定的香港。我相信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仍然可以取得同樣的成就。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馮智活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近年來市民的環保意識不斷提高。政府在這方面亦不斷努力，雖然是有進步，但可惜速度太緩慢。舉例說，維多利亞港水質管制區原訂在九一年成立，後來推遲到九三年，接着再推遲到九五至九七年，分 3 個階段成立。有關計劃足足遲了 6 年，亦有可能在九七年後才完成。

第二個例子是能源效益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自九一年成立至今，只會開過會，完全沒有實質的工作交代。九二年七月，本人亦曾在本局提出動議辯論，促請政府制訂全面的能源政策。今年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終於對此有交代，就是會進行自願性質的能源效率標籤計劃，以及在建築界方面設立關於能源效益的設計守則。這是節約能源工作的第一步。但這已是能源效率諮詢委員會成立 4 年後的事情。

第三個例子是對本港極重要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該計劃原訂在九七年前應該全部完成，後來政府在九一年十一月宣布因為缺乏經費要延遲至二零零零年才完成。現在第一期剛開始，要在九七年完成，前後遲了 3 年。餘下的第二、第三及第四期工程更不知何時開始。假如在九七年開始興建餘下的工程，則最快要在二零零二年才完成，整個計劃前後遲了 5 年才完成。換言之，我們的維多利亞港和其他海域要遲 5 年才可徹底解除污染的威脅。

第四個例子是關於空氣污染方面的。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空氣污染每下愈況。政府早於九一年想實施一個政策，就是規定柴油車輛轉用汽油。這項措施絕對是大大有助減低空氣污染的。不過，由於當時通貨膨脹嚴重，所以暫緩執行，但一放下，又擱置了很久。其實自九二年起，本港的通脹已開始放緩。在本人多次催促下，政府到這份施政報告才提及會開始再考慮這個計劃，但沒有說何時開始進行。如果在明年開始做的話，這個計劃又遲了 3 年，市民的健康又要遲 3 年才得到改善。

本人其實亦可以繼續列舉政府不能依時完成當初承諾的其他工作。不過，上述幾方面亦可反映政府在環保方面的誠意是有待改善的。

以下我想講一下關於污染者付費的原則。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在提及改善污染水質時提到，實施收費計劃不僅有助收回排污服務成本，亦能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這句話首先提及有助收回排污成本，其次才說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這正好反映出政府在推行污水收費及大力鼓吹污染者自付原則時所最關心的，其實只是收回成本，其次才是提高環保的意識。本人必須強烈地指出，污染者自付的原則，首要的工作是環保教育，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使市民醒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污染，其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從而鼓勵市民合作，減低污染，其次才是收回成本。但是，應用於其他的商業活動則不同，因為採取環保措施多半會增加開支，要商業機構自動自覺去做，實在十分困難。因此，在工商界方面，就要盡量多收一些污染費，甚至收回成本，才能使他們減低污染。

去年政府公布污水收費計劃時，引起市民很大的回響。大部分市民認為收費水平太高，甚至有人不贊成收污水費。可惜政府對民意完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政府片面地公布在諮詢期所得的結果，謂已取得大部分市民支持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接着就沒有再說下去了，並沒有公布市民是否支持政府的污水收費計劃。因此，本人在這裏再次要求政府公布當時諮詢期所得的民意。市民究竟是否支持政府的污水收費計劃呢？政府玩弄民意，不尊重諮詢期所得的結果，實在令人失望。政府不肯接納民意降低污水收費水平，結果必然令市民怨聲載道，對環保產生反感。須知污染者付費原則，首要的目標，就是希望市民支持環保，而當局的做法卻與這個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由於污水費是市民需要繳交的第一項環保費用。因此當局必須小心處理。如果推行得不順利的話，就會嚴重影響市民對環保的支持，不肯與政府合作。政府應接納民意，在收費計劃實施初期，降低污水費的幅度，使市民願意支持因環保而須支付的首項額外開支。政府可在稍後的適當時間，在市民願意支持時，再將污水費提高。

其實，政府所訂的污水收費計劃是很滑稽的。很多時市民會以為污水費佔水費一個非常小的比例，但政府的計劃竟然是會令二十三萬多的家庭所繳付的污水費，比原來所繳的水費還高。這個政策是完全不合理的，怎能令市民接受呢？政府在釐訂污水收費政策時，只考慮收回成本，而完全不考慮市民是否接受和涉及的教育意義。

此外，在九二年時，政府想在垃圾堆填區徵收費用，目的是阻嚇建築界不得將建築廢料傾倒在堆填區。其實這些建築廢料應該倒在公眾傾卸區，可作填海或其他用途。可是，當局的收費水平現時只是訂在堆填區開支的一半，而不是收回所有成本。政府的解釋是恐怕收費太昂貴，有些人可能會索性不將廢料運去堆填區，而非法傾倒。這個論據若成立的話，那倒不如不收費，因為要收費的話，便有人不願付款，除非收費非常低，才肯付款。所以，正確的做法是防止非法傾倒，例如加強執法和刑罰。

另外，政府又有計劃規定私人住宅僱用車輛，將自己家居垃圾傾倒在堆填區時，便要付款。但兩個市政局的垃圾車，卻不用付款。目前有很小部分的私人住宅因為種種原因，致令兩個市政局不替他們傾倒垃圾，他們要自己付款聘請清潔商清理垃圾。他們已經要就此付出一定的費用。如果僱用垃圾車到堆填區再要付款的話，那麼這變相要少部分私人住宅再付出額外開支。這顯然不是公平的做法。其實，政府可以很簡單地規定，凡是商業垃圾若傾倒在堆填區，便要付款，家居垃圾則不用付款。這是一個公平和簡單的做法。但不知為何，政府卻弄成這麼複雜，亦沒有一些原則。在此可以看到政府不了解民情，在計劃徵收污水費時缺乏準則。

再看徵收污水費的問題。工商界所付的污水費差不多佔有關的經常開支七成，而降低住宅的污水費所影響的，可能只是一兩成的收入（視乎如何降低，因為由住宅收回的費用，只佔經常開支的三成），為何不可將住宅的污水費再降低一些呢？一兩成收入，其實不會對收益有很重大的影響。

再看看垃圾堆填區的收費。其實這項收費的目的不是用來增加政府收入，而是阻嚇有關人士將建築廢料傾倒在堆填區。那麼，應該多收一點費用，才可起阻嚇作用。但當局卻又不是這樣做，只是收取很少收費，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希望政府在高唱污染者付費的原則時，要仔細釐訂一個公平合理、市民接受的收費制度。本人深信市民願意與政府合作，推動環保。

另外，本人想談談婦女政策和歧視問題。社會上要求男女平等的意識已日益高漲。從各民間團體在不同範疇要求政府消除各種形式歧視、保障婦女權益的行動中，具體體現了這種意識。但政府面對這種民間訴求時，卻有選擇地利用了民意，甚至歪曲了民意！

政府指市民較接受「循序漸進」的方式，因而以民意為口實，推出範圍狹窄的性別歧視條例草案。但讓我們弄清一個邏輯：民間團體在《男女平等機會綠皮書》諮詢期表達要求政府立法消除性別歧視，但這種要求絕不表示民間不支持一條範圍較全面的反歧視法例草案！況且，政府在綠皮書中並無諮詢市民，是否選擇性別歧視法，抑或全面的反歧視法，亦沒有徵詢市民究竟應否循序漸進，但政府卻強解民意。

另外，政府只是象徵式地增加單親家庭每月 200 元的補助金。這對單親家庭的實際幫助是非常小的，亦不能顯示政府究竟在單親家庭的政策上花了多少心思！本港低收入婦女所遇到的困難，不單限於家庭方面，還有就業、住屋方面的問題、醫療方面的保障、甚至心理方面的輔導服務。這些要求並不是零碎、個別的政策可以滿足的。所以，市民仍要求政府推行一套長遠的、整體的婦女政策。但今年的施政報告仍未能使市民如願以償。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葉錫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總督的施政報告沒有甚麼令我確信過渡期餘下的數年，會較過去兩年更有作為。

我亦難以想像他懇請與中國合作會落實為具體行動，但希望我是錯的。他向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矯飾的善意，能否獲得回應尚屬未知之數，但我希望預委會能作出回應。我從不喜歡預委會這個構思，但我相信我們須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廚房內有另一個爐灶，許多新廚子正圍着它。以我意見，舊廚子最好把成功的秘訣和菜譜傳授給新的廚子，否則，他們會把湯弄壞了，更甚者，可能連廚房也失火。不然，在聯合聯絡小組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總督除了能對本港內部短期及較狹隘的問題發揮影響力之外，對於其他事務他的影響力可謂微乎其微。這樣會使他真真正正成為他企盼擔當的香港市長，而不是他能力所及的政治家。至於更寬廣、更重要的問題，例如香港的國際地位、商業聯繫及跨越九七的事項等，則將會無了期地延宕。這怎會合乎任何人的利益——遑論香港的利益？有關政改方案的爭拗已成過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拆毀三層架構的政府，這樣不足 3 年內，政改方案便要投入歷史廢堆之中。因此，雙方總算扯平了。還有甚麼原因要繼續互相敵視和心生怨對？我們可否現在就翻開新的一頁，從新開始？

陷於僵局的事務，多屬技術和法律性質。憑着理性和合作的態度，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些都是非關政治的事務，不應成為政治撲克牌遊戲的籌碼——在這場遊戲中，香港註定是最大的輸家。只舉一個例子，且看法律本地化和法律適應化須要做的事情。律政司在其政策大綱中已點明這兩項工作。我們現在最少須制訂 22 項條例草案，將英國法例本地化，並須修訂逾 100 項條例。無論中英能否恢復合作，抑或香港獨斷獨行，在未來 3 屆立法會期內，目前的立法議程，再加上這龐大的立法工作，這項任務肯定是艱鉅的。若要避免出現法律真空，我們須制定一套計劃及一個清晰的時間表。

律政司的政策大綱中，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遺漏，亦是平穩過渡的基本要素。就是中港兩地司法上的支援和法律聯繫。雖然給予內地律師普通法的訓練是個好主意，但也不能填補在法律翻譯、兩地相互執行法庭判決及合作處理越境罪案等範疇所缺乏的健全而清楚界定的法律安排。在這些範疇內，香港與其主要貿易夥伴已有詳盡的安排，但諷刺的是，這些安排中，沒有一項適用於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未來的宗主國。

我現在轉談司法機構面臨的危機。我用「危機」一詞，並無誇張。屈指一算，在未來 12 至 14 個月內，高等法院將會最少有 8 位大法官退休。倘政府銳意於一九九六年成立終審法院，並假設條例草案得以通過——這點儘管仍有很多疑問——我們將需要增加 4 名大法官。高等法院因而共有 12 個空缺。此外，司法機構的政策大綱建議增聘兩名高等法院大法官，這樣，在不久將來，最少須委聘 14 名高等法院大法官。目前，高等法院及上訴庭的法官編制為 33 名。招聘 14 名法官填補空缺，招聘率相等於現有編制的 42.5%，這數字令人吃驚。此外，另有謠傳但未予證實的消息謂，高等法院會再有法官提早退休，情況更形惡劣。簡言之，在未來兩年內，高等法院將會嚴重失血，但現有血庫卻缺乏新血補充。單靠提升地方法院法官填補這些空缺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樣非但不能確保高等法院的質素，同時，更會導致地方法院案件嚴重積壓的情況變本加厲。雖然，在各級增設 5 個法院處理與人權法及平等機會有關的案件，是一個很值得稱讚的構思，但問題又隨即出現：何來新血？事實毋容逃避，就是司法機構嚴重貧血，需要深切治療。

面對高等法院無法吸引具才能的大律師加盟的情況，政府必須尋求富創意的補救和解決辦法。這些包括即時向海外積極招聘人才；放寬限制，使法官經一段合理的「過渡期間」，可重行私人執業；改善聘用條件；最後，撤銷限制具經驗及才能的律師受聘為高等法院大法官的歧視性法律條文。這樣，合資格的人選必然大增，但並不表示每個申請人都適合受聘，只是他的申請會交給司法人員敘用委員會考慮。畢竟，在政府服務滿 10 年的律師有資格被聘用，為甚麼私人執業的律師倒不可以？我想指出相關的一點，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律業已修訂，使律師可直接被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而事實上，已有一項這類委任。本港許多出類拔萃的法律人才都恰巧是律師，為甚麼禁止他們加入司法人員的行列？為甚麼我們嚴重失血時仍拒絕他們的血液？

我現在轉談法律語言的問題。很可惜，直至最近，政府仍未積極主動考慮這問題。對於一些有類似經驗的國家，如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及以色列等，至今仍未進行過比較研究。香港政府正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在最後一刻找到解決方法。由多名法官擔任主席的幾個委員會，最近完成了兩份報告書，其中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議，但俱為長遠的解決方法，需時 10 至 20 年甚或更長的時間才能達致。他們集中考慮只用中文或只用英文，互不兼容。若要在法院訴訟程序中只用中文，則法官、律師及與訟雙方均須通曉中文。但鑑於本港法官和執業律師不懂中文者佔很高比例，上述情況實際上極為罕見。

基本法規定除中文外，法庭亦可使用英文。這項規定賦予訴訟人憲法上的權利，可選擇使用中文或英文或兼用兩種語文來進行法律訴訟。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要做到這點，唯一的方法是在各級法院引入即時傳譯，加上各種設備，編製雙語版的法庭紀錄。這樣才是真正的法律雙語制，屆時，最佳的法律人才便不會因為不通曉中文而遭禁止受聘為法官。若把司法機構的本地化單純作為增加法庭使用中文的手段，則屬誤導和愚蠢之舉。若以為只修訂法定語文條例，便可使一切明朗起來，亦同樣愚昧。在新法例通過及生效之前，一切必要的支援架構及設備須準備就緒。

像其他許多事情一樣，政府在這方面依然是做得太少，也太遲。若要維護以普通法為支柱的法治，必須馬上正視我所提及的措施。我們必須勇敢和果斷，不能再猶豫不決，拖延下去。

法治是本港經濟成就的支柱，但若不從速做點事，我們的法治前景堪虞，可能淪為逝去年代中日久失修的殘垣遺物。

我現在轉談教育。對於總督及教育統籌司就改善幼稚園教育所提出的建議，我甚感鼓舞。我作為香港教育學院的主席，格外支持政府致力提高幼稚園教師的訓練和資格的目標。但政府需要尋找方法，去獎勵掌握更多技能的幼稚園教師。我深信幼稚園教育與中、小學教育同樣重要，而幼稚園教師所接受的師資訓練和薪酬，應與中、小學教師看齊。幼稚園教師的師資訓練，以往一直不及標準，只限一些短期、部分時間制式的在職訓練課程。許多學生完成中三或中五的學業，在毫無職前訓練下，便加入了幼稚園教師這行業，而中、小學教師則須要在入職前取得教育文憑。小學學前教育特別委員會已定出日後發展的明確路向，我們必須為在職教師提供更多深入的在職訓練，並提高入職前的水準，假以時日，由現時的文憑程度，逐步提高至最終的學位程度。沒有機構比香港教育學院更適合執行這項政策目標。香港教育學院院長告訴我，只要有充足的撥款，該學院可執行總督施政報告的承諾，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為 1130 名幼稚園教師提供師資訓練。然而，我們則擔心政府對這項計劃的財政承擔可能不敷實際所需。

何敏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會談談勞工的部分和醫療衛生的問題。



總督在施政報告內表示「首重經濟」，香港要保持亞太區金融及服務中心的地位，經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勞動力質素有重大關係，香港一直缺乏天然資源，今日成功依靠的就是人力資源。但勞動力並非純粹只是經濟性的一面，還有社會、政治的一面。

香港政府過去一直只強調勞工經濟的一面，只視之為一數字，純粹是一項生產因素，而不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人」。因此，當工業轉型，通貨膨脹時，便完全將責任推在工資增長身上，在商界游說下為求壓抑工資而輸入外勞。政府是否知道過去本港公司利潤的增長迅速也同樣會推動通脹？但政府去年卻在毫無壓力下減收公司利得稅。這種打擊勞工、將他們變成通脹代罪羔羊的做法，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在勞工界的壓力下，政府為了做一點門面功夫，便搞了再培訓計劃，但又同時繼續輸入外勞，兩項政策目標根本是互相矛盾。今年在施政報告中，政府表示會再擴大培訓名額，民主黨認為要令再培訓政策有效，必須逐步削減輸入外勞名額，否則政府所用的公帑，只會變成臨時性失業津貼。

至於勞工界長期爭取的中央公積金，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一再否決，同樣令人失望。過去當討論公積金時，政府一直以此計劃需要二、三十年才見成效為理由來反對。實際上要是 20 年前政府接納勞工界要求，到現在問題已經解決。政府一日不願意踏出第一步，繼續以此荒謬理由來推搪，這只會做成惡性循環，永遠無法解決本港退休保障問題。剛才黃宏發議員提到有些黨派可能是「洗濕了頭」，一直繼續要強行爭取中央公積金，不錯，這才是真真正正解決香港工人退休的方案！

民主黨原則上贊成老人金計劃，但長遠而言必須有公積金相配合。

在醫療方面我也非常失望。因為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是一如過往，只是提出了多項零碎的改善項目。最大的不同也只是在《政策大綱》中，提出了幾個目標，包括預防疾病、治療疾病和提高醫院與診所服務質素。遺憾的是，政府並沒有就這 3 個目標所提示的方向制訂具體的政策。

這些目標：預防疾病、治療、提高質素是一定對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 但卻是「高、大、空」，冠冕堂皇，說完等於沒有說過。

這不禁令我懷疑政府是否根本未掌握整體形勢和問題，自己也未知清楚，亦無誠意去制訂全盤計劃。

目標不應是「高、大、空」，應是可以量度的(measurable objectives)，提出一些不能量度的目標是沒有意義的。

施政報告提出的改善範疇，並沒有定下每項服務所要達致的標準，那麼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像奧運精神般，旨在參與，不論收穫與成績呢？總之做了，參與了便算數？

施政報告提出建議，包括要增加 950 張醫院病床及治療 77 萬名住院病人；但問題是治療 77 萬人是否合乎現實？增設 950 張病床又是根據甚麼準則去決定的？

政府根本未能掌握我們對醫院服務的需求有多大。我所說的需求絕不等如期望，是一個實際的需求。基於需求我們決定如何達致目標才是合理的政策。政策也就是政府要清楚告訴市民會如何全面的提供服務，準備提供到何種水平的服務。我說的水平，亦不是數量，不是多少張病床或住院人數，而是我們整體估計香港 600 萬人需要多少床，有多少人需要住院及多少人會使用公營服務？這樣才有計劃去提供服務，這才是政策。很簡單的一個例：我們民主黨的一些同事告訴我，市政局尚有一些康體政策，如每 1 萬人有一個壁球場；每 15000 人有一個網球場等。我們的醫療政策連香港 600 萬人要多少張病床，那裏需要有醫院等，都完全沒有政策去配合不同區域的人口遷徙、增長或老化等問題。所以我要清楚的提醒總督，他在施政報告應做未做的事為：（一）應給市民知道他對醫療服務及發展的一個「全局觀」，應全面及清楚地分析整個形勢；（二）列出要如何因應現實去解決各種問題和清晰排出優先次序；（三）應清楚指示政府政策科訂定清晰與合時的醫療政策。政策科的醫療政策中亦必須交代以下的主要項目：

#### (1) 醫院服務政策

政府先要評估全港對醫院服務的需求，了解各項服務和病床的供應，掌握各類服務與人手配合的情況。在制訂醫院政策時，應訂出如何配合人口遷移及老化的方案；訂出醫院內醫療科技發展採取的方向，以切合現時的服務需要。這一切基準都須由政府訂定，由醫院管理局執行。

我們一定要有配合人口遷移的政策才可使服務跟得上地區的需要。有這樣的政策，政府便可清楚知道和計劃新醫院；市民亦知道有政策可從，無須時常要爭取與建例如現時的北區醫院、將軍澳醫院等。由於政府沒有政策，所以不會跟隨區域的人口增長而自動自覺增加服務。

政策也要配合疾病模式的改變和地區的特別需要，使各專科及科技發展得以配合進行，所以我要求政府全面統籌各科的發展，以避免像現時一樣，幾乎全由醫院管理局作主導，甚至現時一些近於放任政策，只是隨波逐流，任由各院各科自由爭奪。聲大的便能多取資源優先發展，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情況。

#### (2) 基層健康服務政策

我們在較早之前，有一份基層健康服務的文件，但我們需要做的是全面評估，對於預防哪些疾病及基層健康需求有多大，以及政府在其中須參與的程度是要清楚訂明。就舉人口老化對基層健康服務帶來的影響為例，政府何時作出過詳細的評估？人口老化會為基層健康服務增加了很多方面的需求，而需求在不同區域有多大？政府若掌握了以上項目，才能計劃如何為老人的健康服務提供改善。現時雖然提及將

開設 5 間老人健康院，但由於缺乏以上評估，我們其實無法知悉這些健康院可以滿足需要此類服務人士的百分比，而這種服務未能接觸到的其他老年人士是否不在政府提供服務的範圍內？這些問題都須由政府親自解答。故此我認爲這些政策應訂明如何針對老人的各類健康問題及每項服務所使用人數，然後才訂定須要多少老人健康院或婦女健康院等等，而不像施政報告那樣只提及會提供多少間。

### (3) 人力政策

人力政策，很明顯在醫療政策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政府既然定了需要服務的類型、數量和明確提供服務所達致的標準後，就必須要根據各類醫護人員的需求，去供應有關人手，去訂定標準。這些標準除了保證可有足夠數量的醫護人員提供服務外，亦須在訂定時考慮到所需要的人手類型，這將牽涉到一些長遠政策的制訂（就如護理教育學位化是否政府接受的護理人力培訓政策）。倘若政府未能回答這些問題，則難保我們人力培訓政策方面的投資不會被誤用或浪費。其實，現在沒有一個清楚的人力培訓政策，在醫院管理局中往往是隨波逐流。任由不同的科系，自己喜歡發展哪些就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不能配合到全港整體的需要和有計劃的人力培訓。

最後，我希望提醒政府，就是總督在上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了的護理學位問題。他所承諾的 160 個學位，如果不可以在一九九五年開辦的話，這樣我們將會白白損失 1 年的時間。損失 1 年時間，即使政府拿多少錢出來，也不可買回。我希望政府在這個關鍵時刻，可以仔細考慮和決定告知專上院校，在一九九五年可以開辦這個學位課程。今天已是一九九四年十月，如果在九五年開辦學位，則九四年十月對專上院校而言，已經是一個最後需要得到政府綠燈的時候，希望政府能夠三思。

本人謹此陳辭。

陸恭蕙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

#### 負責任的政府

總督以「負責任的政府」這個標題來開始他的施政報告。他把這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列爲首要工作是正確的做法，但他所說的卻實在叫人深感不滿。在香港推行的「行政主導」政府這個概念本身存在固有的問題，因爲行政機關完全並非由直選產生；總督卻嘗試以行政機關應該對市民更加負責的說法，來緩和行政機關缺乏代表性的問題。

總督對於只憑本局議員質詢政府人員和有權通過或否決以立法或財務建議形式提交的政府政策，便可制衡行政機關擁有的「相當大的權力」，似乎感到滿意。就算對一個完全並非由直選產生的行政機關來說，這肯定也是不足夠的。

也許我可以就香港式的「行政主導」政府列舉一些例子。在未來 5 年內，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下的機場核心計劃的費用，將佔政府總開支的 25%；該項計劃將大大改變本港的面貌和環境方面的包容力，但政府卻從未就這類影響廣泛的計劃諮詢公眾意見，亦沒有對累積的環境影響進行任何評估，或提出其他可選擇的發展策略。此外，核數署署長並無權力審查臨時機場管理局的開支和工作表現。

我們的官員在釐訂政策的優先次序上，擁有廣泛的酌情權。總督並沒有說明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向市民交代這些權力。讓我們看看一個本局曾多次討論，並對整體社會有廣泛影響的政策範圍——規劃。如果總督確實希望使行政機關在更大程度上向市民交代，那麼，就以這個政策範圍為例，他便有必要在制度上確立連串的保障，以制衡行政權力和酌情權的運用。

例如，總督可建議制定法例，規定全港性拓展規劃和市區重建的工作必須諮詢公眾意見；也可建議規劃工作應受法定的管制；市民應有權取得規劃方面的資料；政府應進行公眾諮詢，以及制定市民表達反對意見的程序；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公開，以及應成立一個獨立機構，檢討政府在規劃方面所作的決定。

遺憾的是，在政府願意設立具法定支持的機制，使行政機關就其工作向公眾負責之前，「負責任的政府」一詞仍然只會是一句政治口號。

### 行政局和立法局

談到政府與本局的關係，總督提出一個問題：「世界上還有哪個政府，是沒有所屬政黨在立法機關內協助促使其政策建議獲得通過的呢？」我們怎樣看他這個問題呢？香港政府的執政黨便是並非由選舉產生的行政當局。那麼，本局的職責又是甚麼？你可以說本局應對行政權力加以制衡，也可以說本局是忠誠的反對派。可是，本局卻要設法運用微薄的資源，來制衡擁有莫大權力的行政機關。

再者，行政機關堅決認為，「行政主導」政府的意思是由政府自行制訂政策，釐訂優先次序；本局和市民因而便只是作出回應。要本局扮演這種作出回應的角色，正正反映出總督所說，本局只有權質詢政府人員，以及通過或否決早經制訂的政府政策。但政府可有考慮讓本局參與制訂政策的工作？歸根究柢，無論本局的組成是如何未臻盡善盡美，但仍是唯一透過直選議員而可以稱得上有香港人真正代表的議會。

相反，總督高高在上似的嘉許我們說，議員比以前提出更多問題，本局開會的次數也較 10 年前為多。更糟的是，總督告訴我們，他「同意商界繼續充分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十分重要的。由於我來自商界，對此感到高興。但我不明白為何總督把其他人通通摒諸門外？商界當然應該參與其中，但為何卻不讓其他組別的人士參與呢？

在施政報告的第 21 段，總督似乎認為推行民主可能導致各持不同立法取向的組別之間彼此關係緊張。若相信這種看法，謂推行民主可能令貧富之間，納高額稅項的人與不用納稅的人之間，以及持不同立法取向的人之間的關係惡化，就是把問題（若真是有問題的話）顛倒過來。

社會上，追求某一類目標的人與追求另一類目標的人之間，總是會出現緊張關係的。這是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改變的現象。問題的關鍵是，既然總有緊張關係，那麼怎樣才能予以最妥善地處理？

處理之道不外乎建立一套以壓制某一個組別，從而使另一個組別得益的制度，或是制訂一套可包容對立的意見，並對這些不同意見進行仲裁的制度。

假如確想制訂一套可包容不同意見，並進行仲裁的政治制度，那麼民主制度似乎在實際上是最穩定和最成功的途徑。若一個民主政府的工作為很多市民所詬病，也不會出現動亂，市民也毋須進行革命，因為市民可在下次選舉中投票攆這個政府下台。

這種政治上的穩定，有助推行法治，有助於保障產權，亦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簡言之，這對商界也有幫助。與獨裁政府比較，民主制度對商業較有利；獨裁政府不為人信任，政策朝令夕改，對私有財產、個人權利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並不恆久尊重。我並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政府是獨裁政府；不過，我實在反對民主不利於商界，不利於政府良好管治的說法。

假如一個政府想提出福利建議，或提供一個社會保障制度，這對公共開支當然會有影響，但香港不會就此而完蛋。不過，若說（總督似乎正是這樣說）民主本身或推行民主的步伐總會導致分化，則是十分錯誤的。民主表達不同的意見，使不同意見獲得正視，並使不同意見獲得協調。

主席先生，當總督使「那些為香港創造財富的人」與「那些投票決定香港的稅項的人」互相對立時，他究竟想討好誰？總督是來自一個具有民主議會傳統的國家；他在掌握重點方面竟然大錯特錯，實在令人感到詫異。

### 中英和中港關係

對於與中國的關係這個問題，不少同事似乎認為與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合作，便可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誠然，預委會可取得很多即使本局也無法取得的背景文件和機密資料。預委會由中國外交部部長領導，而中國外交部部長也同時領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並負責代表中國就所有外交事務與英國進行交涉。透過這些渠道，如果中方願意向預委會提供資料的話，預委會應該不乏資料。因此，我認為堅持要有香港官員出席預委會會議，也許只是着重形式，而並非有實際需要。如果中方希望預委會在其與英國和香港政府的交涉上有更大的參與，那麼，預委會參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專家會議便可大大有助達致該項目標。為甚麼不那樣做，卻堅稱除非香港官員可以出席預委會會議，否則中英關係便無從改善？

說到底，人們會根據預委會就主權回歸中國的過渡安排建議的優劣，對預委會作出評價。可惜，香港人至今仍未對預委會的建議有良好的印象。香港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社會。我們重視良好的意見；不論意見從何而來，只要是好的，我們便會看重。如果預委會提出好的構想，我們會予以讚賞，並希望這些構想可在適當時候落實推行。如果預委會提出差勁的建議，那麼這些建議受到嚴厲譴責也不足為奇。

我們現時與中國的關係欠佳，但這是否表示我們便要原地踏步？總督慨嘆：香港間或表現稍欠理想，也只是因為一些應該直截了當地從財政和經濟角度解決的問題，卻經過了冗長的討論還遲遲未有決定所致。請他不要光是嘆息。請總督告訴我們，這個政府本身還可以採取或準備採取甚麼行動，例如，為何不就法例本地化和適應化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時間表？我們不可以讓現時與中國關係停滯不前的情況全面影響我們急需進行的工作。

### 持續發展

我接着想談一談總督施政報告在如何確保香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方面缺乏遠見。在這方面，總督或行政當局似乎都沒有甚麼構想。這是刻不容緩的問題，否則香港很快便不會再有甚麼發展餘地，而我們的環境亦將糟透。面對確保經濟取得持續發展這項挑戰，我們需要在政治制度上作出調整。我希望規劃環境地政司在下星期向本局作出回應時，向我們講述他有何計劃。在這方面，就連中國也確認了地球高峰會議議程二十一；因此，我實在不明白為何香港不應就如何在長遠方面推行持續發展提出計劃。

### 總結

遺憾的是，由於時間所限，我無法繼續談論我想提出的其他很多事情。主席先生，這正是我出版《另類施政報告》的原因。此舉是想引起社會人士對本港政策的議程進行更廣泛的辯論。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人對政府的政策議程提出挑戰。行政機構不應視這種情況是危險或麻煩的；這是政府邁向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制度所必經的健康發展。此外，這也是市民和本局設法在公共政策的制訂事宜上發揮應有影響的做法。更理想的是，政府可藉此設立制度，以便在制訂政策的早期階段主動、積極地鼓勵市民和本局的參與。

主席先生，本人支持動議。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

### 整體方向

今年的施政報告為市民勾劃了一個政府未來計劃的輪廓。至於這項計劃的具體內容，則交由各決策科司級官員介紹他們本身的決策科負責的工作；我對此舉表示歡迎。

政府授權這些克盡厥職的政府高層人員，讓他們負責解釋當局需要做些甚麼工作，現在正做些甚麼工作，以及為何這樣做，這個決定是對的。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新一代很有前途的政府人員，將會帶領全體公務員進入下一世紀。

他們必須獲得鼓勵以便擔當領導的角色，制訂政府的政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為實現這些已公布的目標負責。

我以往曾批評當局陳述政府資料的整體手法。但一九九四年施政報告那份《工作進度報告》的附件令我不再作出批評，反而轉為向政府致賀。效率促進組已做了很多工夫，改善當局在陳述資料方面的水平，鼓勵提出服務表現承諾；在釐清問責性這個經常被官僚主義籠罩的概念上，表現極為出色。

我今天會集中討論經濟，但也會談及另外一、兩個課題，其中包括公務員的問題。

## 經濟

「首重經濟」是總督施政報告內一個以黑體排印的標題，該部分的內容談到香港傑出成就的根本所在，這份施政報告確是看來把經濟放在卷首部分，但以內容的細節和應獲的關注程度來看，卻並非放在首要位置。實際上，施政報告主要談及社會和福利的問題。

在日趨複雜的社會，有很多問題均須優先處理，我明白政府在作出平衡取捨時所遇到的兩難局面。不過，我亦有時留意到我們似乎逐步遠離那些一直為市民取得這種成就和使他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成功政策。

過去的「放任政策」，由「積極不干預政策」取代，而該項政策又已經變為「最大的支持，最少的干預」。不論當局現在奉行哪一種主義，都不應該以對某些界別的人士作出政治讓步為基礎。

讓我們緊記，香港能夠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繁榮的地方，實在有賴香港市民與企業家出色的夥伴關係。

政府的任務僅限於提供比賽場地和擔任裁判而已。提供比賽場地的意思，就是建立基本設施，並制訂清晰、公平和干預最少的比賽規則。擔任裁判，是指確保香港是一個充滿關懷的社會，在工業安全、衛生、教育和消費者保障等方面都具有適當的標準。這個任務並非意味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政府官僚架構，或透過徵收更高稅收這種人為的方式來分配財富。

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和今後的日子，我們須處理繁重的立法工作。我希望政府能把所有在構思或制訂階段的法例，告知本局。然而，政府切不要掉進以立法作為解決每項問題的陷阱。如果這樣做，便會把香港變成一個規管過多的社會，而我們現在卻要處理大量工作，令現行法例符合基本法。據我所知，共有 550 項法例將會進行修訂。

我當然知道在立法計劃內有些建議須盡速處理，並應該予以支持。機場條例草案便是須優先處理的事項。終審法院條例草案也是一樣——我們現在便應該根據聯合聯絡小組達成的協議着手進行有關工作。正如我曾在本局說過，商界人士和市民都必須認識法例，維護法紀，而且我們必須以有效的刑罰制裁觸犯法紀的人，而不是營造一個更複雜的規管環境。主席先生，我經常因為司法當局對觸犯法紀的人處以低水平的刑罰而感到意外。

### 通貨膨脹

現在我想轉談通貨膨脹這個仍然令全港市民關注的問題。不錯，本港的通脹已經稍獲紓緩，但若與亞太區內的眾多經濟體系比較，我們的通脹率仍然處於很高的水平。香港是亞洲區一個重要的商業、旅遊和會議中心，我們必須保持這個地位，絕對不可以讓通脹數字持續困擾所影響。若謂因中國的生產成本較低使本港貿易保持競爭能力，這個論點並不充分。

政府仍然希望說服我們，叫我們相信打擊通脹的方法有限。連續 7 年以來，我們一直促請政府在勞工短缺這個直接影響通脹的範疇上多做點工作。

今年三月，財政司形容我們的勞工短缺問題非常嚴重。那麼，究竟政府有何對策？政府的做法就是准許從中國輸入 250 名專業人士，並在稍後階段再輸入 750 名。主席先生，250 人這數目還不及本港勞動人口的 0.01%！這絕不是一個行政主導政府應有的大膽措施！

對選擇性地輸入勞工實施更具彈性的政策這個論據至今仍是最具說服力的。無論在本局或本港勞動人口之間這都是一個引起意氣之爭的問題，但我並非主張不加選擇地輸入勞工。我完全接納任何計劃必須在「受到限制和控制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實有需要和必須對某些行業放鬆多一點。

舉例說，酒店業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業中心和旅遊點而言，起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八月份的 12000 個勞工名額中，酒店業只獲分配 152 個，以取代一九九二年的配額。這足以顯示現行的安排是多麼不足夠和充滿官僚作風。主席先生，本港經濟體系內這個行業竟然可以獲得這樣差勁的對待，實在意味着政府完全不明白這個行業的需要，而且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是不明白服務行業對本港經濟增長何等重要。

即使將現時全港性的輸入勞工配額增加 1 倍，本地勞動人口的增長也不足 1%。謂這會影響香港人的民生，是說不過去的，而現行計劃也不會如一些反對者所預測的對本港「社會服務」造成負面影響。一直以來，濫用這項計劃的情況實在很少。

主席先生，政府有責任向市民解釋，現時我們身處的螺旋式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向下侵蝕市民購買力的樓梯，而並非可以令我們財源滾滾來的向上自動扶梯，同時縱使可以這樣做，也僅是曇花一現的景象而已。



勞動力的流動是全東亞地區以至全世界常見的現象，香港應該也不例外。生產工作可以遷往工資成本較低的地區，但位於尖沙咀或中區的酒店，以及灣仔的會議中心卻不能遷往別的地方。

主席先生，當局正要求各商界人士接納旨在為勞動人口提供更佳保障的大量新法例；我完全接受其中一些法例，認為是正確和必需的。當局也要求商界支持老年退休金計劃。但商界又獲得甚麼回報呢？如果政府聽取商界就勞工供應這項問題提出的意見，便可能在退休金計劃方面獲得更多支持。商界有很多人士覺得政府若在勞工供應等其他範疇沒有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們便很難支持退休金計劃。

### 公務員

現在我想轉談公務員問題。《工作進度報告》已談到本港公務員在過去數年的成就，我謹向他們致賀。特別一提，現時在多個部門推行的服務表現承諾，已大大提高政府的效率，並鼓勵公務員視香港市民為政府的顧客，給予他們顧客應得的待遇。

我們擁有一群盡心竭力、克盡厥職的公務員，令不少地區欽羨。市民可以充分相信，在香港過渡至中國主權之下這段期間，公務員會繼續擔當重要的任務。其中亦包括警隊和其他紀律部隊，他們都值得我們給予全力的支持。

當然，要做的工作總還有很多，而且在促進效率、找出和消除各種官僚習氣和缺乏效率的情況方面，亦有不少改善餘地。我希望決策科司級官員會全力支持效率促進組的工作，繼續給予該組強大的權力，以便能順利完成任務！

主席先生，請容我提醒各位，縱使行政主導政府的意思不易界定，但有一點很重要的，便是本局不應超越其負責監察政府表現的法定角色。

如果本局議員只顧為了政治目的而着意吹毛求疵，造成反效果，這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

我們歡迎高級公務員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但不希望公務員將所有時間都花在向本局作報告，而不是在處理自己的工作。

### 結論

主席先生，在總結時，我希望簡單地談一談與中國的聯繫。

今午我剛從中國回來；我是前往中國參加一個經濟會議的。中國的決策官員和經濟學者均以非常坦率的態度評估現時和未來的情況，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中國短期內仍會受到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困擾，但長遠來說，我仍然有信心即使以東亞的標準而言，中國會繼續取得平均水平以上的增長率。此外，我亦深信香港企業家將會一如以往所扮演的角色，繼續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

我們與中國在實務方面一直合作無間，正如公務員訪問中國的計劃也同樣取得進展。我相信這種實務方面的合作應予以加強。然而，有關由一九九六年開始與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建立非常密切聯繫的計劃，卻並非甚麼新措施，因為在聯合聲明內便早已預見這一點。我認為市民會樂於看到有關方面就現時至一九九六年期間加強聯繫這點作出一些具體公布。政府可否在制訂基建計劃的規劃合作方面採取更大膽的措施？有關與預委會的關係，我相信市民會歡迎雙方有更多正式的接觸。最近政府向公務員發出通告，列出非正式接觸的一些基本規則，此舉在本質上似乎相當官僚。

除了這些問題外，我們必須繼續竭盡全力，加強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聯繫。這些聯繫對保證港人今後有蓬勃的發展，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繼續擔當重要國際商業中心的角色，仍然至為重要。

主席先生，我有信心只要以開放的態度，尋求在各範疇上與中國互相合作和尋求諒解的途徑，香港便可保持上述的角色。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代理主席杜葉錫恩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李家祥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掌握千日·跨越九七」。自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已明確打算將香港主權及 600 萬人交回中國。不錯，英國若以強勢去主導本港的行政，憑着我們優良忠誠的公務員隊伍作為後盾，或者仍然可以「掌握」在港最後的千日管治，但在第「一千零一夜」，沒有一套中國確認的政制，政權及香港人的命運，根本就毫無可能交到香港人的「掌握」之中。

《天方夜譚》的傳說裏，有位機智的宮女，她向那個聽到不順耳的故事就要殺頭的國王每夜講一個動聽的故事，講足了一千零一夜，最後不但自己可以逃過被斬頭的命運，更拯救了其他平民的性命。平情而論，總督的施政報告，可以算是說盡好話，對中方「傳言寓意」，雖然顯得有點不情不願，但總算是用語謹慎，姿勢友好。這對長期厭倦中英爭拗的港人來說，可以暫時鬆一口氣。

好的故事聽的人自然眾多，但在實際情況下，唯一可以在聽後又能改變香港未來命運的，就只有中方。而中方的預委會在施政報告一出爐後，即提出臨時立法會這個新爐灶，明確表示沒有「千日跨越」的餘地，甚至乎九七年前和英方合作籌備特區政府的信心也沒有，若果故事沒有更突破性橋段，相信結果已經可以預料。

或許英國只是想對中方擺個虛假的休戰姿勢，但其實仍暗中在佈局，進行典型的翻版殖民地撤退策略(decolonization strategy)。簡單來說，可叫「卸責三招」，即先耍出一虛招「還政於民」，擺成將政權交回有民選基礎的港人；做成假象後，立即又一招「一走了之」。九七過後，港人政權「掌握」不穩，政治抗爭無休無止，就在最後耍出第三招亦是最厲害的一招——「關『英』何事」，將一切責任推在港人自己不爭氣、中方的強橫無理頭上。

以往百多年來，港府施政都採取「英國確認、港人接受、以及中國默許」的原則，但英方在六四事件後明顯的全面調整了在香港事務上的政策，再完全不理中方的反應，借部分港人的民意，單方面地去做好為交還香港主權後的「卸責工程」，將港人陷於中英角力之中，使港人成為無奈的「夾心」人。

不少政論家比喻總督政改方案為一場中英的豪賭，損失卻由港人付帳。政改方案現時已塵埃落定，雖然賭局依然在進行，但也應該是「算帳」的時刻。

- (1) 機場延誤：根據政府資料，若香港新機場在九七年未落成而延後 1 年，會損失 30 億元，而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落成，累積損失估計達 4,000 億元。
- (2) 九號貨櫃碼頭：根據政府資料透露，九號貨櫃碼頭若未能在九五年中落成，以最壞計算，香港由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六年的經濟損失將達 300 億元。
- (3) 怡和公司的部分撤離：怡和系公司的上市市值超過千億元，將股份的上市地位及營運總部搬遷到新加坡，令本港失去不少就業機會及數以億元計的稅收。
- (4) 新功能組別：以過億元去強迫僱主登記只能推行兩年的 9 個功能組別，即每年要花費 5,000 萬元，簡直勞民傷財。
- (5) 爭拗成本：司級官員在立法局回答議員的質詢，每一條問題是 27,000 元成本。頂級公務員集體去費盡心神處理中英爭拗的時間成本可想而知。

粗略的估計，可見中英爭拗使香港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若果英國不願打破這個悶局，將來香港要付的代價可能會更高，預計公務員軍心不穩、金融動盪，將是未來政府最大的挑戰。

政客或可以「走位」求存，商人或可以「走資」來保存實力，但公務員卻除非「走人」，否則只有乖乖的去走一條上級指示下來的路。

總督是本港的行政首長，但卻非港人選出來的，如果他本身中立為港人，整個公務員架構亦會忠誠和中立地為香港人服務。若然總督仍不脫政客本色，只顧面向英國選民，用執政黨的一貫手法在香港推行一些英國人最容易明白的主觀政策，便會很容易的慣性地御用官員去「掌握」政府，將強大公務員隊伍擺上前線，對付中方和不同意見的本局議員。

施政報告高調地為公務員隊伍打「士氣強心針」，但隨即發出與預委會接觸的規限。公務員事務司再公開表示，受到中英之間的關係影響，部分高、中級公務員可能在接近九七年前提早退休，有部門甚至可能出現斷層，種種跡象，已清楚響起警鐘。

在中英關係不和的夾縫中，港人可以「掌握」的已着實不多，忠誠優秀的公務員隊伍，更是港人仍可賴以保持有限度平穩過渡，跨越九七的最寶貴資產。本人殷切期望本局同事，高叫他人「收口」之餘，亦要不忘自我節制，對於很有禮貌和忠誠的公務員，要多點尊重和鼓勵，更要積極監察港府的「強人」政策，不要讓它施展幕後黑手操縱，影響公務員的客觀中立判斷和士氣。

總督在政改方案通過後，即時強調要和商界加強溝通，但到現時仍原地踏步，完全交白卷。

施政報告擺明「首重經濟」。中方更說，經濟才是最重要的政治考慮。可見雙方都重視經濟價值。其實，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會清楚政治和經濟根本就分不開，會以積極的政治手段保護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令市民生活得以穩步改善。在九七過渡期間，商界信心就要依賴中英雙方共同負責去保護。

在處理九號貨櫃碼頭事件中，中英雙方都以政治考慮為前提，港人的經濟利益為後話，最終弄成僵局，寸步難移。港府更以本身信譽為理由，不肯以靈活的手段嘗試以商業原則解決問題。按香港總商會的估計，九號貨櫃碼頭不興建，九七年後的未來10年，香港經濟損失達1,600億元。中英雙方這「一啖氣」是否值這麼多？講一套做一套，算不算是「倒行逆施」？難道港人心中無數嗎？

本人曾在一九九二年財政預算案辯論中說過，商界在很多國家都屬於小眾利益，因為商界就是經濟命脈，保障商界利益就是保護本地的整體經濟。本人認為商界都普遍相信英國在部署撤退和卸責之餘，不經意的產生另外一種副作用，就是間接地積極培養一批不熟悉本港金融經濟事務，比較傾向單料去渲染民生重要性的「基層政客」，作為九七年前的政權，即行政及立法兩局接班人，好讓英國有藉口從容引退。若然港府已不再可靠，再由這群代表基層利益的政客去間接執政，來管治一個高度複雜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商界極不放心。這種想法實在可以理解。面對不容樂觀的前景，要是他們其中一部分因此而使出自衛本能，提高借款，將本身資金調離香港，以策萬全，一而十，十而百，若成風氣，那時港元聯繫匯率將會首先受到重大考驗。

施政報告用很大篇幅陳述現有民生政策如何在明年推行。本人樂意稱許施政報告中的福利部分，認為已接納界別人士意見，根據緩急首先提高單親家庭及兒童公援標準金額，採納老人服務工作小組大部分的建議。在綜合援助金額方面，亦顯示仍持開放態度，未作否定。反而要注意的是政府似乎偏向直接「派錢」而忽視其他服務配合的重要性。由於時間有限，本人只能摘要地敦促政府盡快將康復綠皮書變為白皮書，切實訂下政策目標，追趕已落後的康復服務。在老人服務方面，本人將在十二月初，以快將面世的工作小組報告書為題，提出動議辯論，不讓這項重要的配合服務，埋藏於廣闊的施政報告辯論中。

至於施政方面，是否如一些評論所說，大灑金錢，或是遠不足夠？施政報告中所載的財政成本資料其實並不足夠，以本人的會計專業資格，以及在福利界別內的多年經驗，也未能妄下定論，而政府未能及時向我提供所有有關的成本資料，在這件事上，我唯有留待財政預算案辯論時再跟政府「算帳」。

本人欣悉港府已獲中方同意，引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期望政府將來以寬容的態度，並以兒童的需要為基本毫無保留地引入這份並無法律效力的約章，並且藉此機會呼籲政府毋忘本人在一九九二年初曾就《青年約章》在本局提出並通過的動議，要求政府全面檢討現有的法例、政策，以及教育措施，以符合《青年約章》的原則，希望政府能在明年年底舉行的《青年約章》檢討大會作出詳盡報告。

政府在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公布第四號教統會報告書，建議實施試驗計劃，進行甄選和鑑別本港約有的 2 萬個天才兒童，跟着再發展將來的配合培訓方式。4 年已過，經一班學者及家長的長時間艱苦努力，甄選了數以萬計有潛質兒童。第一批的資優兒童已在本月呱呱墮地，但本人出席他們的家長會座談，以「政府的配合政策」為主題發言時，面對家長們欣悅心情、熱烈的垂詢，竟然發覺自己無言以對。因政府對這班資優兒童的政策在 4 年內沒有進展，令參加的「樣本學校」無所適從，又因為缺乏前景及實質支援，令不少好的「樣本學校」寧願放棄參加這個計劃。

近期兩次舉行的培訓計劃，只得 4 名老師參加。政府好似一個「不負責任的爸爸」，發動一大班大專院校學者，熱烈為它推行試驗計劃，懷孕 4 年，到第一批資優兒童誕生後，卻視而不見，生而不養。

政府及教統會應立刻正視這事，盡快會見有關「樣本學校」及家長，作出積極跟進安排。

餘下九百多日，港人不期望總督臨走前每日虛應故事，實在仍然掌握在各人手中的，仍是每個合作機會，去重建港人信心。

在英國方面，應對事不對人，不要再做鴛鴦，讓預委會獲得應有的禮貌及尊重，確認其工作在九七後對港人的重要性。當機立斷，在合乎法治及商業原則條件下，彈性處理重大經濟問題。中英應盡快共同公布聯絡會議議程或其對港的相關影響，使港人有所準備。

港府方面，盡量放寬公務員與預委會的合作規限，預委會若沒有資料及缺乏客觀中立意見的協助時，只有被迫「閉門造車」。輸的是誰？輸的仍然是港人的信心和未來命運。這是否值得我們去賭？民生方面，亦應積極和中方商討，令居者有其屋。我支持黃宏發議員的意見，但因時間所限，我要遲些才再討論。我希望改善綜合援助，提供有效退休保障。

中方方面，應可更主動廣納意見，在另起爐灶之餘，亦應信任及尊重現任立法局議員作為主要的民意代表。九七年後立法會要經確認過渡時，盡可能對現任議員投信任票，代替那些費時失事的重新選舉。就算必要臨時委任，亦應先考慮在界別內由其他自由公開選舉形式產生出來的現任或前任代表，例如各區的區議會主席、功能組別的公會會長、執委會主席等，以增加立法會的名望及公信性。

憑着港人的堅毅，九七必可以安然跨越，中英要「掌握」的是面對將來歷史評價。施政報告並非總督私人作品，而是整體公務員勞心勞力的結晶，代表對市民解釋的誠意及一年的辛勞，我想借此機會，衷心感謝他們的忠誠及努力。

本人支持動議。

夏永豪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以民生為主要問題；而民生問題之中，又以老人問題最受關注。畢竟，老人人口逐漸增多，隨之而來的問題亦須優先處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他民生問題如教育、房屋、醫療等亦是市民大眾所關心的，與社會的繁榮安定息息相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教育被列為改善「日常生活質素」的一項，所佔的篇幅是各項民生問題中最小的。但教育的功能是培育社會的下一代，在達致建設社會，促進社會繁榮進步的目標上，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

經過過去 30 年的大力擴展，教育在「量」的方面已經有可觀的增長，基本上可以達到「供可應求」的地步。現在市民最關心的是教育的質素能否追上時代的要求。關於這一點，本人已在立法局及其他場合多次論及，而政府亦表示這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所以現在不再重複了。至於政府是否有誠意和決心去提高教育質素，本人認為可以從幾方面去看：

#### 一、教育經費

教育經費的實質增長應至少不低於經濟增長的幅度。據施政報告中所示，本港今年經濟的增長率是 5.7%，但政府明年的教育開支則只有 4.5% 的增長，較去年 6.1% 的實質增長還要低。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肯定了過去 10 年的經濟增長，認為一直維持驕人的成績。經濟有可觀的增長當然令人鼓舞，但經濟增長卻沒有使教育經費同時增加，則令人非常失望。據統計數字顯示，台灣 5 年前的教育經費是國民總產值的 5.3%，但香港近年教育經費的增長卻不足國民總產值的 3%。由此可見，香港的教育經費遠遠落後於鄰近的一些國家。香港是極其倚賴人力資源的國際商業城市，政府應該提高教育撥款，肯定教育在培育人力資源的地位，使香港的經濟增長得以維持。

## 二、教育規劃

從社會投資的角度來看，教育的回報期是比較長一些。今年九月入讀小學一年級的學生要二零零五年才中五畢業。所以教育的規劃一定要有高瞻遠矚的精神，至少要提前二、三十年作規劃，才能稱職。看今年的施政報告，似乎不見有這種精神的體現。或者有人謂政府有九七政權轉移的心結，不應對它有過高的期望。對這一論點，本人不敢苟同。因為無論政權的移交帶來甚麼的問題，社會對人才的要求都是一樣殷切的，而一個受劇變衝擊的社會更需要高質素的人力資源去應付。因此，今天的疏忽，今天的短視，今天的吝嗇，就必會是將來的禍害。所以，今天的港府在忙於為交接而操心的時候，也有責任為未來作出長遠的規劃和承擔，這才可以為將來的繁榮與安定奠立根基。

在教育的規劃上，欠缺長遠承擔的地方不少，舉例來說，基礎教育中仍有多項問題有待解決：如中學仍然有浮動班制、小學全日制的計劃等未有任何的承諾，遲遲未有解決的辦法，本人對政府的態度非常失望。

## 三、教師的地位

長久以來，政府對教師地位的忽視，做成了今天教育質素低落的死結。其實政府內部不乏有卓見的高官，他們其中不少本身是家長，了解到問題的真正所在。不過，他們的好意永遠過不了財政司這一關，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清楚說明了這種情況的存在。

在報告中，總督提出幾種提高教師地位的建議，可惜的是，這些辦法都是「慳水慳力」的「門面工夫」。建議未能針對教師流失問題作深入探討。施政報告中建議製作電視特輯、舉辦教師日、頒發優秀教育獎等以提高教師形象，吸引更多優秀的青年人投身教育行業。本人認同此等做法不錯有一定的作用，但卻認為不是根治問題的最佳方法。近年學校在聘請教師方面遇到不少困難。以中學來說，其中以英文科、經濟科、電腦科等的教師最為短缺。以英文科為例，差不多 80% 的教師都非英文系的畢業生。教育隊伍中缺乏專才，對學生的影響自可想見。我們如何能吸引各系的專才投身教育行業呢？在職的教師，又如何留住他們呢？歸根究柢，還是應從提高教師的薪酬福利做起。政府應盡早實現津校教師與官校教師的大致「同工同酬」。在改善津校教師的附帶福利方面，本人一向有如下的建議：

在公積金方面，應逐步拉近現時中、小學教師與大專院校和工業學院各種教師的公積金津貼的距離。首先可將現時首 5 年 5% 的僱主公積金津貼提高至 10%，而 5 年以上則提高至 15%，因為現時後者即是津校的教師無論年資多少都輸蝕，但譬如在工業學院的教師，他們不論年資多少都一律享有 15% 的津貼，這實在比較津校教師優勝得多。

在房屋方面，應拉近津校教師與官校教師在房屋津貼的距離。本人認同推行為津校教師而設的「供樓利息津貼計劃」的精神，但此項計劃的每月津貼極為有限，甚至可以說是聊勝於無，與政府的「公務員居所貸款計劃」相比，差距極大。所以本人建議政府應津貼津校教師買樓的首期及同時提高每月的供款額。

在醫療方面，津校的教師完全不能享有任何福利。本人到立法局開會時，常常有很大的感慨：看到停車場穿着整齊制服的政府高官的司機在等候開車，不禁要問自己，難道為高官開車的司機值得有醫療福利，而教導他們子女，為高官子女授課的老師就不值得有醫療福利嗎？政府可否倣效一些大專及工業院校現行的醫療計劃，由僱主替僱員購買集體醫療保險呢？

所以施政報告所提出的各種提高教師地位的「計」，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掩眼法」而已，難道政府以為用這些把戲，可以蒙着教師們的眼睛嗎？

#### 四、幼稚園教育

在施政報告中，政府承諾動用 1.63 億元加強幼稚園教師的培訓課程。本人對政府在幼稚園教育的突破，深表高興。但如何落實師資培訓，施政報告中未見有較詳細的描述。作為師資培訓的教育學院，最近因講師轉職而引致教師人手不足，實令人對幼師培訓感到憂慮；畢竟，熟悉香港的幼兒教育專家實在太有限了。

此外，施政報告又迴避了學前教育統一領導的問題。在現時的政策下，學前教育分別統領於教育署及社會福利署兩署之間，引致頗多的交叉重疊。施政報告中完全沒有交代這個問題，亦沒有為統一領導制訂時間表，實令本人失望。

有關增加學前教育對教師的津貼，是教育界和家長長久以來的要求，但施政報告卻避而不談。可能政府心中存有恐懼，害怕一旦開始津貼教師薪酬後，便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針對此一問題，本人建議政府可於財政充裕的年份，如目前幾年，撥款成立學前教育基金，以後從基金收益中酌量增加津貼，這樣一來，資助學前教育的財政預算便可控制自如了。

#### 五、總結

今年的施政報告以「負責任的政府」為口號，可見政府決心對本港市民更加負起責任。為達到目的，政府制訂《工作進度報告》和《政策大綱》，確保每一項工作的落實。這種勇於負責任的精神實是值得稱讚的。但綜觀教育政策的內容，大都是在數字上做工夫，可見政府比較從「量」方面作為訂定教育政策的取向。須知教育的成效不單是「量」的問題，還有「質」的問題。質量並重，才能發揮最佳的教育效果。政府在提高教育質素方面，還有承諾到一九九七年九月時，小學教師與學生的人數比例將降低至 1 比 24，中學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例將降至 1 比 20。縮減師生比例，有學者認為是教育改革中最昂貴的一項，但這是否具最高效益的投資，現在仍未有定論。但在有限的資源中，能否有其他更應優先處理的項目，可以選一些來做呢？所以，政府在推行政策前，還是應多作探討，以確保資源能作合理的運用。



如何有效地運用資源達致更高的教育質素，將是「負責任的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應該認真考慮的。

代理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鉅津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今年的施政報告標題為「掌握千日·跨越九七」。綜觀報告的內容，「掌握千日」是可以做到的，但「跨越九七」卻是毫無把握。在現時中港關係惡劣的情況下，將報告的標題更改為「跨越九七年一千零一夜」，相信會比較貼切一些。

今年的施政報告，很明顯可以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切合了「掌握千日」的標題，是香港政府經常性的工作。各部門在來年計劃中，大致上的共通點，是在經濟情況不斷進步下，各部門的服務量繼續增加。坦白說，這是切合本港所需的可喜現象。但所缺乏的，是對舊問題欠缺新理解，亦沒有發掘新問題。整體來說，報告需要新指引、新策略、和跨越九七的長遠計劃。

以衛生政策為例，雖然今年施政報告提出了增加病床、興建醫院、減低輪候時間、增加護士等等，但在決策過程中，卻露出明顯的流弊：

- (1) 舊問題：當局計劃興建有四百多張病床的將軍澳醫院，卻繼續忽略全港欠缺四千多張療養病床。去年施政報告把這欠缺之數留給一個新小組去解決。一年之後的今天，這小組進度報告並無交代，欠缺的療養病床如泥牛入海。政府捨道理而就政治，興建將軍澳醫院，對於療養病人佔住昂貴急症醫院造成的資源耗費，以及留在護理安老院的療養病者又得不到適當照顧，當局似乎是「眼不見為乾淨」。
- (2) 舊問題：對於預防疾病的老人健康診所計劃，政府仍然將服務對象的年齡，定為 65 歲以上，但事實上，政府強調的心臟病和中風，通常是在四十多歲就開始累積破壞，而三大殺手疾病，差不多半數在六、七十歲之前病發，等到 65 歲以後才檢查，其實為時已晚。檢查的項目，又不包括測試膽固醇、三酸甘油脂等等，根本就預防不了多少宗中風、心臟病。由此可見，今年的施政報告是重量不重質的。
- (3) 施政報告表明政府意欲增加 500 個護士職位。事實上，問題不是無職位，而是不夠人入職。政府亟需新構思去解決老問題。例如現時護士學生入職人少，是因為香港青年傾向於追求悠閒和高享受的生活；護士學生流失幾近半數，是由於部分護士不慣刻苦；畢業護士流失是因為已婚護士要照顧家庭等等。所需的新構思包括：例如考慮向廣東省招考護士學生去填補香港護生遺留的空缺；研究彈性班期去容許已婚護士同時任職醫院和照顧家庭，及改用專職夜班去免卻日更護士當夜。諸如此類的新辦法，政府必須有膽量作出嘗試。

施政亦需要其他新指引、新策略。舉例說，政府有個口號：「不會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足夠的醫療服務」。這是一張沒有寫上銀碼的簽字支票，終有一天所填的銀碼要超越政府的上限而無法兌現。我最怕看到的，是昂貴而非必要的醫療，侵蝕了必需的日常醫療資源。例如，老人家掉了牙，配一副假牙或種植人造牙齒都可以。種牙的功能會比假牙好一些，但費用就高得多。我擔心政府開出無消費上限的支票後，人人改要種牙，結果連假牙費也用光。這些昂貴、而有廉宜代替品的療法，政府必須與醫務人員研究，訂下指引以及每年上限，以保障有效的、常用的、也價廉的傳統醫法，不會受到昂貴技術所侵蝕。

施政報告中衛生部分唯一的新策略，就是「增強公營與私營醫療機構合作」。本人經過兩年與政府官員商討，今次很高興終於看見政府願意從這角度正視有效運用資源的問題。鑑於箇中情況複雜，我將提出動議，促使政府落實一個可行的方案。

在九七過渡問題上，香港醫學界面對否認英聯邦醫學資歷，而與中國大陸互認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有其立場，必要時與醫務委員會修訂法例，以確保市民的健康權益獲得保障。

施政報告的第二部分指出要「跨越九七」，這明顯是指由彭督執掌的近期政策，總督在宣讀時加用身體語言表達。這部分包括中港關係和老人退休金計劃。

在中港關係上，總督本年度的中方對手事實上只有兩個：一是預委會，二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總督聲言不會與預委會接觸，換言之，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冇嘢做」，連試也不試，立心明年交白卷。

在聯合聯絡小組工作上，總督表現出強烈的挫折感，在歌頌了寥寥幾個協議之後，羅列了多項毫無進展的協議，用拍檯的動作，表示中方既不滿意英方建議，又不提出反建議，暗示責任在中方的不合作態度。我這幾年在政制辯論中，三番四次指出，彭督的做法，根本就不明白中國人的心理，完全不合香港實情。中國人（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大陸人）最着重雙方關係、感情、和信任。你若敬我一尺，我便敬你一丈。你若搞對抗，我便和你鬥到底。彭督剛到步就否認中英外交協議、走基本法的罅隙、教訓中國領導人、正是「落筆打三更」。打斷了的中港關係，至今仍無可以修補的跡象。

面對九七關頭，香港人的共同希望，是中英合作過渡，就算不平穩，至少亦順利。在立法局總督答問會那天，我詢問過他，中英聯絡小組無進展，遠近因何在？他完全不答我的問題，只是強調雙方應該採取積極的行動。所表現的心態，顯然是掌握不到中方是刻意不與他合作，遠近因都是中方不滿意他的處事態度。中方的要求，要就是全面合作，否則就完全不合作。相反，英方要求在政制上不合作，在其他方面則在符合英方條件下合作。這樣，中英是明顯敵對。明眼人知道中英沒可能再合作，香港民生事務將來不能順利過渡九七，末代總督須要向港人負責。

至於總督親掌的第二件事，即是老年退休金計劃。這又是另一個例子，說明他把英國的制度不折不扣、不顧香港實情、原封不動地搬到香港。這個隨收隨支計劃，在差不多所有推行的國家中，都是初時滿意，後來就面臨崩潰。目前這計劃在香港還在諮詢期，施政報告已經強調支持者眾，又指摘一切異己意見，分明是一意孤行。將來推行之後，「攞彩」者是彭督，要應付崩潰危機的是特區政府，受苦的是計劃崩潰後既無積蓄，又領不到退休金的香港老人。如陰謀論有言中的機會，政府老年退休金計劃就是言中的範圍。

近日有報紙報導，香港繁榮全賴英國的制度。如果是真，何以實行英國制度及歐美式民主的印度半島三個國家，多年來仍然一貧如洗？我認爲香港繁榮，在英式制度之上，要再加港人聰敏勤奮，以及香港爲中國南大門的地理政治因素這三方面合成。香港的繁榮，在以前的總督任期內已經達到。末代總督的任務，我認爲其獨特處有兩個：第一，是促成香港平穩過渡，末代總督的態度需要比現時謙虛些，改變他對中國人的態度，尋求全面合作，才有成功希望。第二，是完成英國光榮撤退的任務。這方面的成敗，歷史會視乎他建立的政策，是見光即死還是得以延續而定。目前他親自掌握的兩大政策（即政制改革和老年退休金），均沒可能在九七年之後延續，反而把中港關係弄至一塌糊塗，香港九七年政制將出現動盪，工商制度不銜接，英國商人亦「無啖好食」。我發現彭督錯在強求英國的所謂光榮撤退，而不惜犧牲香港平穩過渡，得來的結果恐怕是中、英、港，甚至彭督本人亦一無所獲，而最受苦的，是處於中英爭拗夾縫中的香港人。

前兩年總督讀完施政報告之後，觀眾席上的行政局議員和外國記者，都會掌聲雷動。今年施政報告宣讀完畢之後，一反常態，觀眾席上一點掌聲也沒有。這樣的報告，教香港人怎樣可以喝彩？

代理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陸觀豪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一個公開和負責任的政府要落實政策倡議，需要取得三方面的共識，即政治共識、政策共識和程序共識。讓我打個比喻，如果政策倡議本身是一列鐵路火車，那麼，政治共識便是火車頭；政策共識是火車運載的貨物；程序共識則是沿線的訊號系統。沒有火車頭，火車便不能行走；沒有貨物，那只是一列空車；沒有正確的訊號指示方向，火車無法前進。

## 為老人提供保障

當局在為老人提供更有系統的支援和保障方面目前所出現的困局，便是一個好例子。大家都同意為那些曾對社會福祉作出貢獻的人士提供財政上的退休保障。不過，只是取得政治共識並不足夠，我們仍需把貨物裝上火車，而這正正是政府當局與各政黨仍然有意見分歧的地方。

政府當局最初建議強制推行職業退休保障，但讓私人機構自行決定最切合個別情況的計劃。另一方面，政黨人士卻要求政府直接作出承擔，認為中央公積金較為可取。雙方曾就此幾乎達成協議，因為只要政府當局能夠提供若干保證，在推行計劃的私人機構未能履行責任時，支付差額，政黨人士便願意接受政府當局的建議。政府當局不接納政黨人士這項要求，而政黨人士自此亦在中央公積金的問題上採取堅決的立場。

政府當局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作為一項策略性的反建議，以紓緩爭取設立中央公積金的政治壓力。該項計劃設計巧妙，又很有技巧地推出，難怪一位寫專欄的政論家形容該計劃是一個開放社會下，「行政主導政府」概念的典型例子。

擬議的老年退休金計劃的資金來自僱主及其僱員的供款，以及政府承擔的公帑。供款額是按工資計算，但支付的退休金則與通脹掛鉤。只要我們的勞動人口每年的生產力均保持增長，再加上人口結構沒有出現急劇的變化，這項計劃起碼在理論上是應該持續可行的。

政府當局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包括由顧問公司按不同的假設情況來作出精算分析，從而支持擬議計劃。政府高級官員亦利用每一個機會推廣這項計劃，並詳加解釋。另一方面，批評計劃的人士迄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有實證支持的有力論據，以引證他們的反對意見。例如，有一批知名的經濟學家質疑精算分析中對人口的預測，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在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曾引用這些數據。

我們就這問題已經爭論了超過 30 年。正如總督指出：「單從人口統計數字來看，我們已不能一再拖延」。我們已沒有甚麼好藉口再作延遲，而不在政策方面取得共識，以便採取行動。但老年退休金計劃是否最佳的長遠解決方法？為何有人認為中央公積金較為可取？為何不恢復原來計劃，在全港推行退休保障制度？

## 行政主導政府

不管這個政治「困局」將如何獲得破解。我們也許已經找出在行政主導政府下的處事方式。這裏的關鍵字眼是行政主導，而不是行政獨裁，就是說當中確有內置的制衡機制。

詹姆斯·麥迪遜曾寫道：「要設立一個由人管治人的政府，其中的一大困難在於：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管治的一群，然後令政府自我管制。」

政府當局必須說明其政策倡議是正確和切合需要，以便贏得市民的支持；另一方面，立法機關則必須確保這些倡議正如政府所說明的那樣，是正確和切合需要的。這種介乎政府當局與立法機關之間的制衡機制是爲了提供一種保障，俾能在任何政策構想落實之前，先要取得政治共識和政策共識。

在立法機關內，議員之間亦有內部制衡。直選議員會就地方選區的需要作出回應，並多半把焦點放在可取得立竿見影成效的工作上；至於非直選議員，由於他們的責任承擔與直選議員不同，因而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具較長遠影響的工作上。不幸地，無所不用其極的政黨政治卻破壞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未來立法機關將會面對的一項挑戰，便是在議員的組合上，恢復這種內部制衡。民主的真諦並非只是由多數人作決定，而是應同時聆聽少數人的意見。

### 經濟議程

政府一向奉行自由經濟政策，鼓勵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這與它在政治上所採取的保守態度恰成對比。從生產總額和商業機會來看，香港在戰後均可以說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今天，我們已成爲一個實力雄厚的經濟個體，躋身全球 20 個最富裕經濟地區之列，同時亦是首 4 個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個體之一。

過去 40 年來，香港在經濟上茁壯成長，蓬勃發展，基本上是並無依賴中國的。但近年來，在經濟力量帶動下，已經把香港與華南的經濟拉近。我們已將不少工業生產遷移至珠江三角洲，因爲這些工業生產若留在香港，已不符合經濟效益。此外，自中國重開門戶吸引國際貿易和投資以來，我們亦已恢復轉口港的角色。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將進一步加速這種重新結合。

我們應該明白，中國像美國一樣，基本上是屬於大陸型的經濟，也就是說在下一世紀，經濟發達的中國將以國內消費爲本，輔以對外貿易，而不是以出口爲本，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把焦點放在出口，主要是爲了應付入口需求方面的開支。

從地理環境來看，香港與紐約的情況相若，兩者同樣是內陸地區與外界聯繫的天然接觸點。就這方面而言，香港將扮演類似紐約的角色；因此，香港這個港口城市所扮演的天然接觸點角色，便是作爲華南地區的商業、金融和通訊中心。

有鑑於此，在中國經濟現正步向現代化這種形勢中，香港應該善用本身較有利的優勢。我們最大的資產是擁有受過教育、又聰明勤奮的勞動人口，因此，也許我們應集中把香港發展成整個亞太地區的國際專業服務中樞。畢竟香港總不能不斷興建新的貨櫃碼頭。

## 促進競爭

假如香港要在世界市場中保持競爭能力，我們亦必須確保本地市場有競爭。總督重申，要「促使市場公平和有效率地運作，並打擊投機者和保障消費者」；政府當局作出這種承擔，應該值得讚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捍衛消費者利益，維護消費者權利和推廣消費者教育方面，成績斐然，亦值得一讚。近年來，消委會扮演着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主動提出挑選一些對我們日常生活很重要的行業，研究這些行業的競爭情況。

我們要知道，各行各業所用的手法和競爭情況，往往都由市場帶動。缺乏有利的市場環境，任何有助進一步競爭的措施都不能落實推行。以銀行業的競爭為例，就取消香港銀行公會利率規則而言，假如市場環境不是對這種政策性的措施產生影響，就不可能落實取消利率規則。消委會提出該項建議，只是切合時宜的催化劑，而各政黨就這項建議的倡議工作也無非是這種催化劑的添加劑。

雖然我們熱切期待消委會早日完成對其他行業所撰寫的報告，但從消委會發表的首份對銀行進行的同類報告，我們可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訓。

首先，應否用一個中性的標題？消委會選用了一個非常煽情的題目——《銀行對存戶是否公平？》。由於該報告大致上只集中存款利率的研究，並非針對存款服務，因此，這標題有很大的誤導成分。我們不禁要問：「銀行又是否獲得公平的對待？」

第二，應否借助具實際經驗的行內人士的專業知識來進行研究？在撰寫該份銀行業研究報告的過程中，消委會仰賴一間大專院校的一組顧問人員來提供技術支援。但該組顧問人員和消委會轄下的財經服務專責研究小組均沒有零售銀行業務的實際經驗。後來證實顧問人員得出的研究結果，亦即消委會作出推論的基礎，是缺乏充分的支持理據。

第三，消委會能否避免研究結果被知情人士利用來達致某些政治目的？就銀行業這份報告而言，某個政黨企圖在報告發表前數月，先發制人，發起一個反對香港銀行公會利率規則的高姿態運動，煽動市民的情緒，從而撈取政治本錢。這並非純屬巧合。對於一個以促進公平貿易和競爭為己任的機構來說，這實在是夠尷尬的事。

研究各行業的運作是一項敏感的工作。我促請政府當局和消委會採取積極行動，確保不會再發生同類事情。我也促請消委會進行檢討，並且對參與這類研究的成員，特別是那些與政黨有聯繫的成員，施加更嚴格的道德標準，要求他們遵守。

## 掌握千日·跨越九七

讓我套用總督的說話——「今天太陽落下，明天會再升起來」。而在不足 1000 日後，香港歷史上的一頁就會終結，翻開新的一頁。

「一國兩制」本身並非一個目標，而是達致目標的手段，是促使香港和中國大陸在未來 50 年排解各方面分歧的手段；也是與正逐步現代化的祖國再結合的過程中彼此融和的手段。我相信回歸中國後，香港早已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價值取向，將會在下一個世紀繼續維持下去，同時在經濟上蓬勃發展、政府向市民負責、政治制度民主、社會開放。

10 年以來，香港市民看到為進一步推動經濟、維護自由和價值觀所訂下的工作議程，都以興奮莫名的心情期待過渡一九九七。然而，時至今日，恐怕不少人的心情卻是前所未有的焦慮和沮喪。市民對於種種有關實踐所訂議程的諾言已經聽得不耐煩，市民要的是承諾得以兌現。

謝謝主席先生。

劉慧卿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這兩天的辯論中，我聆聽了大部分的演辭。迄今有四十多位議員已經發言。有些同事把這份施政報告彈到「一錢不值」；有些則指施政報告「四大皆空」。我被人稱為對香港政府批評最嚴厲的立法局議員之一，但我今天亦不能認同他們的意見。

這份施政報告，由總督提出，代表着整個香港政府。難道我們站在這裏告訴香港 600 萬市民，這份施政報告真是「一無是處」？若我們諮詢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他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意見認為施政報告未能高瞻遠矚，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一個只有不足 1000 日的政府，又怎可以提出一些具有高瞻遠矚的意見？但我們不應因此就抹煞政府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以及它在這幾年所做的工作。此外，「打落水狗」亦非我的行事作風，別人喜歡這樣做，由他們去吧！我仍然堅持我一貫作風，就是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向政府提出我的意見及批評。

剛才有些議員指出，要求我們在發言時不要太過「煽風點火」，不要太過「對立」。主席先生，本人發言有時很大聲，這是本人的表達方式和性格。我希望政府稍後回應本局的發言時，不要持去年的態度。杜葉錫恩議員曾指出政府應像犀牛般，可以抵受各方的攻擊。因此，我希望政府在下星期回應時，要勇於面對批評，不要擺出愛理不理的態度。我希望政府了解，我們的職責是要監管政府，對政府的政策作出批評，這是我們必須做的。

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需要「掌握千日」。其實很多議員已指出要「掌握千日」的並非是香港人，而是中英政府。最令市民反感的，就是總督在施政報告指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議程上的工作，如果在九七年前仍未能完成，付出代價的正是香港市民。這點給予香港人一個印象，就是英國政府不會與香港人共患難。如果說得粗俗

一點，就是在九七年，總督「拍拍屁股就離去」，我們又怎能要求市民對這樣的一個政府有信心？換句話說，香港人無份參與討論決定關乎本身的事項，但中英政府可進行閉門會議，暗裏地將香港市民出賣。但是若果有任何差錯，後果全部由香港人自己負責。這樣的命運，為何要加諸於香港人身上？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已決定了香港人的命運。我相信如果是要翻案，香港人當時應該提出抗議。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如果中英聯合聲明今時今日提交立法局討論，本局會以大比數將它否決。但英國政府很聰明，她把聯合聲明提交一個完全沒有民選議員的議會通過。當時只有你，主席先生，和陳鑑泉先生投棄權票。對於當日立法局的決定，我感到非常憤怒。中英政府當時是不讓我們香港人就中英聯合聲明進行全民投票。但在這個聲明裏，掌握香港人的將來卻是中英政府。香港人無權參與，但若有甚麼差錯，就要香港人負責。這件事一直延續了 10 年，現在還繼續下去。這個亦是現在香港市民對前途感到徬徨、擔心和無信心的主要關鍵。因此，這幾日當我聽到有人說怎樣與預委會協調，怎樣搞好中英關係，我就想問問他們：你們是不是真的這樣幼稚，相信如果中英政府現在搞好關係，准許所有官員出席預委會，香港人就會很有信心？你們有沒有真正聽清楚香港人講甚麼，香港人說沒有信心，因為他們無法參與這些秘密的談判；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無法阻止任何的檯底交易。衛奕信時代，中英關係不是很好嗎？為甚麼當時香港人，包括商界，頻頻去倫敦叫她撤換總督呢？就是說他是「跛腳鴨」啊！說他不是為我們香港人挺起胸膛說話！那為甚麼現在你們又會相信中英政府進行的檯底交易，會令我們 600 萬人有信心呢？我實在完全不明白這個邏輯。

主席先生，我當然不是呼籲中英政府在此公開對抗，但是她一日不針對香港人的信心問題，一日不讓香港人直接參與決定自己的事務，使市民感到我們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將來，這個問題仍是無法解決的。

我們常說要讓公務員去見見預委會，見到又怎樣，見了是否令市民很安心呢？無端端將我們的高級公務員拉進這場權力的角力鬥爭之中，又有甚麼好處？如果中英政府要合作，透過聯絡小組，透過外交途徑，很多資料可以透露，為何要難為這十幾名高級公務員呢？傳召這些司級官員去見他們，是否就很有快感？這點真令我大惑不解。有些議員說：「我其實最初是不支持預委會的，我覺得它沒有認受性，又沒有法律基礎，不過現在也沒法了，就算不喜歡，它亦已存在，倒不如去接受它，與它溝通吧」。這還不是委曲求全？我們是否還有原則？立法局雖然權力不太大（權力在行政當局），但我相信市民希望議員有點原則，有些理想，站穩自己陣腳，不要在起初認定不行的，到後來見勢色不對，就改變自己的立場，改為去支持它。當市民見到議員這種趨炎附勢的表現，心也冷了。他們不禁會問：這群人這樣懂得鑽營，是否真正能夠代表我們 600 萬人的利益呢？

主席先生，談到中英關係的改善，當然我們希望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可以加快工作，因為我們很擔心到了九七年有很多事情仍未辦妥。前兩天，有些議員也提到，法律本地化和適應化的問題。我自己很希望政府在下星期回應時，能給予議員一個明確的進度時間表，說



明會怎樣做。我不是鼓吹政府單方面去做，但若將時間表公布週知，我們便可知道在餘下的九百多日，那八十多條英國法例、六百多條香港法例以及千多條附例怎樣本地化，同時亦可讓中國政府見到這些工作的迫切性。其實我們經常很擔心中國政府不明白有些英國法例是要本地化，到時本港才不會出現法律真空。昨日中國政府透過預委會講了一些說話，令我感到很驚奇。他們提到官方保密法，在九七年後仍可適用，因為在這方面，是不可以有法律真空的。待九七的特區政府有時間立法後，才不用這個官方保密法。既然中國政府了解到若某些英國法律未能本地化，是會有法律真空，為甚麼他們只提官方保密法？還有關乎航運、商務的法例亦需盡快處理。為何他們只是着眼於官方保密法？

主席先生，我希望中國政府能了解真是有可能出現法律真空的問題。我們不能只是抽了一條官方保密法，其他的英國法例就置諸不理。法律本地化的問題應盡快解決。

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已經談論了很久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居留權。香港現在有四十多萬人（到九七年可能有六、七十萬人）擁有外國國籍。他們很想返回香港居留。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居留權。我希望中國政府盡快表態，令這班人感到安心，尤其取得居英權的人，我相信他們的心也很亂，他們不知中國政府如何看待他們。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高級公務員，中國政府說過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港為特區服務。

與居留權有關的，當然是護照問題。我們很多人都很關注日後的特區護照會否順利地發放？這個護照會否得到其他國家承認，而最重要的，就是給予一個豁免簽證的安排。現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有 80 個國家給予免簽證的安排，香港市民出外旅遊，十分方便。但中國護照只獲得十幾個國家給予免簽證的安排。香港市民有理由擔心若果這件事做得不好，我們在九七年雖然有張紙叫做「護照」，但要出外旅遊時，可能遇到很多問題。講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問題，好像一匹布般長，怎樣也講不完。最後，我只想講講，如果中國政府願意合作，隨時都有能力做到。中國不需利用種種藉口，甚麼放英國人一馬，讓她光榮撤退等，才會與英國合作。我相信中國政府要「看開」些。其實，我應該說請中國放香港人一馬，讓 600 萬人可以平穩過渡。我希望中方拿出誠意，盡快在聯合聯絡小組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令香港人可以看到英國正在做甚麼，看到我們的利益有沒有被出賣。因此，我呼籲中英政府盡量增加小組工作的透明度，好讓香港人知道，他們關上門，究竟談的是甚麼？

主席先生，另一項香港人非常關注的，就是人權和自由。很多市民擔心九七年後這兩項東西會消失。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餘下的九百多天，盡量多做點事，讓市民覺得這事未必一定會發生。政府說會援引聯合國婦女公約，但要徵詢中國政府。我們覺得此事好像遙遙無期，希望政府盡快進行。政府否決了成立人權委員會，令我感到非常遺憾。政府亦提到有些違反人權法的法例，會在今年提出修改。至於一些違反新聞自由的法例，亦會在今年進行修訂。但是主席先生，在政府提出的《立法議程》上，我完全找不到上述兩項，可能政府覺得這些不是在優先次序上佔最高的。我希望下星期政府回應的時候，會解釋給我聽，這其實是一個錯漏。我希望政府確切地告訴我們，任何牴觸人權法的法例，都會在本年內修訂。

最後我亦想提一提有關聯合國兩個國際公約下月在日內瓦進行聆訊。內務委員會明天會再討論這事，因為立法局的憲制事務委員會已經決定了派團去。我們希望在明天的內務委員會會得到議員的支持，撥款讓我們派團出席。我們更加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次香港人可以去聯合國出席這類聆訊。主席先生，我希望你及所有議員都同意，對香港人來說，人權、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想香港政府做一些事情，讓市民覺得政府想剝奪我們的人權自由。政府表示在未來3年，會撥出二千多萬元給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人權。在這個如此富裕的香港，這筆款項算是甚麼？我希望下星期政府能告訴我們，可增加這方面的撥款，以便有關當局能推動人權教育的工作。

我謹此陳辭。

李永達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代表民主黨評論這次施政報告的房屋問題。今年的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出實際解決房屋問題的新策略。我對政府就解決輪候登記冊所作的承擔問題，亦很懷疑，15萬個家庭正在輪候公屋，究竟何時才可獲配公屋？根據高級助理房屋署署長鄒滿海先生在上周五的記者會上解釋，其實在九三年的實際公屋需求，只是75000個家庭，並預計到九七年可安置其中七成的家庭。我自己對這個只有75000個家庭有實際公屋需求的講法很懷疑。

房委會所定的入住公屋資格非常苛刻。如果以此作為有需要入住公屋的指標，實在是不合理的。雖然每年四月房委會都會檢討高入息的限額，但對一般核心家庭來說，只有每個成員收入為二千多元的家庭才有資格入住公屋。以今天的生活指數來看，是否過份苛刻呢？

另外，根據過往的經驗，每年的輪候登記冊會增加13000至17000戶。根據房屋署的講法，到九七年就只能清理現時輪候冊的七成，至於每年增加的輪候冊住戶，何時才清理呢？房屋署沒有解釋，亦沒有承擔。房屋署指出現在有九成申請者的輪候時間是少於6年的。可是，輪候冊每年的累積，加上政府沒有作出任何承擔，結果只會令輪候冊的人士最少輪上8年至10年，甚至更長，都得不到入住公屋的機會。

我們以前曾經提出解決輪候冊的建議，包括大幅批出土地，去興建出租公屋單位，或者政府可考慮撥出一些資源去幫助輪候冊上的家庭，讓他們去租住私人樓宇，減輕低收入家庭的負擔。在此，我代表民主黨促請政府在九七年時，將現有輪候冊的家庭作第一次的配屋，以及要制訂服務承諾，就是所有新的輪候冊申請者於3年內有第一次的安置。

主席先生，要解決房屋問題，須從土地供應入手。過去幾年，中英土地委員會批地進展緩慢。在九四年五月，政府向立法局關注樓宇炒賣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再次顯示港府和中方協議的批地計劃很多時是紙上談兵，不一定可以兌現。上年度原來計劃撥作興建

資助房屋的土地是有 27.6 公頃，但最後只批了 24.6 公頃，比原來少了一成多。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預期在九七／九八年前增撥 70 公頃土地的供應，再興建 45000 個額外房屋單位。究竟可否落實，現在是未知之數。就算這 45000 個單位可以落實，根據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其中只有 5000 個是出租的公屋單位。大家可比較一下，5 年 5000 個單位，即 1 年多建 1000 個，相對於在輪候登記冊的 15 萬戶登記單位，這個數量少得可憐。

今年度的批地計劃其實還未落實。如果要令香港市民住屋需要得到滿足，希望中英土地委員會考慮我們的建議，不要總是撥太多的私人樓宇和居屋的土地，因為這種做法是要得到中英雙方一齊同意和批出的。其實政府是可以單方面批准撥地興建出租公營公屋單位，去全面加快興建單位的速度。批出公共房屋中的出租單位土地是不需要土地委員會批准，可以由英方單方面根據需要而批准的。

另外，我要提出一點，以往房委會在 1 年內曾最高興建 6 萬個公營部門的單位，今年只興建 35000 個。我覺得如果房委會有決心，是可以充分利用其人力資源，達到每年興建 6 萬個公營部門單位的數量。這樣，才有機會解決輪候登記冊的問題。

主席先生，在政府宣布壓抑炒樓活動措施後 6 個月，樓價下降了 10% 至 15%，現在認為毋須推行第二階段的壓抑炒樓活動措施。但我們要知道，樓價在過去 3 年的升幅大概在 100% 或以上。這 3 個月樓價下降了 10% 至 15%，對於有興趣置業的人士來說，樓價仍然是太高。所以，我認為要解決樓價問題，辦法是增加土地。但政府在今年六月出版的土地供應和物價專責小組報告書中所說的批地計劃是未落實的，而建議在二零零一年前，多興建 15000 個單位其實並不足夠。我們希望政府盡快落實這計劃和作出檢討，有需要的話，要進一步增加土地的批發。

主席先生，我想談論一下清拆臨屋的問題。總督在九二年的施政報告承諾九七年時有三分之二臨屋居民是會獲得安置的。在九三年時，總督又再承諾九七年時，為所有臨屋居民提供安置單位。看到這些承諾，我以為住在很簡陋和居住環境非常擠迫的臨屋居民可早日得到改善環境。但到今年，總督在這份施政報告中轉變態度，謂只可以保證在九七年時最低限度為這些臨屋居民編配安置單位一次。即是說，九七年時，房屋署可分配居民去天水圍，但無論居民接受與否，房屋署和總督已經完成責任。我們覺得安置臨時房屋區居民入住新型屋邨，與提供最少一次的安置安排是不同的承諾。事實上，現時總督已違反了在九三年的承諾。我希望政府及總督可以公開答覆，為何要改變這個承諾？

主席先生，在屋邨管理和保安的問題上，政府要到問題十分嚴重，不能逃避時，才承諾撥款增建保安設施。根據政府的時間表，會用 3 年的時間為 200 座和諧式及 Y 型公屋安裝保安設施，而其餘 1000 座公屋的保安設施，可能只是安裝閉路電視，現時並無長遠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這個問題由九一年底討論至今，政府並沒有加快改善公屋的保安。近年來，從公屋發生的罪案（尤其是非禮及強姦案件）來看，證明公屋的保安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如果政府仍未有計劃加快改善公屋的保安設施，為公屋加建大閘，聘請護衛員及改善照明，只表示政府為了節省金錢而罔顧這些居民的生命和財產。我們重申，政府是有責任保障這些居民的生命和財產，改善治安。房委會應該承擔增設保安措施的費用。政府應為治安較差的地區，如屯門和一些偏僻的區域，優先加建這些保安設施。房委會現時有 180 億元的流動資金。我認為當局不應以技術和財政問題來推卸這個迫切的計劃。

房委會及房署現時考慮讓公屋居民參與屋邨管理的問題。在此，我想發表一些意見。事實上，屋邨管理政策的制訂和具體管理的執行，對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屋邨管理的問題上，如清潔、照明、電梯運作、單位維修和保養，確是屋邨居民投訴最多的事項。若居民可以參與屋邨的管理，對屋邨管理的質素必定有所貢獻。公屋居民對屋邨管理有切身的感受，將會迅速地發現問題所在，對於解決辦法的可行性和利弊有充分的掌握。這對制訂適當的政策甚有幫助。所以，民主黨促請政府及房委會成立有屋邨居民參與的管理架構，以及給予這個管理架構適當的監察權，以監察屋邨的維修、清潔、保安和承辦商質素的問題。

主席先生，最後我亦想談談近日香港市民十分關注的預委會問題，雖然總督彭定康先生來港前，已經有些親中人士提出設立預委會，但預委會的成立明顯是因為中英雙方在政制問題上沒有協議。中方用它作為中英談判的一種政治姿態和壓力，其後更變為一個和港英政府對着幹的機構，藉此削弱其管治權。現時很多同事和社會人士提出，政府要和預委會溝通合作。究竟他們有否想過預委會成立的最根本的真正目的？

有些同事也許會說：既然預委會的成立已成事實，而且已為香港市民工作，我們便要實事求是。首先，我不同意已經成為事實的事，我們便要承認，便要認命。預委會明顯違反基本法和聯合聲明。我們怎可以承認一些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組織？如果我們這樣做都可以接受，那麼日後中國政府可能又成立一些其他委員會，作為提早接收香港的委員會，我們是否要承認，要予以合作呢？

至於工作方面，預委會為香港市民做了些甚麼呢？我們很多同事都已說過。預委會所做的，是否都要我們支持和合作呢？預委會有甚麼表現呢？其實預委會成立到現在，每次會議後所作的宣布，可以說都令香港市民大為震驚。最近提出的臨時立法會、重新修訂人權及公安法，以及考慮承認國內大學資格的問題，簡直令香港市民毛骨悚然。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的表現，要港人對預委會有甚麼信心呢？

其實預委會成員由中國政府委任，毋須向香港市民交代。他們只要表現得愛國，或表現得比共產黨更左，就可以繼續在這個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委任制度內坐直升機。看到有很多香港人愈來愈期望加入預委會，甚至想坐直升機，而他們很多時是要放棄原則和埋沒良心的。

沒有人知道預委會是怎樣運作的。預委會很多時黑箱作業，透明度很低。據一個親中人士對我說，他懷疑預委會有時討論問題，是非常「自發性」及「突發性」的。意思是說，有時開會是沒有議程的，只是坐下來交談，當談到有甚麼結論時，便出來作一簡報。若預委會是這樣運作的話，是很可怕的。但我看看預委會最近的工作表現，卻又覺得它這樣做沒有甚麼出奇。其實預委會已經運作一段時間，他們開會之前，我們不知議程是甚麼；開會之後，就只有一些召集人和個別委員以口頭方式向新聞媒介簡報。預委會成員至今只懂得在麥克風前說說，連一份研究報告、工作報告也沒有發表，甚至有時連我們想關心的議程、會議紀錄都久奉。其實就算是被中方大力抨擊的港英政府所建立的區議會，雖然是諮詢架構，但議程、會議紀錄、工作報告都有規有矩。一個連區議會的運作方式都做不到的預委會，我們怎麼會有信心、理由予以支持和合作？主席先生，我在這裏祝願預委會能夠入土為安，早日升天。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唐英年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年的總督施政報告，在教育部分只集中在 3 項上，即在未來四、五年間，動用 1.63 億元改善幼稚園師資訓練；為大專學生增加 3.25 億元作貨款、助學金；動用 3.4 億元來興建特殊學校，就是這麼多了。綜合計算，每一年只不過增撥了 1.9 億元在教育新措施上，夠不夠呢？相信在座的立法局同事們心中有數。

作為一個後過渡期的政府，責任和壓力都非常大，這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就是因為香港要過渡九七，主權回歸，我們對現政府的要求就更大，希望可以在過渡之前，一切民生事務和政策，能夠有一個宏觀的發展，讓市民大眾對未來增添一份信心和更樂觀的希望。

當然，這也非單純的意識形態，現實亦確有此需要。例如，9 年免費教育自七十年代實施以來，已有一段比較長時間，政府並沒有認真做過全面檢討，到今時今日，中小學課程仍未有適應普及教育的需要，若干實用科目更只屬點綴式，不敷應用。教學語文在社會上爭論已久，但還是停留在見步行步階段，甚至進退兩難，如何令真正有需要的學生獲得母語授課之餘，又有效地提高英文水平，一直未有良方。香港與中國很快就連成一體，今後的經貿關係將更緊密合作，香港在培養人才方面，如何與中國經濟發展互相配合，令年輕一代掌握國內省縣的經濟脈搏、法律條文的認識、普通話應對等，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否則的話，我們在面對 21 世紀新挑戰時，會有重大的困難。

主席先生，在主權回歸之時，亦正是刪除教育制度上殖民地色彩的一刻，加強中國近代史、地理知識，將可為下一代凝聚對自己國家的向心力。面對九七政權移交，很多學生對前途感到憂慮，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亦產生疑惑。我相信一個主導政府，絕對有責任

協助，指引學生正確地迎接這個大時代，歷史轉變。增強公民教育的灌輸，例如一國兩制的概念，人權意識的培養，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基本法闡釋，法治精神的重要性，公民責任等等，這些課本知識均可與現實掛鉤，從而令新生一代由認識到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上述這些建議，均應與現行教育政策相輔相承。全面的檢討，以未來 10 年、20 年的發展路向作指標，盡早制訂一套具高瞻遠矚的教育政策來過渡九七，而不是任何大小事項都留待特區政府去決定。尤其這類非政治敏感課題，我看不到會沒有直通的可能。可惜的是，無論本人及教育界人士無數次爭取，政府對我們的要求還是無動於衷，今次施政報告更隻字不提，令人極之遺憾。

我想，政府漠視這項需要，或多或少反映出，香港政府苟且偷安的處事態度。民主黨說，我們不能寄望這個「夕陽政府」，如果真的這樣，那就很可悲了。事實上，除了彭定康先生會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離開香港之外，我們那些政務官、公務員，相信絕大部分會留在香港，成為特區政府的官員。所以，他們有責任，有義務繼續履行本身職責，制訂最好的政策，來服務市民。尤其在過渡期間，更須加倍努力，為港人向「夕陽總督」爭取最好的。留戀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方針，是故步自封，要不得的心態。主席先生，今日不採取主動，明日可能未必有機會，機會不是時時有的。

再看今次施政報告的三大措施，總督表示會在未來 4 年動用 1.63 億元來改善幼稚園的師資訓練。很明顯，這對整體學前教育，並無大幫助，亦無助幼師嚴重流失的情況。早在上次財政預算案上，我已呼籲政府及早作循序漸進的全面直接資助學前教育。但政府如今依然在耍手段，支吾以對，還要留待明年底才「研究」可否為幼稚園提供資助。大概這是一貫官僚作風，採取拖延政策，實質是無意承擔學前教育。不曉得到明年，政府會否又推說快過渡九七了，不如由特區政府去決定吧。要鼓勵更多幼師接受訓練，成為合資格教師，沒有政府資助薪酬調整，是不會成功改善幼師質素的。我促請政府從速正視這個問題，再作拖延，只會進一步拖垮學前教育的發展。

另外，政府亦提到，會在未來 4 年，提供 3.25 億元作為貸款及助學金，令 6000 名大專生可以受惠。同樣，這項建議，根本與施政無關，最多只是放在財政預算裏一小角，完全與大專發展扯不上關係。自從專上教育學費與成本掛鉤後，學費平均加幅高達四成之多，政府早已承諾會因應學費加幅而增撥貸款和助學金額，所以全無新意。況且，4 年只多撥三億多元，平均每年才 8,000 萬元，估計經濟有困難的學生亦未必能獲得合理的照顧。事實上，施政報告透露，教育整體開支，將一年比一年減少，4.5% 實質增長，較去年開支及今年經濟增長速度還要低，難道這就是對優質教育有一個承擔嗎？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完全沒有天然資源的小島，香港有今日的成功，就只賴香港人才。全靠香港人的勤奮，香港人的學識，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的愛戀，而奠定今日的地位，舉世關注的金融經濟城市；亦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多年的努力，才可以在九七過渡期，有這個實力，與狡猾的英國，和保守的中國去討價還價，為香港人爭取最大的利益

和權利。主席先生，無論九七前後，我們都必須力爭鞏固我們賴以生存的唯一資產，就是繼續發揚香港成爲一個「人才密集」的城市，避免有朝一日被中國芸芸大城市所擊敗。所以，我呼籲各位同事，我們必須同心合力，向港府爭取更大資源承擔，在我們下一代的教育上，培養更多、更有實力的香港人。我不是要搞「大香港主義」，但若人才凋零，空有大學生數目，沒有大學生專才和大學生的質素，香港將來的前途是暗淡的。

主席先生，目前社會人士最關心的，還是中英關係，看彭督如何扭轉這個悶局。預委會是籌委會的前身，多幾年籌備過渡事情，對於平穩過渡應該有一個良性的影響。可惜，施政報告所帶出的訊息和隨後布政司陳方安生向司級官員下達「三不」聖旨，均處處顯示彭定康毫無改善中英關係的誠意，更有挑起新火頭之勢。我對此表示失望。

總督若真要向港人表示其誠意搞好中英關係，我建議：

- (1) 從速批准港府官員與特區預委會成員可以有接觸。這包括港府官員正式出席預委會或其小組會議；向中方及預委會清楚解釋政府運作，政策制訂目的和政策過程，以及跨越九七必須及早商議的事務範疇，好讓中方預委會明白港府一貫運作，減少彼此間不必要的猜忌。
- (2) 我促請彭定康先生在今後日子，以行動去表現其與中方緩和關係的誠意，所謂「聽其言，觀其行」，是最現實不過的。我們已經聽其言，但未見於行。否則，口裏說一套，同時不忘搞搞小動作，置香港 600 萬市民的福祉於不顧，我看不見會對英國九七光榮撤出香港有何益處。

最後，自從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九七年後香港三級議會必須重組之後，港人對於政制過渡直通，早已不存奢望。不過，一般社會民生事項，以及急欲解決的諸多法例與過渡事務，我們仍然希望中英兩國政府早日摒除歧見，以務實的態度爲港人爭取最大利益。今年的總督施政報告，無論在改善中英關係或改善民生方面，從教育政策，勞工福利到促進經濟增長等等，我都看不到有任何突破。我想，這大概是彭督自九二年來港後，最缺創意，最無貢獻的一份施政報告。我重申本人對此表示遺憾，但我想多謝在座 3 位官守議員，願意坐在此聽我們談論。

李華明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原來李永達議員也有一些親中朋友，並且向他說一些預委會的內幕消息。希望他能繼續與這些朋友保持聯絡，讓我們知道多一些預委會的內幕。如果我發表了這篇演辭後還有時間，我也想談談我對預委會的一些感受。

彭定康先生先後發表 3 份施政報告。在九一年他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可謂是「平地一聲雷」，給香港政界帶來了震撼性的新鮮感。去年的施政報告給人的感覺則是「由燦爛歸於平淡」。至於今年的施政報告，一言以蔽之：「平淡乏味，了無新意」。

我的發言會集中討論福利政策、消費者權益和公共財政 3 方面。

今年總督提及的多項措施，大都是抄錄自港府過往的既定政策文件，如九一年福利白皮書、社會福利署五年計劃檢討、康復服務綠皮書等，內容根本毫無新意。

最遺憾的是，施政報告並無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要求，即盡快改善老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提高至每月 2,300 元，完全違背了總督施政報告內有關促進老年人福祉的目標。我必須再一次強調，民主黨對此決定和政策深表不滿和遺憾，並再次強烈要求政府盡快提高老人綜援金額至每月 2,300 元。

對於將會在衛生福利科設立老人服務組，作為發展老人服務的中央統籌機制而言，我們是支持的，但希望政府能夠多交代其職權範圍、架構及運作形式。

政府將會動用 2 億元設立老人服務發展基金。這項措施無疑有助推展日後老人服務工作，但施政報告並沒有對這筆基金的運作及用途作出闡釋。因此，政府有必要向公眾清楚交代此筆基金的運作情況。此外，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另外設立一項基金，協助非政府機構試行開展一些專為老人而設的試驗性計劃。

另外，施政報告亦表示政府會為私營安老院提供經濟援助，以便改良設備，符合新法例所訂的安全規定。但若這些資助是由獎券基金支付，則必會對其他福利服務的擴展或改善構成影響，而政府亦無清楚交代將會資助哪些項目和具體的執行計劃。這種資助方式亦可能鼓勵私營安老院不主動改善設施，反而過分依賴政府的資助，以符合法例的規定。相對而言，對已主動改善安全設施的負責任私營安老院東主是不公平的。我們認為一個更合理、公平，而又能協助私營安老院改善安全設施，以及讓老人家真正受惠的方法，是政府向未合規格的私營安老院提供低息貸款，協助他們在新法例規定的兩年緩衝期內，盡快改善安全設施，以符合法例的要求。

政府對於已發出 32 萬張長者咭，並有 1700 間機構參加了此項計劃，感到相當滿意。但實際上這 1700 間機構大部分是大集團屬下的分店或分公司，以及相當數目的政府部門。我們認為政府在鼓勵私營公司參與此計劃方面實在不夠積極主動。我們呼籲政府更積極主動，透過公開的表揚、認可或一些獎勵，以鼓勵更多私營公司提供長者咭優惠。我們認為其中醫療保健方面，對老人家尤為重要。同時亦應把長者咭的申請年齡降低至 60 歲，使更符合社會的期望。

雖然總督答應向單親家庭發給新的補助金，款額每月 200 元，但仍不足以解決大部分領取綜援的單親家庭的生活困難。政府亦無提出一套長遠而全面的單親家庭政策，如住屋、恩恤安置、教育、社會歧視等方面，使單親家庭生活一直陷於困苦之中。因此，我們呼籲政府盡快成立一個成員包括單親家庭代表和社工代表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制訂解決單親家庭問題的長遠政策。



在康復政策方面，政府仍未有全盤政策照顧傷殘人士的需要。舉例說，只增加 4 條復康巴士服務路線，但並無為傷殘人士設計真正照顧他們的交通系統和建築設施。長遠來說，政府應立例及修改現行法例，規定所有建築物必須設有方便傷殘人士進出的輪椅通道、升降機和洗手間等。

總括而言，在總督今次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福利政策在許多問題上仍沒有一套長遠而全面的政策方向，特別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和老人服務方面。在此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一個更正面的回應。

在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我們發現施政報告的有關內容與去年比較，可謂是「原版照搬、慳水慳力」。所謂新措施只有一項，就是設立一個商業經營手法研究組。

雖然政府一再表示會對消費者委員會就個別行業進行的競爭情況研究作出回應，並會因應報告的內容制訂相關的競爭政策。可惜，直至今年的施政報告，政府仍未能為競爭政策釐訂出一個清晰明確的政策方向，連基本的想法也付之闕如。例如，政府最近回應消委會今年二月發表的《銀行對存戶是否公平？》報告書時，只是局部接納了報告書內的建議，完全抹煞了在一九七年前全面取消利率協議的可能性。這點不禁使人質疑政府對甚麼是公平交易、甚麼是市場壟斷、怎樣才算是損害消費者權益等問題，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對如何公平地對個別行業制訂具體競爭政策，更使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在九至十月期間，我曾到美國訪問了 1 個月，與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及聯邦貿易局(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官員詳細討論美國政府打擊壟斷的政策及工作。我無意要求香港模仿美國，因為實際上美國的模式太繁複和官僚主義味道太重。但從整個會談中，我體會到反壟斷法例和政策其實並非旨在控告商家，而是要發揮阻嚇作用。

公平交易政策的制訂是防範大企業在市場取得一定佔有率後，可能在定價或其他買賣條款上損害消費者權益。公平交易政策對社會上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商業手法，訂立一套公開的準則。例如，透過立法，使投資者有所依循，也使消費者明確其享有的權利。

對於政府承諾到一九九四年底，會以 1,000 萬元設立消費者訴訟基金，民主黨是歡迎的。這個訴訟基金將會聯結相對上弱小的個別消費者，對不良的商戶進行訴訟，同時也是保障個別消費者的重要武器。

至於設立商業經營手法研究組，負責研究商業經營手法，以期促進競爭，原則上是一個進步的構思。但政府在政策大綱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個研究組的職權範圍和具體運作結構，使人很難掌握這個研究組在促進競爭方面，究竟有多大效力。

第三方面，亦是最後一點，我希望談談公共財政的管理。一直以來，政府都極力強調審慎的公共財政管理和穩健的財政預算政策。在今年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中，更以「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率，不會較經濟增長率為快」，作為首要的公共財政管理的目標。我們的意見是，其實這只是一個主觀、隨意的政策，並無充分的理據。

民主黨並不反對政府採取謹慎的開支政策，但絕不同意政府墨守成規地把開支與經濟增長掛鉤，這只會把政府的開支政策放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上，缺乏靈活性。一項健全的公共財政政策，除了在既有的資源下作出優先次序的分配外，還應在收入政策方面作出適當安排，以刺激經濟增長，探討開闢收入來源的途徑，以及達致一個公平的稅務負擔。

香港政府向來標榜香港是以簡單低稅率政策吸引海外投資，而今年施政報告亦以此為政府的綱領。然而，面對香港社會急劇的變化，經濟不斷轉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簡單的低稅率政策根本不能完全切合社會的實質需要。

香港稅基狹窄，使政府的收支政策缺乏靈活性，而稅制亦不夠公平和未能提供社會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政府應盡快成立獨立的稅制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現時的稅制。這點是我不斷極力向政府爭取的，可惜一直不被接受。總括來說，我們覺得政府在理財上是目光短淺和缺乏遠見。

縱觀今年的施政報告，既無驚喜亦無突破，只是在原有的框框中修修補補，實在使人非常失望。

主席先生，我看到還餘下兩、三分鐘，我想談談預委會。我本來沒有打算討論這問題，但實在不吐不快。預委會這個「怪胎」的成立，根本是因中英不能如以往一樣再秘密地進行妥協，來決定我們未來的一切，包括最重要的九五年選舉安排，所以才會有第二個「爐灶」——預委會的產生。在這前提下，一言以蔽之，預委會根本是中方的「打手」，是中方成立來對付英方的，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降格，拖慢工作，而把預委會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預委會的成員常常在公眾場合（正如剛才李永達議員說）發言，而發言又沒制度、沒有發言人，沒有告訴我們議程是甚麼，我們只知他們整日在開會，卻不知他們開會說些甚麼。但開會的言論卻使人害怕，引起香港市民很多討論。譚耀宗議員說我們刻意抹黑預委會，把預委會說得很不好。但我們覺得市民的意見不是要特別抹黑預委會。香港數份左報天天抹黑民主派，但民主派得到的支持又是怎樣？我覺得不是在報章上說幾句抹黑的話，每天說他們不好，他們便真的不好。不是的，主要是看他們說的話是否得到市民支持。

剛才很多議員在這方面舉了一些例子，我不再重複。中方要做的工作，是要爭取市民的信心。我們很多議員提到總督無法改善中英關係，常常批評總督「說一套，做一套」，這點我絕對贊成。但相對而言，我們有否要求中方同樣要做他們的工作呢？改善關係是要兩方面合作的。這項工作是否單方面可以做到？不錯，我知道總督是說多於做，也多是政治的取態。但中方何嘗不是？現在把責任完全推給英方，實在不妥。中方的態度是否值得我們支持？中方現在利用預委會來打擊港英政府的威信，也發表了很多言論。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將來特區籌委會的中堅分子？可惜他們得不到市民的支持。我要告訴他們，不是隨便向記者說數句他們做了些甚麼便可爭取公信力，而是要做一些實際的工作，並且要透過諮詢，聽聽香港人真正的意見，才可以得到的；不是召開閉門會議，大家去 **brainstorm** 一下便算。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胡紅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們的政府雖非民選，但大抵也應該向市民負責。但究竟有多負責呢？

總督及各司級官員皆非民選，他們毋須參加競選、亦毋須作出競選承諾。他們不以競選政綱獲任命，政績亦非以履行承諾的滿意程度來衡量。總督大概會辯說每年的開始，他都會提出詳盡的施政報告，各司級官員亦會臚列他們的政策大綱。此外，《立法議程》詳列各項將予通過的條例草案，而《工作進度報告》則監察向公眾提供的服務。

無可否認，施政報告、《政策大綱》、《立法議程》及《工作進度報告》等，均是重要而有用的文件。我們不要靠不住的政府。但我們知道我們不得不同意那些已定優先緩急的政策事項，因為我們不能予以重新釐訂，我們也知道我們不能駕馭政府，因為我們不能把它撤換。在政治層面說，這個政府依舊不受抨擊、不受彈劾。

總督形容立法局在「行政主導」政府內的角色時所用的措辭，使人不安、甚至震驚；因為這些措辭遺漏了很多東西。

「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作主。」憑這句話，總督給予立法局單一的功能：否決或批准由行政機關提交的條例草案及開支建議。在一個以行政作主導的政府內，真正的權柄緊緊掌握在行政機關的手中。由政府提議條例草案、制訂政策、訂定預算，立法局的功能只局限於被動地作出反應。

總督曾表示立法局不是「橡皮圖章」，也不會成為「橡皮圖章」；有紀錄為證。這真是可圈可點。但他的舉動卻另有所指，使人覺得他期望立法局擔當的角色，雖非「橡皮圖章」，但也相去不遠。

當立法局內各政黨皆同意凍結差餉兩年時，總督卻運用《皇室訓令》所賦予的權力，否決該建議。

當立法局可望成功修訂由政府提議有關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利益限額的條例草案時，政府為免受挫，將草案撤回。

由立法局建議的事項又如何？立法局議員建議成立人權委員會，總督則辯說，若容許議員以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擾亂」政府既定的立法及撥款次序，將是「不負責任」的行動。總督還說，「全世界」的政府對由個別議員發起、涉及撥款的議案，都定下類似的限制。

至於有關公開資訊的建議，政府一方面承認市民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卻拒絕言行一致，提供資訊，還說須要彈性處理。說得坦白點，是政府不欲受制於法律，更不想因違法而受罰。

立法局的主要功能是反映它所代表的市民的意見。一個民選產生而永遠掌權的政府，若真正矢志向市民負責的話，必須細心聆聽立法局清晰表達的意見，這些意見的形式包括議員的問題、動議辯論，當然還有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

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是憲制工具，可補救行政機關惰性和反應遲鈍。當政府遭受猛烈抨擊，指它在許多問題上遲遲不採取行動時，它的反應都是以不斷的「研究」問題來敷衍；這點已成特色。

沒有政府不犯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也可能主導無方，或更不堪者，領導倒退。人盡皆知，政府原本打算將人權法施行於公營機構，若非最後一刻改變初衷，把私營機構摒諸門外，那麼，人權法中禁止歧視的規定亦應適用於私營機構。當時政府曾承諾會草擬更詳細的法例，禁止歧視，以補人權法不足之處。

但人權法通過後，政府認為已功德圓滿，沒有利用人權法來展開一系列的行動，並且堅決否定有需要再立例擴大人權法的適用範圍或執行人權法。當議員提出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以補缺漏時，政府又匆匆提出一些遠不及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的建議，以期平息民憤。

在性別歧視方面，政府在關於性別平等的綠皮書內，直率地聲稱香港並無性別歧視的問題，一直拒絕立例把性別歧視列為非法行為。現在，政府終於承認有立法的需要，但卻又試圖把香港最根深蒂固的歧視形式置於法網之外，例如，年齡歧視不在法例適用範圍之內。即使在性別歧視的範疇內，政府仍有意保留香港的丁屋政策，就是只有男性的新界原居民才有資格申請。

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看來正好是我們所需的憲制工具，以矯正這類行政癱瘓和遲鈍。

事實上，我深深懷疑政府保護不幸人士免受歧視的誠意。政府常以需要諮詢為理由，拖延採取行動，其動機可疑。政府一方面向全世界宣稱它同意反歧視的原則，並確說絕不反對平等機會條例草案所奉的原則，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交的草案，規模卻小得可憐。這些都是多此一舉、有意混淆公眾視聽的行為，除了刻意阻撓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外，別無目的。政府不斷空談向市民負責，我懷疑它對這種精神有多少尊重。

在世界其他地方，民選代表在制定立法及撥款事項的緩急先後上，擔當主導的角色。在香港，我們以「行政主導政府」這個概念粉碎立法局的主動性，並為行政機關的懶惰提供藉口。若有政府宣稱非民選的行政機關有權漠視立法機關的情緒、有權先發制人否決立法機關的立法議案，這是不負責任的政府。

行政機關不應運用權力阻撓立法議程上的任何條例草案。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應予人一種樂於參與公開辯論的印象，而不是阻撓辯論。為了維護本身的公信力，它必須讓市民見到它如何在公眾面前捍衛它的立場，而不是閉門造車。

我們這種負責任的模式，不應是單向的，換言之，政府只要拒絕執行，便可將立法局所建議的措施屏棄。負責任的意思，不是漠視立法局、不是窒礙進一步的行動和辯論。

總督若要凌駕立法局，勢將令負責任的原則淪為笑柄。若他真要這樣做，便破壞和削弱民主的進程。

立法局的角色正不斷改變，由「橡皮圖章」蛻變為獨立的監察機關。隨着其民選成分壯大，立法局更具公信力、更具政治問責性。配合這個發展，我們理應檢討立法局的資源、需要以及它與政府和行政局的關係。

立法局須有足夠的事實資料，俾讓它作獨立判斷，方能妥善地執行其職務。換言之，立法局必須具備自己發掘事實真相的能力，進行研究和分析，甚至不可以倚靠政府去評估民意。

大家都記得一九八七年政府試圖操縱民意調查來作為推翻八八直選的理由。今天，政府又再操縱民意，以取得公眾對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支持。政府不去詢問公眾對政府的建議有何意見，相反，卻把所謂公眾服務廣播充塞大氣電波，推銷其計劃的好處，向公眾表示：這是你獲得老年退休金的時機，寫信支持政府的建議！若這不是操縱民意，我不知道甚麼才是。

目前，立法局的運作頗受制肘。它倚賴政府提供資訊和專才，它本身並無足夠的資源去獲取資訊或專業支援，以便更有效地監察政府。舉行公開研訊、成立本身的調查委員會、聘請顧問、就立法局事務與海外機關聯絡、以至將來與審核本港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展工作上的安排等，在在需財。

立法局的職員人數少，幾乎沒有能力進行研究。圖書館的書架亦空空如也。現時立法局秘書處已經獨立，這是我們歡迎的轉變，但立法局的財政預算仍受政府控制。我希望總督對立法局慷慨地撥出資源，使立法局具有自行制定預算的能力。我亦希望財政司聆聽我這個要求。

主席先生，我請總督考慮日後先與立法局議員商議，才確認司級官員的任命，並考慮加強行政局的代表性。可透過委任立法局議員加入行政局，或委任由立法局提名的人士加入行政局，以加強行政局的代表性。此舉亦可改善行政局與立法局的夥伴關係。雙方對話可減少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爭持不下的機會。

主席先生，若不是聽了陸觀豪議員的演辭，上述一點可能是我演辭的尾聲。作為消費者委員會的副主席，我聽取了鄭議員和陸議員對消費者委員會工作的批評意見和忠告。我當然同意消委會所進行的研究，務須設計周詳、探討深入。消委會的公信力最終是由市民去評價的，市民是消委會的服務對象，也是消委會唯一的客戶。消委會不應該由於銀行界的憤怒而退縮。市民把金錢存放在銀行，銀行保管他們的金錢，這是一項信託關係。銀行界應充滿信心地說：「我們打開帳簿，歡迎查閱；我們爭取你的光顧。」

我有責任去駁斥任何暗示消委會所聘用的顧問缺乏專業知識的言論、或暗示消委會容忍資訊遭內幕人士濫用。對於工商界能夠提供的資料、分析及專業知識等，我們當然表示歡迎。消委會的宗旨是改善香港的投資環境，這點對香港非常重要。

謝謝主席先生。本人支持動議。

狄志遠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本人代表民主黨，就教育政策，水浸問題及新市鎮發展幾方面，評論施政報告的內容。

### 教育政策

在教育方面，施政報告可以說：「承擔不足，缺乏前瞻。」

民主黨一直認為，政府過去對教育的承擔不足，我們要求將教育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低於 3% 的百分比逐步提高，令各範疇的教育政策，能按社會需求而發展。今年施政報告雖然提出政府明年的教育開支，將有 4.5% 的實質增長，但這增長是令人失望的，比本港經濟的實質增長 5.7% 為低，比上年度教育經費的實質增長 6.1% 亦低。民主黨強調在香港現時財政充裕的情況下，投入更多資源在教育經費上是合理的社會投資，也符合社會的期望。

另外今年的施政報告一如往年，對教育政策缺乏前瞻視野。報告書的建議，大部分是將過去教統會報告書未落實的零碎建議綜合的結果，例如興建 3 所實用學校及 7 所特別技能學校，早在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已提出，並不是「新措施」。雖然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中，教育佔有 6 頁紙，但內容絕大部分都是「炒冷飯」，而且對一些教育界多年爭取的改善措施，並沒有作出交代，這包括特殊教育，中學浮動班，中一、中四及預科學額不足問題等。

### 幼稚園

就幼稚園教育，施政報告表示要推動幼稚園發展優質教育，這也是多年來教育界及家長所要求的，但可惜，施政報告並未能提出全面及配套的改善措施。報告書提出在未來 4 年，政府會動用 1.63 億元進一步改善幼稚園的師資訓練，並在一九九五年九月起，規定每間幼稚園須最少有 40% 的教師為受訓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及要求更多受訓教師都是好的措施，但我們擔心，學校在沒有額外新資源的情況下，能否達致上述措施的效果？如果要求每間學校有 40% 教師受過訓練，那經營成本會增加，於是學校可能需增加學費，將成本轉嫁到家長身上，加重了家長的負擔；又或者部分學校因成本增加，而無法繼續營辦，會做成學生失學；又或者學校為減低成本，不按政府建議的薪酬標準聘用受訓教師，那又不能鼓勵更多教師去接受訓練，因此，我們可以發覺，單提供訓練及要求受訓教師的數目，並不能改善現時的問題，而且可能會令問題更加嚴重，例如學費增加、學生失學等。教育委員會幼稚園工作小組曾向政府提交一份改善幼稚園質素的報告書，建議主要包括兩方面：(一) 政府向幼稚園提供直接資助；(二) 增加培訓機會，改善師資質素。這兩項建議是配套的，是要雙管齊下的，但現時施政報告只提及師資培訓，並未落實向幼稚園提供資助，要到一九九五年才作決定，我們認為政府這態度是拖延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的發展。教委會的報告書已作出全面及合理建議，亦得到民間教育團體的認同，政府的拖延態度是與民間的意願相違背的。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要落實各項建議，在一九九五年預留經費，使九五年新學年開始向全港幼稚園提供直接資助，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

## 高等教育

施政報告只提及增加資助學生的貸款及助學金，但並無因應立法局議員的要求，全面檢討高等教育的學費政策，這點令我們感到不滿。另外，施政報告亦無提出改善高等教育的質素，這些都是不足的地方。

## 當前工作

施政報告內提出的當前工作只得 3 項，未被列出的，是否將被視為不重要？民主黨認為，教育的當前工作應包括下列各項：

### 1. 授課語言

我們認為政府只用鼓勵方式推動中學採用中文作為授課語言，過於消極，家長偏重英文，是因為社會上仍然重英輕中。政府採取苦口婆心的勸諭方式，並不足夠，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扮演更積極角色，推動母語教學。

### 2. 目標為本課程

目標為本課程，在教育界仍有很大的爭議。政府雖然提出根據目標為本課程，「學生以按照配合自己能力的進度，並朝著切合實際的目標用功學習」，但現實上，政府未能在制訂這些目標的同時，進行相應的課程改革。這是一項有深遠意義的課程改革運動，我們希望政府於一九九六年完成 70 間小學的試驗計劃，先進行檢討，才考慮全面推廣目標為本課程。

### 3. 家長的知情權

政府應盡快草擬家長約章。近幾年來，本港家長，開始關心學校政策，政府必須正視這個現象，確立並承認家長對教育的知情權。

### 4. 課程質素

普及教育自實施後，中、小學課程大部分仍維持過往精英教育的色彩。我們認為，政府應抱着決心，透過課程發展議會，根據普及教育的原則，推行課程改革。具體措施，包括推行各科課程檢討，以及提出切實方案，進一步推行活動教學及其他課程改革方案。

## 長遠任務

1. 對政府並無提出教育要面對政治轉變帶來的需求，我們感到十分驚奇。香港社會一方面要面對九七回歸中國這個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市民的政治訴求。教育是引導下一代面對有關問題的重要手段。我們以為政府應在這方面扮演更積極角色，在課程裏引進民族教育、民主教育等因素，在教育政策制訂的過程中，進一步提倡民主和提高透明度。

2. 在提高教師地位方面，政府雖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但均屬表面工夫。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盡快成立教師專業公會，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地位的提高。
3. 語言能力

我們同意政府提出「我們必須具備精通中英文（包括普通話）的人才」。但過往政府的改善語文計劃，只集中改善英語水平。我們希望政府的語文基金能在改善質素的大前提下，把資源平均分配到改善中、英文教學質素。

施政報告提出「語文基金諮詢委員會已制訂長遠策略」，我們希望政府盡快澄清有何長遠策略，讓公眾人士討論。

### 水浸問題

主席先生，香港是一個先進而現代化的城市，但香港仍有不少地區的居民要經常面對水浸這原始災害的威脅。過去幾十年，新界西北部每年都有水浸發生，就以過去5年為例，新界平均每兩日就有1宗水浸事件。去年水浸紀錄超過400宗。但可惜，施政報告對水浸問題竟然隻字不提。主席先生，記得在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新界西北部發生嚴重水浸。第二日，總督先生立即親臨北區河上鄉巡視，當時總督先生表示會督促有關部門正視水浸問題，並加快改善河道的治理工作，希望盡快將問題解決。但1年後的今日，這支票仍未兌現，正所謂得個「講」字，而施政報告內更提也不提，真令長期受水浸困擾的居民感到極之失望。

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包括：

1. 落實撥款，加速河道治理工作，包括盡快進行深圳河治理工程，以及增撥資源清理河渠淤泥。
2. 嚴厲杜絕非法更改用地，包括嚴格執行城規條例、審慎考慮土地及工程審批等。

### 新市鎮發展

主席先生，本人為新界北民選議員，希望就區內新市鎮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亦希望政府能夠加以改善。

1. 家庭服務不足問題：新市鎮因社區設施不足，形成不少家庭問題，例如夫婦不和、家庭破碎，青少年問題等。現時政府主要提供一些補救性的家庭服務，對於推動一些發展性及預防性的服務，並不積極。我們認為政府要為新市鎮的家庭設計新穎的服務，投入更多資源，以滿足他們的需要及預防家庭問題的發生。



2. 新界東北交通問題：施政報告完全忽略解決新界東北交通問題，我們希望政府明白到，當地居民正面對中港運輸頻密而引致的交通擠塞及噪音問題。我們亦希望政府明白到，我們對外巴士服務不足，以及獅子山隧道及大老山隧道塞車等問題。希望政府積極面對及加以改善。
3. 鄉郊服務不足問題：鄉郊人口正不斷老化、居住環境惡劣，但政府並未對區內居民提供足夠服務。我們要求政府重新檢討對鄉郊居民提供服務的策略，特別是老人及兒童服務。

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合作」，強調中英雙方要合作，強調行政與立法要合作，但總督對於政府與市民的合作關係似有忽略。明顯地，政府的民生政策，似乎未能滿足市民的要求，這是否表示政府不理會與市民合作，因而不尊重市民的意見呢？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田北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一位星期日專欄的作家在其文章中表示，總督的週年施政報告變得愈來愈沒有用處，我不同意這點。只要他仍是總督，即使只是餘下 900 多日的總督，他為本港社會所計劃的一切，仍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他所作的決定影響，不論他的決定是對或錯。沒有他的政策方針，香港便會像一條沒有指南針的船。

總督每次談及跨越其任期的策略時，便有如進入未經探測的水域。但他不能局限自己只處理當前的事務，他必須勇往直前。沒有政府或負責任的公司行政人員可以只做兩、三年的工作，然後將其餘的一切交託命運安排。總督必須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才離開香港，因為這是他宣誓要履行的責任。在這一方面來說，香港人是評定他是否有履行這責任的陪審員。

我得讚揚總督貫徹執行一位前任總督於一九八六年許下的承諾，在將軍澳騰出 70 公頃土地供發展用途。這項計劃影響深遠，其影響力一直會延伸至下一世紀。我亦要讚揚總督承諾在今年透過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投資 2.6 億元於科技研究及接受工業擴展的申請。這一大額投資，我借用他的一句口頭禪來形容，是高科技工業的「動力」。

總督在他所說的「我們的歷史」中所得的評價，並非完全取決於日後進行的龐大計劃。在今後的歲月裏，他的功績將會以香港政府於現在至一九九七年期間，在各大小範疇所做的事項而決定。

主席先生，我曾代表商界就本港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發表多次演說。政府並沒有作出我的商界同事所希望得到的回應，因為它堅守一九八九年所定的 25000 名外地勞工配額，這些外勞不包括屬於另一類別的家庭傭工。

總督說本港現時約為 1.6% 的低失業率，足以證明其經濟政策可行，以及市民生活富裕。我贊同第二部分的說法，但不同意第一部分。

本港空前偏低的失業率亦是煩惱的徵兆。對於商界來說，失業率低便表示沒有擴展餘地。本港的某些工作將會找不到足夠的合資格工人，因而最終會導致一些商業遷往其他地方擴展。

另一個不良後果，就是令到每一個人，特別是窮人，因通貨膨脹而受損。5 年前的 1 元，今天大約值 6 毫。這對於一般家庭來說，已不是甚麼好現象，更何況是那些面對劇烈競爭的商業。政府基本上承認通脹已經失控，但是否如此？通脹於過去 1 年來略為下降後，現在又再次上升。是否所有人都應該對這個問題置諸不理，只希望其工資會追得上這永無止境，以及確實難以抵受的通脹攀升？

如果香港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採取這無動於衷的態度或許還算有道理；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的主要對手正因通脹率低，加上生產力提高而佔優勢。不久之前，香港經常以兩位數字出現的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現在這些兩位數字似乎只在通脹一欄中出現。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新加坡的通脹率是 3.7%，而本港的通脹率則是 8% 或 9%；獅子城的當地生產總值增長預計是 9.3%，而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則預計是 5.5% — 而且我們的增長大部分倚賴中國貿易。

政府不敢放膽把低就業率與高通脹扯上關係，我則不然；政府害怕嘗試新的解決辦法，我認為我們不應如此。以新加坡為例，該國因應需求，調整輸入外勞，因為當地政府相信，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可以同時是一個製造業基地兼金融中心。我們的政府卻告訴所有人，而且極力令自己相信，本港只可以擔當上述的其中一個角色，但不能同時擔當兩個角色。對於政府這自視不能及故步自封的做法，我感到十分悲傷。

輸入外勞總是不受歡迎及備受爭議的。本地的工會及一些政黨基於輸入外勞只會搶走本地工人職位這個過分簡單和錯誤的假設，反對本港輸入外勞。但事實上，這些外地工人工資低廉，他們不單擔任本地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並且增加對各項服務的需求。這些需求可為港人製造更多具吸引力的職位及機會，使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而得以提高。

我建議政府考慮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准許逐步輸入另一批為數 25000 人的外勞。現時的 25000 名外勞配額，比起本港 280 萬的工作人口還不足 1%，所以，勞工處應更加寬待某些特別受勞工短缺影響的工商業。舉例來說，現時給予電子業的 19 名外勞配額，簡直是少得可笑，因為即使是一間電子廠，也須聘用超過 19 名工人。製衣業於一九九二年獲得 1400 名外勞配額，今年則只獲得 435 名外勞配額。除非政府在勞工政策方面作出彈性處理，否則只會迫使餘下的廠商遷往中國，而在本港保留一個可維持的工業基地，是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亦不能不理會因經濟轉型而遭解僱的本地工人。政府曾經嘗試透過政府及資助機構開辦的職業再培訓課程，設法向這些工人傳授職業技能。可是，這些技能並非經常都合用。不少從培訓課程畢業的人都繼續失業，或從事低下的工作，白費了所受的訓練。商界人士支持較為成功的在職再培訓計劃。當工人完成這類再培訓課程後，他們便會有適當經驗擔任已經存在的職位，並且能夠賺取不錯的工資。

主席先生，本港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現正因為令人卻步的商業及住宅樓宇價格和租金而逐漸減低。有些公司已覺得將人手及總部駐於香港的做法不化算。不少公司能夠舉出一些可怕的例子，證明本港租金在兩三年內倍增，而間接成本亦像火箭一般急升。

無論我們說多少次香港對商業有利，也不能勸服那些寧願以新加坡為基地，每星期乘噴射客機往返南中國，或在上海開設全盤生意，而不願以香港為基地的公司行政人員。隨着投資者離去的，不單只是資本，而且是令本港更具吸引力的多元文化。

政府必須加快透過中英土地委員會爭取更多市區用地，以及重建土地發展公司受委託重建的舊區。單是開拓一幅土地供發展用途，便需要大約 4 至 5 年時間。當供應能夠滿足需求時，現時過分反覆的市場價格便會回復穩定。在本港設立區域總部的公司，亦會因能夠在仍然興旺但不至於瘋狂的地產市場底下，可按照常理作出長期預算而感到如釋重負。

主席先生，我曾經與很多反對把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混為一談的商業機構討論退休金的問題。我在那些機構的同事所達成的共識，是擬議的老年退休金計劃並不可行。不論是國際抑或本港的學者，以至私營機構的專家，均同樣發出警告，勸諭當局切勿採用這個令到不少國家破產的全民社會保障計劃。美國、意大利、英國、澳洲及加拿大所面臨的「社會保障危機」，亦足以令我們確信決不能重蹈覆轍。

雖然我們這些工商界的人反對設立全民退休金，但我們堅決贊成採取一個既公平、合理而又體恤的雙管齊下方法。政府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按照經濟狀況發給貧困老年人的社會福利津貼，提高至每月 2,300 元。這樣做可能須每年額外支付約 18 億元，但對今年預計有 80 億元的財政盈餘來說，將不會構成負荷。此外，我贊同政府有關改善老人設施及健康護理服務的承諾。

不過，對於政府認為所有 50 萬名 65 歲或以上的人，都是極需援助和救濟的貧民這一個說法，我覺得實在難以置信。對於政府揚言把公司利得稅的稅率增加 4%，以便從一般收入撥款資助老年退休金計劃這一點，我亦有同樣疑慮。這拙劣的恐嚇手段是不會成功的。

我的同事更寧願增加現時相等於薪金總額 5% 的僱員退休金供款額，雖然這表示日後我們在這方面的供款，會比老年退休金計劃的供款額還要多。我們願意這樣供款，清楚否定了人們認為僱主總是「自私」、「貪婪」及「對僱員福利漠不關心」的慣常指責。我們寧願以這些福利幫助自己的員工，提高他們的士氣及答謝他們對公司的忠心。對於從市面

流通資金，以及從個人、私人投資及或許由專業人士管理的公司退休金抽取大量金錢的這個草率的退休計劃，我們當然不願意進行注資。我們坦言支持政府儘快立例實施法定退休。對於那些真正需要援助或沒有私人福利金援助的少數人士，則應給予他們社會福利，而不應對他們投以歧視眼光。

主席先生，最近每當九號貨櫃碼頭被提及的時候，都會受到香港政府及中國方面的非議——這真的令人不勝其煩。不過，事實上九號貨櫃碼頭的問題比立法局更政治化，而這事實給予我們很大的啓示。香港只須加倍積極爭取興建十號貨櫃碼頭，而暫時將九號貨櫃碼頭的問題放下，直至中英雙方的分歧消除為止。除非我們現在暫時擱置九號貨櫃碼頭計劃，全速進行十號貨櫃碼頭計劃，否則，我們的大量貨運生意將會被其他地方搶走——尤其是新加坡已超越香港，成爲最繁忙的港口——我們反而會被人責怪，屆時我們便不能提出任何東西來證明我們已盡力而爲。

這件事令我想起總督在施政報告中順帶提及的商業信心問題。我想甜言蜜語和空談是不能建立起商業信心的。

總督保證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在一九九六年創立時會無條件地給予支持，但不支持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即籌委會的前身。雖然有關方面曾告知預委會可列席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但這是沒有幫助的，因爲預委會從中方已經可以取得這方面的資料。政府曾堅稱不禁止公務員與預委會成員進行非正式會面，這亦是一種詭詐手段，因爲預委會成員經常會於飲宴、聚會及其他社交場合碰見公務員。這純粹只是由於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重修舊好不能只靠空談，我們必須有實際行動。

香港政府與中國舌劍唇槍，只會損害商業信心。要建立商業信心，最重要的是有實質進展和成績的跡象。總督經常抱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有這麼多工作未完成，而時間又愈來愈少。我亦有同樣焦慮。但政府其實可以與預委會正式交涉，以加快這些工作的步伐。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距今只有兩年半的時間，花其中的一年半時間擺姿態不是很可悲嗎？

只要政府消除對預委會的惡感，以及對中國暗藏的不敬，商業信心便會得以增強。最後，主席先生，如果總督說：「以我的行動而非說話來判斷……」，他的施政報告將會更令人刮目相看。總督相信香港的歷史「亦是我們的歷史」（意指英國歷史）。若真的如此，我們更應與中國合作，否則，香港的中英聯合歷史讀起來便會彷彿一齣悲劇。

曹紹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借此機會讚一讚總督彭定康先生，在他領導之下，政府各級官員處事的態度及進度的確是更爲積極及有成效。而今次的施政報告更大事包裝，除了總督的演辭部分外，更印備厚達 163 頁的政策大綱及交通大綱和《立法議程》，提供大量資料以期令廣大市民更具體了解政府今年的施政目標。雖然實質內容被各界人士批評「雷聲大、雨點小」及像「蜻蜓點水」般，但我們必須同意，政府將施政與承諾逐項羅列是負責任和增加透明度的做法。而在十月四日所印發的《實踐九二年及九三年施政報告所作承諾的工作進度報告》，亦有助本局議員及公眾人士監察政府工作。這些都是我深表歡迎及支持的。

但與此同時，我亦要勸誡政府切忌「矯揉造作」，因為過分標榜成就及政績可能導致「浮誇風氣」，甚至對政府的工作會造成不健康的發展。港府的施政一直是秉承「務實」的傳統，因應社會的實際需要及有限的財政資源，透過一個高效率的公務員架構去執行。如果過分標榜「成功率」及政績，難免迫使部分官員將來為了維持威信及權位而玩弄數字遊戲或重量不重質，最終只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今次施政報告可稱得上琳瑯滿目，但可惜內容空泛，對如何改善民生、解決交通、老弱照顧，遏抑通脹及樓價、輔助製造業的勞工就業及轉業等重大問題，都未有訂立具體解決方案，反之只是給市民一種「耍太極」的感覺，有「炒冷飯」的嫌疑。何為「炒冷飯」呢？即是炒飯的白飯是已經煮熟的，是舊料，上加幾粒「蛋花」、「蔥」、「油」及「鹽」，炒埋一碟湊數，甚至將別人碗內的「糯米」也取來落鑊，「炒埋」一堆，務求做到多「色」多「味」，「唔係咁好食都睇得」。

以我最關心的交通問題作為例證，施政大綱中所提及的 89 億元興建新道路通往新機場及改善屯門公路的工程，3 號幹線汀九段及郊野公園段的安排；動用 8,000 萬元在屯門公路裝設交通監察系統等項目都是「舊料」。新措施及新承諾都是一些「細小」或「含糊」的項目。在別無新意的情況下，政府竟然將地下鐵路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這兩個以商業原則營運的法定獨立機構的改善工程投資，都拿過來當是政府的計劃的一部分，政府這個做法我實不敢認同。尤其是政府就長遠改善交通擠塞的辦法及宏觀的中港兩地交通網發展計劃都欠奉，連政府及各界一致公認是最急需及具重要經濟效益的「西北鐵路」都未能被確認，納入今個年度進行籌辦興建，實令廣大市民失望。

我認為政府預算在十二月公布的一套解決道路擠塞的措施，不外是提議加稅以壓抑汽車增長，而非以長遠的眼光去發展及投資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政府這種只顧收入、不願作長遠投資的策略，是否反映臨將日落的夕陽心態？若是，又何必誇耀政府首重經濟發展的大目標，更遑論「掌握千日·跨越九七」的豪情壯志了！

主席先生，讓我轉過來評論一下廣大市民都非常關心的「如何可以改善中港關係」這個問題。

總督先生用冗長的篇幅論述一連串的承諾及行動，作為改善中港關係，表面上是非常積極及充滿誠意，令關心這問題的市民充滿希望。

但若果翻閱九三年總督在施政報告論述有關中港關係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目標時，我們便會發覺與今年的內容，只是大同小異及程度不同的分別而已。假設總督真是有心想改善中港關係，但他似乎未能擺脫英國人要「光榮撤退」最後一個殖民地這個包袱，加上其「自以為是」的心態，導致出現「有心無力，大捉盲棋」這個窘境。去年的施政報告題為「立基今日·開拓明天」，而今年的報告似乎應改名為「剩餘千日·(中港關係)原地踏步」更為恰當！

自從總督及英國刻意炮製及「威迫利誘」地促使本局通過九二政改方案，試圖製造民主假象時，中英的合作已出現不可彌補的裂縫。到這時刻，中國已不敢對英國再存幻想，只求在港人的諒解及信任下做好接收主權、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準備工作。而英國若果未能改善關係，只可以抱着「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的心態維持現狀，到九七年將一個行政財政法制運作正常的香港交回中國，然後黯然撤退。

總督及英國可能不甘心接受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就是英國人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及透過香港在亞洲地區的參與，對英國是至為重要，故此在今次的報告上作出加強合作的承諾是理性的，只可惜似乎還未能取得中國的信任。

而所承諾的都是港府應該及必須做的事項，九三年總督口口聲聲說要改善中港關係，但實際的行動卻背道而馳。今年雖加多幾分誠意及承諾，但都是九六年才能兌現的期票，甚至乎仍堅持不接受「預委會」的角色及在九六年與「籌委會」進行交接工作時要以「商定」的方法提供協助。布政司陳方安生於十月六日所發出的指引，對司級官員與預委會的接觸提出諸多掣肘，難免令中國對總督的提議懷着「狼來了」的不信任態度，甚至令中國覺得英國仍試圖在後過渡期刻意阻延權力的轉移，很可能令到政府的施政未能發揮。

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是享有共同利益的，亦有共同責任。英國有「光榮撤退」的意願，而中國有「統一香港」的歷史任務。如果中英真誠妥協，中英港三方都會受惠；若否，三方面都會受害。香港人是最無辜的，港人無權決定自己的前途，但若中英決裂，港人所付的代價亦是最大的。

我反對民主黨建議港英政府「單軌行動」的主張，亦勸諭其他人士不需再強烈批評總督及英國，我們須諒解英國的心態，我們應該游說英國做「亡羊補牢」的工作，亦應協助及配合中國接收香港主權及制訂一國兩制的細則。中國人有句說話「好女兩頭瞞」，所以，我們應該小心處理這敏感時刻，希望使中英港的關係得以突破。

本人謹以港人的身份奉勸：

- (1) 總督須理智地接受一個事實，純以施政報告中所提各項並不足以化解中英之間的基本矛盾。總督應該改變政客「唔輸得」的心態，而以外交家的手法，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與中國官員相處及合作，始可使日後的工作轉為順利。
- (2) 中英兩國必須平心靜氣地深入商討雙方在後過渡期，就香港事務的決策權力的分配，取得平衡，進而就交接的具體問題達致新的共識，始能做到平穩過渡。
- (3) 港人不應再在中英及政制的問題上糾纏，以免矛盾激化。我們應該將時間及精力做好香港的民生改善及經濟發展工作，使廣大市民真正受惠。再以香港的經驗及資源協助中國發展，為中國邁向富強及統一的歷史里程，作出貢獻。

主席先生，總督施政報告的內容雖然空泛及欠缺長遠眼光，但其透明度及對改善中港關係的誠意，是值得我們接受的。

本人謹此陳辭，並支持答謝總督的動議。

主席（譯文）：涂謹申議員，我會在四分鐘後，亦即是八時正，打斷你發言。

涂謹申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這份行政首長的施政報告應該是針對時弊的，應該就一些長期以來仍然未能解決的問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在前瞻性方面，面對新的形勢，施政報告應該有一些新的處理政策。

我們閱讀施政報告，當然不是事事都要找些新的政策、新的項目，但當我閱讀完整份施政報告時（我當時不在香港），卻令我感到萬分驚奇，我以為我看錯了，因為我自己很關心的重建舊區問題和一些保安政策的問題，在施政報告內均並無針對性的解決方法。

在過往兩日的施政報告辯論中，很多議員都用「炒冷飯」、「似新還舊」等去形容施政報告。甚至剛才曹紹偉議員說「炒冷飯」，我自己都有些同感。這些印刷精美的一本本所謂《政策大綱》，根本許多都是簡介往年所做的一切，稱之為持續計劃的重點，所謂的「新措施」，也不過是根據持續計劃重點延續下去的一些項目，甚至可以說是沒法可針對時弊。

關於市區重建的問題，一九九二年立法局通過一項動議，希望政府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去解決和檢討此問題。等了兩年，還是毫無動靜。我們今年五月被迫提出一個譴責動議，認為政府做了那麼久，仍未能解決舊區居民在這方面的困境，希望政府在3個月內（其實我當時想「即時」）提出一些具體改善建議。可惜今次施政報告竟然隻字不提，完全沒有提及重建的問題，彷彿這問題並不存在。

在官員補充答辯中，政府才表示年底會有一些初步看法或者傾向。這是全不能接受的。在施政報告內，總督表示要在房屋方面為無法負擔其他類別房屋的市民提供質素良好、租金合理的公共房屋。我可以告訴政府，合資格上樓的受重建影響居民，渴望盡快獲得編配公屋，他們想到瘋了，3年、5年、10年，許多居民輪候了很多年都沒法獲得編配公屋。我希望政府能切實檢討有關的政策。

有一點很有趣，我收到一份由兩個關注市區重建的民間團體所撰寫的《施政報告補充頁》，其中的字體與施政報告的字體不單止完全一樣，連字眼、段落、形式也完全與施政報告相同。不過，當然這份補充頁不能夾附入施政報告內，因為這不是總督施政報告的一部分。我知道政府亦收到這份補充頁，我希望政府能夠看一看。民主黨是支持補充頁內所有的建議和分析，我希望政府能在短期內盡快落實有關的建議。

假如重建只會對受影響的居民帶來痛苦，我可以很直接地說一句：「寧願選擇不重建」。我可能會受到很多的指摘，例如「阻礙地球的運轉」或「未能使環境得到改善」等。我並不希望「阻礙地球的運轉」，我亦不想環境得不到改善，更加不希望被指摘要減少土地來興建新屋。但是，如果用大部分人長期的利益來欺壓或犧牲少數人即時的痛苦，那可否使他們的痛苦減輕或快點兒沒有痛苦？

民主黨爭取原區安置，政策是可行的，只是會使某些人的邊際利潤減少……

## 晚上八時正

主席（譯文）：現在已屆八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2)條的規定，本局現在應該休會。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2)條的規定，以便本局可完成今晚的事務。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涂謹申議員致辭：

我只想說一句話，舊區重建真的並非一個純技術的問題，並非是怎樣重建得最好、最快、最有效益地改善環境的問題。我不想逃避，這是一個真正有利益對立的問題，是發展商的利益、政府的收益與受重建影響居民原區安置及受保障的權益的對立。我希望政府在得悉民間的疾苦後，能將平衡點稍為調節一下。如果總督在其離任前，未能妥善地解決舊區重建的問題，讓幾十萬名居民，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道何時清拆，清拆了也不過是搬去另一幢舊樓，又等待另一次的拆卸……。我相信這是總督離任的一大污點。

在保安政策方面，保安司勾劃了一些重點，他說增派 400 名警員巡邏；增聘了 600 名警員，其中增加 45 名警員參與反黑的工作，另外 38 名專責在毒品調查科負責一些打擊濫用軟性藥物的工作。如果我是外星來客，看到這裏加幾百，那裏加幾百，好像很好，好像很實質。但是，當我們看到問題各方面的嚴重性時，我相信這裏所說的建議，



未必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如果政府說增聘了 600 名警察，我不禁要問：資深警員的流失，相對於新招聘的警員，我們究竟是否有一支真正加強了實力的警隊呢？我們多了很多新人，我希望他們是志願者的一群，繼續秉承警隊的優良傳統，盡忠職守，勇敢執法。但實際上，我們有很多資深的警員，累積了很多警務的經驗，知道如何去捉賊，如何去獲取資料、「古惑仔」犯事的手法。面對這些資深警員的流失，究竟政府有無具體方法去挽留他們呢？例如前線的警務人員在宿舍、裝備、中國將來的態度等方面都有所憂慮。究竟政府是如何處理呢？

另一方面，有關警隊的管理和人手調配的全面檢討已進行了兩三年，保安事務委員會不斷要求政府提供一些基礎資料，使議員和市民能夠參與整個檢討、給予意見。不是要參與決定，而是給予意見。但是很奇怪，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後，保安司說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有任何的建議要落實，便會要求本局撥款。但問題是建議些甚麼呢？是否要到要求撥款時才告訴本局建議內容？但這建議牽涉到二萬多個警員和眾多在警隊服務的文職人員。究竟可否給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局議員、市民多一些機會提供意見呢？因為這是牽涉到本港整體很重要的一環。

此外，我們談到警員、警隊的結構時，不單只是人數，我們要講求質素、士氣；要講求警務人員是否進取、果斷地做事。我不想特別對某一個警區奉承，不過在我認識而比較熟悉的警區裏，我不得不讚賞現時在深水埗警區上任一年多的指揮官，我要寫個「服」字給他。我很少寫個「服」字給警務人員，為何？因為在他領導之下，確實和深水埗的警員通力合作，今日掃黃、明日打擊賭博，後日偵破漁市場的勒索，每一日都會有一些實際的行動。曾有前線的警務人員對我說，他們真是做至疲乏不堪。原因為何？因為指揮官每天都有新的行動目標及策略。指揮官希望他們能夠達至工作目標，工作有成果。可能有人會說，他們可能是基於個人的晉升、名和利等等。但是，我作為一個議員，作為當區的議員，看到有這樣的成就，看到市民確是「額手稱慶」，「津津樂道」，為何一個新指揮官可使同樣數目的警員，所產生的效力較以往增強數十倍？我希望政府能夠詳細檢討各警區和給予一些客觀的指標，使各警區積極地調動有關的警員，採取一些積極的行動。

至於三合會的問題，我知道中國對黑社會人士有着統戰的意見。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亦曾談到，黑社會的力量很大，他們並非全部都是「為非作歹」的人，其中好人亦有不少。去年四月，中國公安部部長亦談到，中方亦會接受香港三合會組織愛國愛港的人士，中方會接受這些人，認為是團結得愈多愈好，並將會鼓勵他們做好事。陶先生的說話在繼後的日子中並沒有被鄭重否定，更加深了我們在這方面的疑慮，並且挫敗了執法人員的士氣。

眾所周知，黑社會人士已漸漸地向北遷移，有些靠政治捐獻而獲得禮遇，成為愛國商人。我認為，共產黨若然要打擊黑社會，可以十分「心狠手辣」，正如打擊任何異己一樣，但若然共產黨採用懷柔政策，將黑社會人士控制在可控制的情況下，這本身是政治統戰。我希望港英政府能夠切實將這個訊息反映給中國政府。如果我們的警務人員將來對付黑社會領導人的時候，是要畏首畏尾，這是很悲哀的事實。我相信九七之後對付街頭的

罪案，本港警察仍然會有很高的士氣，但如果我們怕打擊黑社會的領導人，就算我們通過幾多條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亦於事無補。

另一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保安問題，在施政報告內也是隻字不提的，就是青少年犯罪、吸毒等問題。青少年犯罪在近幾年急劇上升，青少年的吸毒、販毒數字更是倍數上升。我要警告香港政府，當前頭號的保安問題不是越境打劫；不是失了幾多輛名貴汽車，真真正正頭號值得我們警惕和以危機態度處理的，是青少年犯罪問題。有個記者向我作出挑戰，問如何解決？我有一個簡單的回應。我說，你認為多一倍的警察有用，還是令青少年的父母和家長、教師等，多一倍關心他們有用？很明顯，答案會是後者。要解決這個問題，並非純粹靠加強警力，令到多幾個警察和學校的主任聯絡便可辦到，因為那只是善後和執法的问题。歸根結底，我相信解決方法在於令青少年的父母真正地去關心他們。現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父母因為覺得虧欠他們的子女太多，便給予金錢，再加多一個菲傭，以作補償，這是有錢人的狀況。如果是中下階層，便更加悲哀。我希望政府能加強家庭教育，這是長期的工作，要盡早落實。

另一方面是關於跨界的罪行，我希望除了和中國加強合作之外（這是一定要做的），還要和國際社會合作。時下信用卡的騙案、毒品的國際化，清洗黑錢和最新趨勢的核原料和核武器擴散，其實，在很多國際的報告書內都憂慮香港的情況，因為資金可以很自由地進出本港，而本港的交通，亦實在很頻繁，因此，和國際社會充分合作是必需的。

最後，民主黨希望政府在加強執法人員的裝備、士氣、人手等等的同時，亦需要一個獨立的監察制度。我們會繼續爭取一個警隊之外的獨立警察投訴課，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雖然屢遭否決，但我們希望政府在加強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後，仍然不要取消這個主意，保留彈性，去觀察究竟能否有一個好的獨立監察制度。

本人謹此陳辭。

黃偉賢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根據最近一次由政務總署所進行的調查，市民最關注的、亦是現時最嚴重的問題是交通擠塞。可惜，總督彭定康先生似乎一點也不能掌握到市民的脈搏。在他上任以來所發表過的3份施政報告當中，對於影響民生最大的問題，都只是輕描淡寫地處理。在他第一份的施政報告中，對影響新界二百多萬居民的交通問題，竟可隻字不提；到第二份的施政報告，雖然已提出了交通運輸問題，但所提出的改善建議……

李柱銘議員（譯文）：主席先生，我想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主席指示立法局秘書召集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譯文）：好，現在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黃偉賢議員致辭：

第二份施政報告所提建議大部分都是與新機場有關，根本對解決香港交通擠塞全無幫助。而在今年洋洋二萬多字的施政報告中，卻只有兩句與運輸問題有關。或許總督先生認為現時港府處理交通問題已很妥當，又或許總督先生根本不了解交通擠塞對市民造成時間、精神、經濟上的損失是那麼大，又或許總督先生真是苦無良策！過去政府不斷地說已有策略、有計劃地改善有關問題，但問題卻愈趨惡化。以新界西為例，屯門公路的使用已達飽和，而現時天水圍居民亦相繼入伙，新界西人口已增至 70 萬，對屯門公路造成更大的壓力，交通擠塞，簡直是無日無之，而新界很多土地亦已被非法改變用途，用作貨櫃停車場。重型車輛天天佔用新界對外的主要幹道，造成嚴重的交通擠塞。葵涌、青衣亦多次出現嚴重的交通擠塞，更有一、兩次令到新界西、新界南和九龍西交通癱瘓，如果遇上豪雨或是嚴重的交通意外時，我們可以做的亦只是「坐咗喺度」，情況之惡劣，可想而知。

不過，如果政府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可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我實在看不到政府有何決心和魄力去解決這個頭號嚴重的交通擠塞問題。

首先，在去年承諾的 12 項改善交通道路網絡措施工程中，只有兩項是得以兌現，其餘都是正在進行中。而在《政策大綱》運輸基礎設施部分所謂的「新措施」，其實只不過是重複過去已經承諾的道路工程、例如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汀九橋等。若政府在 1 年前答允我們的要求，自行斥資興建三號幹線，現時已在動工階段，亦可提早 1 年完成有關工程，大大解決了新界西對外的交通問題。其實，本港還有很多急需拓闊或加建的交通幹道，如青山公路、港島西道路、青衣複製南橋等。如果港府真有誠意去達致其目標「擴展及改善我們的運輸基礎設施」的話，應該立刻公布以上工程的施工時間表，而並非只是一直拖延。至於新界西北鐵路及將軍澳地鐵支線，我們十分高興知道，將軍澳地鐵支線將會與新界西北鐵路同時興建。

雖然政府答允我們部分要求，將新界西北鐵路終點站由現時的天水圍伸展至屯門北（兆康），但我們認為這是不足夠的。民主黨將會繼續堅持爭取西北鐵路的終點站應延展至屯門市中心。最重要的是，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有關鐵路的進展。運輸司曾承諾在二零零一年可以完成。若然如此，這條鐵路便須於一九九六年動工。現時相距九六年只餘下兩年。我們了解，單是收回土地亦需要兩年時間。若現在還未動工，我們擔心，這條鐵路未必能夠在二零零一年完成。

在公共交通政策方面，政府的目標是要改善公共交通服務的質和量，惟在其「計劃重點」或所謂的「新措施」中，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何「新」的承擔。首先，地鐵及九鐵預算在一九九六年前耗資數十億元改善設備，以增加行車班次及載客量，這些建議早已為人所知，不是甚麼新措施。其次，我們知道全港有 8 成的市民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政府是有責任去確保市民應享有舒適及可靠的公共交通工具服務。惟是政府依然並沒有制訂一套長遠及完善的公共交通政策，即是以足夠的誘因去鼓勵日益富裕的市民繼續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以適當的競爭去鼓勵公共交通工具改善其服務。在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加強對專營巴士的監管，以迫使其改善服務質素，例如取消九巴的利潤保障計劃及在審批中巴的專營權時，引入適當競爭，以提高服務質素。政府亦應制訂長遠的渡輪政策，以加強渡輪的發展潛力。

我們知道，要維持香港繼續繁榮，交通運輸不可落後於人口及地區發展。而要維持一個暢通的交通網絡，首要目標是必須提高集體運輸的效率，取代對貨車及私家車的依賴及充分利用道路系統。在今年《政策大綱》交通政策第三部分的「交通管理」中，提到要減低交通擠塞對環境、經濟、生活質素等損害時，政府打算耗資數億元去改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或監察及資料系統等。無疑，改善一些交通訊息或控制系統，使駕駛人士知悉路面的使用情況，有助於改善道路的效率。但是，香港很多幹道都缺乏「第二選擇」，故這些措施亦不能避免出現交通擠塞。如遇上交通意外，政府又沒有應急改道的交通安排配合，就算是改善了交通訊息系統，對交通擠塞問題，也是無補於事的。

而在改善新市鎮的交通運輸系統時，港府必須在規劃上正視未來的交通需求，即是有正確無誤的人口統計、增長及遷徙數字，以及合理的地區發展預測，然後在佈局上完成陸路、鐵路的環迴系統，為各幹線及新市鎮安排交通環迴系統的「第二選擇」，並提供充分的後勤設施，以解決各地區的交通擠塞問題。在天水圍北的 200 公頃儲備土地，政府將提早發展，並強調興建更多的住宅。但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提出有關交通道路設施的配合，令人懷疑政府在此方面的誠意。將來，天水圍會否成為另外一個交通塞擠的黑點？

主席先生，屯門公路的擠塞，人所共知，亦使本局同事聞之色變。事實上，對於屯門、元朗的 70 萬居民來說，屯門公路的擠塞已成為居民的一種無奈。我們在施政報告看不到有任何具體措施來解決有關問題。

總督只是重申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和新界西北鐵路系統。這些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措施。在此，民主黨有一個大膽的建議，就是希望在屯門公路實施一個「四出兩入」的潮水式行車方法。我們的建議當然考慮到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很希望政府有關方面慎重研究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建議，而且做好安全措施，例如將第四行車線在荃灣入屯門的快線列為由屯門去荃灣的一條行車線，而這條行車線亦可列為巴士專線，將行車車速減為 50 公里，好似香港很多的對頭道路行 50 公里一樣，並加派警員巡邏，以防止車輛超速。我們知道有一些塑膠石壘比較堅硬，是可用來分隔車道的。民主黨已將建議提交屯門、元朗、荃灣、葵青的道路交通改善小組，我們希望工作小組盡快召開會議，考慮這個建議。

除了這個大膽的建議外，我們民主黨亦建議可以在屯門公路上實施短期措施，例如：

- (1) 立即在屯門公路加設交通巡邏隊，阻嚇因超速及經常過線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 (2) 加強渡輪服務，如開闢新航線由屯門往荃灣；

- (3) 改善道路維修，意外救援，應急改道等交通安排及管理；
- (4) 積極研究在新市鎮出市區的幹線上，撥地作巴士轉駁站的可行性，以減少巴士路線的重複，從而降低整體巴士使用道路的數目，減低道路的負荷；
- (5) 積極鼓勵營辦屋邨巴士以提高集體運輸效率。

主席先生，總督彭定康先生曾承諾港府是有決心令香港繼續擁有世界城市應該擁有的交通運輸系統。我們希望這不再只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會切切實實以行動作出表示。我希望政府不再拖延，盡快提出有效又合乎民心的建議，向市民交代那些建議的詳細內容。

主席先生，有時我看到一些寫文章的人對某件事不滿時，便在報章社論的框框開天窗來表達他的不滿。但說話是不能不開聲的，所以我本來打算利用這 15 分鐘，只說「擠塞，擠塞……」這兩個字，看看在 15 分鐘內可以說多少次，亦可讓總督彭定康先生多聽幾次擠塞的問題，尤其是屯門、元朗的擠塞問題。不過我亦知講是沒有用的，效果不大，所以我在這裏很誠意地代表我們屯門、元朗 70 萬的居民，邀請總督先生騰出一個星期日，到元朗和屯門度假，然後星期一和其他市民一樣搭巴士返回總督府上班。我相信一次經歷便會給予他一個很深刻印象。我很希望總督先生能夠實地了解新界西的交通擠塞問題。

最後，我想利用這分多鐘的時間，講講總督不接納城市理工學院麥法新博士所進行關於綜合社會援助計劃的調查報告。對此我表示強烈不滿。總督在現在經濟這麼充裕的情況下，都拒絕增加公援，實在令我感到非常失望。香港有今日，老人其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理應獲得社會的照顧。總督亦說這是他首要任務。雖然施政報告談到很多社會服務措施，但如果老人連根本的生活開支也負擔不來，他們怎會到老人中心呢？怎會去享用其他的服務呢？因此，民主黨在此衷心希望總督能夠「覺今是而昨非」，拿出勇氣接納麥法新報告書的建議，以改善目前領取公援金的老人的生活質素。這亦是我們最終所求。

謝謝主席先生。

楊森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一連兩日有關施政報告的辯論中，民主黨議員已廣泛地就施政報告的各方面作出評論。本人的發言將代表民主黨對施政報告作出總結，再一次強調民主黨對施政的重點要求。

本人的發言主要分 3 方面。總督在施政報告中論及「責任交代」及「工作承擔」，本人亦就此作出回應。第一部分發言會集中「責任交代」，主要是指行政與立法關係；第二部分集中在「工作承擔」，會就市民關心的退休保障及老人服務作出建議；第三部分圍繞中英合作及預委會問題。

首先是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強調港府是一個負責的政府，並且與立法局有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是「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作主」。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理想能夠達成。畢竟，立法局也不是希望特別為難政府，大家的目標也是一致為市民服務。

然而，擺在面前的事實，卻令人懷疑我們是否已經達致這種理想。就此，我想分開幾方面來說。

第一，在對待立法局通過的動議方面。不錯，今年政府對立法局通過的動議的反應似乎是積極了，最低限度當局會就所通過的動議作出回應及跟進行動，向本局進行定期報告。然而仔細看看這些報告，不少其實只是重複一些行政部門早已付諸實行的措施，或重複部門一直彈着的反對舊調。政府仍對相當多的動議置若罔聞，例如去年就「僱員補償」、「就公務員薪酬調整成立獨立仲裁委員會」、「提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標準金額」、「就《促進健康》諮詢文件再諮詢市民」，以及「全面取消往來、儲蓄和定期利率」各方面，政府也只是在會議上、在工作報告上一直反對，又或是做一點工作，便當交功課。這種情況反映出政府在察納民意上，仍有相當大抗拒。難道這種就是行政向立法負責的夥伴關係？

第二，開放政府的問題。總督經常號稱公開，建立開放政府。但現實卻是立法局議員及各個小組經常強烈要求政府提供研究和參考資料，政府仍一直只拖着。較明顯的有保安科關於警隊架構及編制檢討報告，儘管報告已完成，部分建議也已經實行，但向議員提供的資料，卻只是寥寥幾張紙。港府也曾拒絕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政策檔案目錄的資料。很多時政府用公帑完成很多調查、研究報告，若最後議員因為沒有有關檔案和目錄，可能甚至不知道文件是否存在，試問那又何以有足夠資訊監察政府呢？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總督以其沒有民主認受性的行政獨裁權力，去否定立法局研究及討論重要法案的情況。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今年彭定康引用《英皇制誥》，否決本局三黨及其他議員就差餉所作出的修訂案，導致本局要譴責總督。此外，總督在本月亦正式否決胡紅玉議員有關成立人權委員會的私人條例草案。

以上這些事實，教人怎樣相信是行政機關提議，立法機關決定呢？又教人如何相信行政部門是認真向立法局負責，而不是繼續維持其表面稱為「行政主導」，實際是殖民地式行政獨裁的情況呢？

第二方面是有關老人服務與退休保障。首先是老人服務。過去兩年總督都將老人服務列作優先處理的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情況卻令人慘不忍睹。去年大部分老人服務承諾均落空，使人懷疑這是否負責任政府應有的表現。就老人服務方面，民主黨認為其重心應該在社區支援，以下本人就此作出建議：

要積極調動資源來擴展老人服務，首先要有部門的執行。老人服務牽涉到其他政策科的範圍，例如房屋、地政、工務。因此，有一個協調及調動其他政策科資源的執行機構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只會像現時一樣，承諾變成空中樓閣。政府建議在衛生福利科下設立一個老人服務小組作中央統籌，是正確的第一步。但政府必須確保其職權和運作，能達到上述調動、協調資源的目標。照顧老人的工作可以分兩方面，一是院舍、護養院、護理安老院及日間護理中心等服務；其次是向照顧老人的社區服務提供支援。現時院舍服務仍未能追上需求，在《政策大綱》中，不少服務承諾也無法實現。例如，就老人服務中心而言，今年進展已達到目標，但政府卻表示，不能保證在九七年前能夠解決短缺的問題，即表示九七年時有關服務仍會繼續短缺。

同樣，護理安老院的宿位能否如九三至九四年社會福利五年計劃預計一樣，在九六至九七年解決，也令人疑問。

根據統計處人口預測報告顯示，老人數目 5 年內將由九三年的 79 萬增至 89 萬。老人不斷增加，服務承諾卻不斷落空。政府必須積極面對這種情況，切實提出解決的辦法。

在社區支援照顧方面，情況也令人失望，須知老人的社區照顧做得好，將會減低院舍服務的需求。去年總督施政報告曾提到家人照顧的重要性，但可惜這方面的服務到今年卻無任何的發展。

在社區支援及協助家庭照顧老人方面，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考慮以下建議：

- (1) 增加老人外展服務：兩隊老人外展服務的實驗計劃檢討經已完成，檢討結果認為此計劃是成功的。但為何政府仍然只維持兩隊而不作擴充？據悉老人小組報告曾建議為露宿老人提供外展服務，成立綜合外展隊，但此建議沒有在《政策大綱》出現。
- (2) 增加對家庭照顧老人的支援：此支援服務不應只限於家務助理及醫療隊，還應包括心理輔導及提供更多資源予資助機構，策劃一些互助小組，建立支援網絡，使照顧老人的家庭成員得到支持及得以分享經驗。
- (3) 改革提供老人基層健康服務的形式：雖然去年政府承諾提供專門醫療隊，為非住院患病老人提供健康護理及身體檢查，但其服務範圍仍然非常有限。民主黨建議政府應積極考慮，將老人保健服務作為社區基層醫療組成的一部分，以類似過去學童保健方式運作，老人隨時可得健康護理、身體檢查服務。此舉可以防患未然，從而減輕院舍護理服務的需求。

關於退休保障方面，在老人照顧方面，除社區支援外，退休保障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總督在施政報告中，重申不會再考慮設立中央公積金，民主黨對此強烈表示不滿和遺憾。我們原則上支持政府現時建議的老人金計劃，但此計劃存有不少漏洞。假如公積金與老人金並行的話，可以補救這些不足，使退休保障更加完善。

現時政府建議老人金的好處，在於即時提供老人由現在至未來 10 至 20 年的退休後入息保障，但因建議金額只與通脹掛鈎，20 年後退休金的相對價值已追不上社會生活水平。雖然中央公積金在未來 10 至 20 年不能發揮作用，但在 20 年後，對過去有工作歷史的市民而言，將可以補充及超越老人金保障水平，使這兩種制度可產生互補作用。

從對市民保障而言，老人金計劃可作為所有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這屬第一重保障，而中央公積金則為第二重保障，使過去曾工作過的老人，退休後的生活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整體社會負擔來說，老人金計劃通過供款來籌集資源，可解決政府因老人福利而日漸加重的負擔，以及由一般支出承擔所引起財政超負荷的問題，但卻不能解決因人口老化，致令日後社會整體要作出承擔的問題。中央公積金就可以符合未雨綢繆的原則，減低日後整體社會承擔日增的老人需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老人退休金與中央公積金並行，才是跨越九七，照顧老人的最佳辦法。民主黨準備就此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並準備在九五年初就此計劃大綱進行公眾諮詢。

第三方面是關於中英合作和預委會的。在施政報告中，總督重提中英合作。現時市民十分希望中英政府能夠合作解決後過渡期的民生、經濟、基建問題。民主黨認為中英合作，是雙方在中英聯合聲明對港人的承諾，是雙方均需共同完成的責任。此外，亦清楚寫明雙方是通過聯合聯絡小組進行合作溝通。因此，民主黨希望雙方能夠加快小組的工作，盡快解決後過渡期主權移交所牽涉的種種問題。請中英政府記着，聯絡小組的工作是雙方的承諾及責任，當中不存在選擇的餘地。

在昨日辯論中，不少議員均提到與預委會合作的問題。民主黨重申，中英合作必須在符合《聯合聲明》、《基本法》情況下進行。預委會是中方另起爐灶的偷步組織，根本就沒有任何認受性及代表性，只是作為與港英鬥爭的工具。我們認為中、英雙方均須按照《聯合聲明》行事，不能隨便因鬥爭需要而轉移及違背承諾。

預委會成立以來，差不多所有曾討論的議題，均與香港社會輿論及民意相違背，一派唯恐天下不亂的作風。民主黨其他議員對此已作出嚴厲批評，本人不再重述。預委會過去的言論實際上已經打擊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信心。

現時距離主權回歸不足 3 年。回望八四年至今，香港人經歷了多次的起伏，現在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前景仍一片模糊。當中原因就是中、英政府均缺乏對香港人的信任。中英雙方無論是過去合作蜜月期，到今時今日互相鬥爭，香港人的意願從來沒有得到尊重。在缺乏這種信任的情況下，我們實在看不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會有實現的一天。

但我們不會因此氣餒，在種種希望和承諾逐漸幻滅時，我們會以更堅定的信念來面對，以實際的行動來爭取。



主席先生，我在這裏代表民主黨作出以上的總結陳辭。順帶一提，今次政府在準備施政報告時作出的努力，如《政策大綱》、政策進展的報告，在以前都是沒有的，此舉加強了政府的透明度。我相信官員在準備這些報告時作出了不少努力。我們作為議員是代表民意監察政府的，亦希望政府能夠明白，我們作出的批評是因為大家擔當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責任。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布政司（譯文）：主席先生，我動議押後辯論這項動議。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晚上八時四十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所列動議的中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效力。）

